

列 宁

进一步，退两步

人 民 大 版 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 进 一 步，退 两 步

(我们党内的危机)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版 社

В. И. ЛЕНИН  
ШАГ ВПЕРЕД, ДВА ШАГА НАЗАД  
(Критик в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本书译文采自《列宁全集》第7卷，这次排印  
第三版时，译者对译文作了个别修改。

列 宁  
进 一 步，退 两 步  
(我们党内的危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公 告 出 版 社 老 板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70,000字  
1954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3版  
1975年4月北京第6次印刷  
书号 1001·193 定价 0.45元

# 目 录

序言 .....	1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	5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	7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 .....	11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	20
(五)使用语言平等问题引起的事件 .....	23
(六)土地纲领 .....	30
(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 .....	38
(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 .....	46
(九)党章第一条 .....	49
(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	72
(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成员 .....	83
(十二)党章问题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补选问题。 “工人事业社”代表退出代表大会 .....	88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 .....	103
(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党内的革命派 和机会主义派 .....	130
(十五)在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 .....	143
(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 .....	162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	173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	203
附录 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 .....	209
注释 .....	219

# 进 一 步，退 两 步

(我们党内的危机)<sup>1</sup>

## 序 言

当持久的顽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些时候就开始显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战役的最终结局如何，就要看这些争论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细微的枝节问题，同这些争论点比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党内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引起全体党员的深切注意已经半年了。正因为我向读者叙述全部斗争的概况时不得不涉及到许多毫无兴趣的细节，许多实质上没有什么意思的无谓争吵，所以我想一开头就请读者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们党内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sup>2</sup>上我们党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政治意义问题，这两个派别的划分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前的一切划分都远远地推到后面去了。

第二个问题是新《火星报》<sup>3</sup>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原则意义问题，因为这个立场真正带有原则性。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斗

争的最终结果，斗争的结局，把一切属于原则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和把一切属于无谓争吵方面的东西剔除出去而作的原则性总结的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要靠分析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情况，解决第二个问题要靠分析新《火星报》新的原则内容。这两种分析占了本书十分之九的篇幅，在分析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目前构成这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新《火星报》愈是努力加强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愈是脱离由补选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则在新《火星报》上也就愈清楚地显露出新的观点体系，这就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现在论述我们党内危机的一些报刊的主要缺点就是，在研究和阐明事实方面对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几乎完全没有加以分析，而在阐明组织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面，则对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提出党章第一条条文以及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同《火星报》现在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性观点的整个“体系”（当然这里是指可以说得上的体系而言）之间显然存在的联系，也没有加以分析。关于党章第一条条文争论的意义，尽管“多数派”的刊物已经好几次指出，但是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似乎根本看不见这种联系。其实，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现在只是加深、发展和扩大他们最初在党章第一条条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其实，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的整个立场，还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条文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拥护散漫的、团结得不紧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们主张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学生以及“每一个罢工者”都

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加入党所承认的某一个组织的所谓“形式主义”；他们倾向于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倾向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流行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错误。

至于说到党代表大会的记录，那末对记录采取这种实在不应该有的忽视态度，只能说是由于我们的争论被一些无谓争吵弄模糊了，也许是由于这些记录中有大量的十分辛辣的真情实话。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使我们看到唯一、确切、完备、全面、充分和正确地反映我们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描绘的各种观点、情绪和计划的情景，我们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正是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也只有这些记录，才能向我们表明，究竟我们已经在什么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纯粹小组的联系的一切残余，而代以统一的伟大的党的联系。每一个党员，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参加自己的党的事业，都应该仔细研究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正是应该研究，因为只读一遍记录所包含的一大堆材料，还不能了解代表大会的情况。只有经过仔细和独立的研究，才能（而且应当）使简短的演说提要，讨论的枯燥摘要，小问题（似乎是小问题）的小冲突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使每一个出色的发言人都在党员面前以生动的姿态出现，使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很分明。本书作者如果能够推动大家广泛地独立地研究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这项工作就算没有白做。

还有一句话要奉告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他们一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

章取义，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小册子中的个别词句。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是久经战斗的了，决不会为这小小的针刺所惊扰，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让敌人先生们试把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画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有些象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图画也好！

尼·列宁

1904年5月

---

##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常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也和任何一个政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一样，也成了某些觊觎领导地位而遭到失败的人的审判官。现在，这些“少数派”分子怀着十分天真的心情“咒骂自己的审判官”，并且千方百计地想破坏代表大会的威信，减低它的意义和权威。这种倾向在《火星报》第五十七号发表的一篇署名为实际工作者<sup>4</sup>的论文中，可以说表现得最突出，该文作者对于代表大会是不可侵犯的“偶像”这一思想深表愤慨。这是新《火星报》的特点，我们决不能把它默默地放过去。被代表大会否决的人员占多数的编辑部，一方面继续自称为“党的”编辑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欢迎那些硬说代表大会不是偶像的人。这不是绝妙的吗？先生们！是的，代表大会当然不是偶像，可是对于那些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居然“谴责”起代表大会来的人，又该作何感想呢？

其实，请回想一下代表大会准备过程中的一些主要事实吧。

《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在 1900 年的出版预告中说过，在实行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火星报》曾经力求把 1902 年的代表会议<sup>5</sup>变成非正式的会议，而不是党的代表大会<sup>①</sup>。《火星报》在 1902 年夏秋之间设法恢复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时，采取了十分慎重的行动。最后，划清界限的工作结束了，——

---

① 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 20 页。

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结束了。1902年底，组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组委会的确立，并在第三十二号社论中说，召开党代表大会是刻不容缓的最迫切的必要的事情<sup>①</sup>。可见，谁也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对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态度是匆忙的。我们的行动准则正是：裁衣以前量七次。我们有充分的道义的权利期待同志们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哭泣，也不要重新再量。

组织委员会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那些现在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字样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毫无气节的人，也许会说这个章程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并且交给所有的委员会讨论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十八条是这样规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这些决议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来抵抗，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sup>②</sup>这几句话从前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东西，就默默地通过了，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是现在听起来，这些话好象专门给“少数派”下的判决词，这就令人奇怪了，难道不是这样么！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当然不是。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和各行其是的集团组成的，它们可能对代表大会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家的善良的愿望（现在有人对这种愿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调皮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决定等于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相互说出的真心话。这个决定应该保证一切同召开代表大会有关的巨大人力、风险以及费用都不至于白费，应该

---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76—277页。——编者注

② 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2—23页和第380页。

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幕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其选举的现象是破坏信任的行为。

新《火星报》好象发现新大陆一样，说代表大会不是偶像，说代表大会的决定不是圣经，这究竟是嘲笑谁呢？这种发现有没有“新的组织观点”，或者只是一些想掩盖旧痕迹的新企图呢？

##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总之，代表大会是经过很细致的准备工作并根据十分完备的代表选举制的原则召开的。大家一致承认代表大会的成分是正确的，并且认为全党应该无条件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大会主席在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以后所作的声明（记录第 54 页）中的提法。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火星报》三年来的活动以及大多数委员会对《火星报》的承认，这就预先决定了代表大会应当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火星报》的纲领和方针应该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火星报》的组织计划应该在党的组织章程中明文规定下来。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结果，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为召开代表大会时采用的完备的代表选举制，可以保证那些曾坚决反对《火星报》的组织（崩得<sup>6</sup>和“工人事业社”<sup>7</sup>）以及那些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别有企图，并在原则方面表现得很不坚定的组织（“南方工人社”<sup>8</sup>以及靠近该社的某些委员会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大会不能不变成为《火星报》方针的胜利而斗争的舞台。代表大会也确实成了这样的斗争舞台，每一个稍微细心阅读代表大会的记录的人，马上就会看清这一点。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详细研究一

下在代表大会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派别，并根据记录的精确材料重新揭示代表大会上每一个基本集团的政治面貌。在代表大会上由《火星报》领导而融合成为统一的政党的那些集团、派别和色彩的真实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我们应当通过分析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来阐明的问题。阐明这个问题，无论对于研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面目，或者对于了解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都是有根本的重要意义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同盟代表大会<sup>9</sup>上的发言以及我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件中，都着重于分析各种派别划分。“少数派”中一些出面反对我的人（以马尔托夫为首）根本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只限于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对谴责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的问题作一些“辩解”，甚至没有打算针对我的分析描绘一幅稍有不同的代表大会派别划分的图画。现在，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 56 号）上，企图把一切想确切划分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尝试叫作简单的“小组攻客手腕”。马尔托夫同志，你说得太厉害了！可是新《火星报》的厉害的话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只要我们把全部分歧的演变过程（从代表大会开始）确切地重提一下，这些厉害的话就会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对现在的编辑部。请你们这班提起小组攻客手腕问题的所谓党的编辑先生们看一看自己吧！

现在马尔托夫一想到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斗争的事实就非常不愉快，以致他竭力想根本抹杀这些事实。他说，“所谓火星派分子是指那些在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代表大会以前对《火星报》表示完全同情，拥护它的纲领和组织观点，赞成它的组织政策的人。在代表大会上，这样的火星派分子共有四十多人，——当时投票赞成《火星报》的纲领并赞成承认《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的决议的就有这么多人。”只要翻开代表大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除了阿基莫

夫一人弃权以外，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纲领（第 233 页）。这样，马尔托夫同志硬要我们相信，无论是崩得分子、勃鲁克尔以及马尔丁诺夫，都曾经证明他们“完全同情”《火星报》并且拥护《火星报》的组织观点！这是令人可笑的。这是把一切参加过代表大会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后成为有平等权利的党员（而且还不是所有的人，因为崩得分子已经退出去了）和在代表大会上引起斗争的派别混为一谈。结果不是研究代表大会以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反而暗中用“承认了党纲”这么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打掩护！

试拿在承认《火星报》是中央机关报问题上的表决情况为例。你们可以看出，马尔丁诺夫，即现在被马尔托夫同志硬说是拥护过《火星报》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政策的那个马尔丁诺夫，坚决要求把决议案分成两部分来表决：一部分是仅仅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另一部分则是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在表决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时（承认《火星报》的功绩，对它表示同情）赞成的只有三十五票，反对的有两票（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弃权的有十一票（马尔丁诺夫，五个崩得分子，以及编辑部的五票：我和马尔托夫各两票，普列汉诺夫一票）。由此可见，反火星派集团（五个崩得分子和三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在这里，在这个对马尔托夫现在的观点最有利的并且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极其明显的。再看对于决议案的后一部分的表决情况，即对于不说明任何理由并且不表示是否同情而只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表决情况（记录第 147 页）：赞成的有四十四票，这些人被现在的马尔托夫都算作火星派分子。总票数是五十一票，除了编辑部的五票弃权以外，还有四十六票；有两票（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表示反对；可见在其余的四十四票中是包括所有五个崩得分子在内的。这样一来，崩

得分子就成了在代表大会上“对《火星报》表示完全同情”了，——请看，正式的《火星报》就是这样撰述正式的历史！我们现在预先向读者说明一下这个正式真理的真正动机：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没有退出代表大会，那末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就会成为而且真正会成为党的编辑部（而不是现在这样冒牌的党的编辑部）；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需要把现在所谓党的编辑部的这些最忠实的卫士提升为“火星派分子”。不过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详细说明。

其次，试问：如果代表大会是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的斗争，那末是不是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的、不坚定的分子呢？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我们党以及任何代表大会的一般面貌的人，都会预先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很不愿意提起这些不坚定的分子，于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倾向于该社的代表描绘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说成是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幸亏现在我们面前有大会的全份记录，我们可以根据文件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事实问题。我们在上面说明了代表大会上的一般派别划分情况，当然还不算是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不分析各个政治派别，如果不把代表大会看作某些色彩之间的斗争的图画，那末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意见分歧。马尔托夫企图把崩得分子也算作火星派分子，以便抹杀各种色彩之间的区别，其实这不过是回避问题而已。只要看一看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以前的历史，就可以预先看出（以后可以检查和详细研究）三个主要集团：火星派，反火星派，以及不坚定的、犹豫的、动摇的分子。

###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

在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争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时，最好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来进行，以便循序渐进地指出那些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我们才离开时间顺序而综合地考察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或者性质相同的派别。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将力求指出所有最重要的表决，同时当然要撇开许多有关枝节问题的表决，这些表决占去了我们代表大会过多的时间(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经验，不善于使各专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分工讨论问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些几乎是有意的阻挠)。

第一个引起争论并使各种色彩的差别开始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项提到第一位(作为代表大会“议程”第一项)来讨论(记录第29—33页)。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托洛茨基以及我所拥护的《火星报》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崩得退党一事显然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既然崩得不愿意同我们一道行进，不愿意承认党内大多数人和《火星报》一致主张的组织原则，那末“装个样子”好象我们是一道行进，那是没有好处而且是荒谬的，只能阻碍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经阻碍过一样)。问题早已在报刊上谈得很清楚了，每一个稍微细心思考的党员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问题公开地提出来，直言不讳地老老实实地作一个选择：是自治制(那末我们就一道行进)还是联邦制(那末我们就分道扬镳)。

崩得分子在其全部政策方面一向是支吾其词的，他们这一次也想支吾搪塞，故意把问题拖延下去。阿基莫夫同志曾表示赞同他们的意见，并且——大概是代表整个“工人事业社”——马上提

出他在组织问题上同《火星报》的分歧意见（记录第 31 页）。站在崩得和“工人事业社”方面的有马霍夫同志（他代表尼古拉也夫委员会的两票，不久以前这个委员会还对“火星报”表示同情呢！）。当时马霍夫同志觉得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并且认为“关于民主制，或者反过来说〈请注意这几个字！〉<sup>①</sup> 关于集中制的问题”也是个“疼处”，正如现在我们“党的”编辑部中多数人所说的那样，但是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却还没有觉察到这个“疼处”！

总之，反对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业社”和马霍夫同志，加在一起恰恰构成当时反对我们的那个十票的数目（第 33 页）。赞成的有三十票，——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数经常在三十票左右。当时有十一票弃权，——大概是不愿意站在互相斗争着的两“党”的任何一方。值得指出的是，当我们表决崩得的章程第二条时（由于这个第二条被否决，崩得退出了党），赞成第二条的以及表示弃权的也是十票（记录第 289 页），而弃权的又是三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勃鲁克尔、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以及马霍夫同志。可见，当表决崩得问题在议程上讨论的次序问题的时候形成的派别，并不是偶然的。可见，所有这些同志不仅在讨论次序的技术问题上，并且在实质上也是同《火星报》有意见分歧的。“工人事业社”在实质上所持的分歧意见是每个人都清楚的，而马霍夫同志在关于崩得退党一事的演说中却再好没有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记录第 289—290 页）。这个演说是值得谈一下的。马霍夫同志说，在通过了否决联邦制的决议以后，“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地位问题，在他看来已经由一个原则问题变成对待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民族组织的现实政策问题了”；这位发言人

---

① 本书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编者注

继续说：“当时我不能不考虑到我们的表决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因此我想投票赞成整个第二条”。马霍夫同志出色地领会了“现实政策”的精神：他在原则上已经否决了联邦制，因此他在实践上也就想投票赞成章程内实行这个联邦制的那一条！于是这位“讲求实际的”同志用下面的话说明了他那种深刻原则性的立场：“但是〈好一个有名的、谢德林的“但是”！〉，由于代表大会的其余一切参加者几乎一致表决了，所以我是赞成还是反对就只有原则意义〈!!〉而不会有实际意义，于是我宁肯弃权，以便原则地〈上帝呵，把我们从这种原则性里救出来吧！〉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是跟投票拥护该条的崩得代表们的立场不同的。相反地，如果崩得代表象他们自己预先主张的那样对这一条弃权，那末我就会投票赞成这一条了。”谁能懂得这一点！一个有原则性的人因为大家都说“不是”，就不肯大声说一个“是”字，认为这样说事实上是没有用处的。

在表决了崩得问题的讨论次序以后，接着在代表大会上又爆发了“斗争社”<sup>10</sup>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产生了极有趣味的派别分化，并且同代表大会上的最“关痛痒的”问题，也就是同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有密切联系。负责决定代表大会成分的委员会，根据组织委员会两次决议（见记录第383页和第375页）以及组织委员会代表在这个委员会中的报告（第35页），反对邀请“斗争社”参加代表大会。

组委会委员叶哥罗夫同志说，“‘斗争社’问题（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斗争社”，而不是该社的某一个成员）对于我是一个新问题”，于是他请求休会。为什么组委会两次解决过的问题对于组委会委员竟然是一个新问题呢，——这始终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在休会时，组委会把当时偶然列席代表大会的委员（有几个组委会委员是《火

星报》组织中的老组员，没有列席代表大会<sup>①</sup> 召集起来开会（记录第 40 页）。关于“斗争社”问题展开了争论。工人事业派分子表示赞成（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第 36—38 页），火星派分子（巴甫洛维奇、索罗金、朗格<sup>12</sup>、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表示反对。代表大会又分裂成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些派别。“斗争社”问题引起了顽强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当时作了一个特别详细的（第 38 页）和“有战斗性的”演说，公正地指出俄国国内团体和国外团体的“代表名额不均等”，认为给国外团体以“特权”未必有什么“好处”（真是至理名言，现在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看来，这话是特别有教益的！），认为不应当助长“党内组织上的混乱，即没有任何原则性的理由就发生分裂”（真是一针见血地说穿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一直到停止报名发言时，除了工人事业派分子以外，没有一个人有什么理由公开表示支持“斗争社”（第 40 页）。应该给阿基莫夫同志以及他的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他们至少没有闪烁其词，也没有隐蔽观点，而是公开地奉行自己的路线，公开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在停止报名发言以后，按问题实质来发表意见已经是不容许的了，可是叶哥罗夫同志却“一再要求宣读组委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怪不得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对这种手法一致表示愤慨，连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也表示“莫名其妙，怎么叶哥罗夫同志一再坚持自己的要求”。看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在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面前按问题的实质公开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是根本不发表意见。但是，既然已经同意停止报名发言，忽然又以做“结论”为借口向代表大会捧出组委会的新决议，并且正是对于已经讨论

<sup>①</sup> 关于这次会议，请参看组委会委员和在代表大会以前被一致选为编辑部委托人兼编辑部第七个委员的巴甫洛维奇所写的一封《信》<sup>11</sup>（同盟记录第 44 页）。

过的问题的决议，这简直是暗中放冷箭！

下午继续开会，仍然莫名其妙的主席团决定放弃“形式手续”，而采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最后的方法，即“同志式的解释”的方法。组委会的代表波波夫宣读了组委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是除了巴甫洛维奇一人反对以外由组委会全体委员通过的（第 43 页），决议内容是建议大会邀请梁赞诺夫出席代表大会。

巴甫洛维奇声明：他过去和现在都不承认组委会会议是合法的；组委会的新决议“同组委会以前的决议相抵触”。这个声明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另一个组委会委员，“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叶哥罗夫同志回避切实地回答问题，而想把重心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他说巴甫洛维奇同志似乎违背了党的纪律（1），因为组委会讨论过巴甫洛维奇的抗议并决定“不把巴甫洛维奇的个别意见通知代表大会”。于是争论就转到党的纪律问题上了，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的热烈掌声下用教训的口吻向叶哥罗夫同志解释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限权委托书”（第 42 页，参看第 379 页所载代表大会章程第七条：“代表不应当以限权代表委托书来限制自己的职权。他们在执行自己的职权时是完全自由和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机关”，因此违背党的纪律和代表大会的章程的正是设法妨碍任何一个代表把所有一切党内生活问题直接请求代表大会解决的人。于是，争论问题就归结于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是为了各种团体和小组臆造出的权利或章程而限制大会代表的权利呢，还是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在代表大会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级机关和旧时的小团体，直到建立真正的党的领导机关？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在以实际把党恢复起来为目的的代表大会上一开始（第三次会议）就爆发的这次争论，有多么重大

的原则意义。这次争论可以说是旧时的小组、小团体（如“南方工人社”）和复兴的党之间发生冲突的集中表现。于是各反火星派集团立刻就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无论是崩得分子阿勃拉姆桑，无论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即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的热心的同盟者，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马霍夫同志，都发言支持叶哥罗夫和“南方工人社”而反对巴甫洛维奇。现在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抢着以组织上的“民主主义”自夸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甚至拿……军队做比喻，说军队中只有经过下级机关才可以向上级机关申诉！这个“紧密结合的”反火星派的反对态度的真正意思，是任何一个出席过代表大会或者在代表大会以前仔细注意过我们党内历史的人，都完全清楚的。这个反对派的任务（也许不是该派所有一切分子都经常意识到的，不过有时是惰性使得他们这样做），就是维护各个小团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狭隘利益，以免被广大的、根据《火星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吞掉。

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同马尔丁诺夫联合起来的马尔托夫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同志坚决地并且公正地反对那些“认为党的纪律只是意味着革命家应当服从他所参加的那个下级团体”的人。“在统一的党内决不容许有任何强制性的（着重号是马尔托夫加的）派别”，——马尔托夫当时向那些拥护小组习气的人这样解释，却没有料想到他的这些话正是斥责了他自己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以及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行为…… 强制性的派别对于组委会是不容许的，但是对于编辑部却完全可以容许了。当马尔托夫从中央机构的角度看问题时，他就谴责强制性的派别，可是，当马尔托夫对中央机构人选表示不满时，却又坚持这种派别了……

值得指出的事实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演说中，除了指出

叶哥罗夫同志的“重大错误”以外，还着重指出组委会所表现的政治上的不坚定性。马尔托夫公正地慷慨地说，“以组委会名义提出的建议，同委员会的报告〈我们要补充一句：根据组委会委员的报告所作的报告，第 43 页，柯里佐夫语〉以及组委会从前的建议相抵触”（着重号是我加的）。你们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当时，即在他没有“转变”以前，清楚地了解，用梁赞诺夫代替“斗争社”丝毫不能消除组委会行动上的极端矛盾性和极端动摇性（党员们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第五十七页上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在转变以后又是怎样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当时并没有局限于分析纪律问题；他也直率地问过组委会：“有什么新情况使这种改变成为必要的呢？”（着重号是我加的）其实，组委会提出自己的建议时，甚至没有足够的勇气象阿基莫夫等人那样公开维护自己的意见。马尔托夫现在否认这一点（同盟记录第 56 页），但是看了代表大会记录的读者却可以看出是马尔托夫错了。波波夫以组委会的名义提出建议时，对于建议的理由一个字都没有谈（党代表大会记录第 41 页）。叶哥罗夫把问题中心转移到纪律问题上去，但是他实质上只是说“组委会可能想出一些新的理由〈但是究竟想出来没有，以及想的什么理由呢？——都不得而知〉，它可能忘记提出某人等等”（这“等等”二字就是该发言人的唯一后路，因为组委会决不会忘记它在代表大会以前讨论过两次以及在决定代表大会成分的委员会以前讨论过一次的“斗争社”问题）。“组委会所以通过这个决议，并不是因为它对‘斗争社’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只是因为它想消除将来党中央机关一开始活动时就会碰到的不必要的障碍。”这不是说明理由，而正是回避说明理由。任何一个有诚意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怀疑任何一个参加代表大会的人的诚意）都想要消除他认为是暗礁的东西，想要用他认为适当的方法来消除这种

暗礁。所谓说明理由，就是要解释并且确切说明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而不是用一些老生常谈支吾搪塞。但是要说明理由，就非得“对‘斗争社’改变自己的态度”不可，因为组委会从前所通过的那些截然相反的决议也是想要消除暗礁的，但是那些决议所认定的“暗礁”恰巧是在相反的方面。所以马尔托夫同志非常激烈并且振振有词地攻击这种理由，说这是一种“小气的”理由，是想“抵赖”才提出来的理由，并且劝告组委会“不要怕别人怎样议论”。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些话真把在代表大会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那种政治色彩的实质和意义形容得唯妙唯肖，因为这种色彩的特点正在于没有独立性，小里小气，没有自己的路线，怕别人议论，永远在两个营垒之间动摇不定，怕公开说出自己的信条(*credo*)等等，——总之，就是带有“泥潭性”<sup>①</sup>。

正因为这个不坚定的集团在政治上没有气节，结果除了崩得分子尤金以外(第 53 页)，谁都没有向代表大会提出邀请“斗争社”的某一个成员出席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投票赞成尤金的决议案的有五票，——显然都是崩得分子；动摇分子又变节了！至于中间集团的大概票数究竟有多少，从大会代表投票表决柯里佐夫和尤金两人关于这个问题各自提出的两个决议案的结果可以看出：拥护火星派分子的有三十二票(第 47 页)；拥护崩得分子的有十六票，就是说，除了反火星派分子的八票以外，有马霍夫同志的两票(第 46 页)，“南方工人社”分子的四票以及另外两票。下面我们就说

---

① 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人，一听到这个字眼就大惊小怪，拼命叫喊，说别人用非同志的态度进行论战。有人由于太爱讲(讲得不是地方!)官腔而使感觉失灵到十分奇特的地步……恐怕没有一个经历过内部斗争的政党不曾用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一向是用来形容在各种战士之间摇来摆去的不坚定分子的。所以那些善于把党内斗争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的德国人，并不因为听见《versumpft》(“泥潭的”)这个字眼而生气，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讲一种可笑的…本正经的 *pruderie*(官腔)。

明这样的分配决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简略地指出马尔托夫现在对那次组委会事件的意见。马尔托夫在同盟中便说“巴甫洛维奇等人的态度过火”。只要把大会记录拿来参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反对“斗争社”和组委会时发言最详尽、最热烈和最激昂的正是马尔托夫本人。他企图把“罪过”转嫁到巴甫洛维奇身上，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不坚定性：在代表大会以前由他投票选举到编辑部的第七个委员正是巴甫洛维奇，在代表大会上他是完全站在巴甫洛维奇方面（第 44 页）来反对叶哥罗夫的；后来当他从巴甫洛维奇那里遭到失败以后，就转过来责难巴甫洛维奇“态度过火”了。这只能令人发笑。

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 56 号）上讽刺说有人把邀请某某人的问题看成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个讽刺又是反过来影射了马尔托夫本人，因为正是组委会事件成了象邀请某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样“重要”问题的争论的伏线。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由于是涉及自己的“下级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级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决不是党性态度。只要把马尔托夫在同盟中的演说（第 57 页）和他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第 44 页）对照一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马尔托夫在同盟中说，“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人无论如何都要以火星派分子自命，却又以成为火星派分子为可耻”。不了解“自命”和“成为”之间的区别，不了解言和行之间的区别，——这才真令人奇怪呢。马尔托夫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曾自命为反对强制性的派别的人，可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他却又成为拥护强制性的派别的人了……

####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也许有人认为讨论组委会问题时代表之间形成的派别是偶然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为了消除这种错误看法，我们暂且离开时间顺序，来分析一下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发生的同上述问题有密切联系的事件。这个事件是解散“南方工人社”引起的。在这里与《火星报》的组织方对立的，即与主张团结全党力量、消除那种分散力量的混乱状态的方对立的，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在没有真正的政党时曾做过有益的事情，可是当工作已经按集中制原则进行时，它就成为多余的了。从各个小组的利益着想，“南方工人社”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有权利要求保存“继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从全党的利益着想，该社应当服从大会关于把该社力量调到“一定的党组织”中去的决定（第313页，代表大会的决议末段）。从小组利益和“庸俗观念”来看，解散一个同《火星报》旧编辑部一样不愿意解散的有益的团体，不能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鲁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语）。从党的利益来看，解散这个团体，使它“融化”（古谢夫语）在党内，是必要的。“南方工人社”公开说，它“不认为必须”自行宣告解散，而要求“代表大会果断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并且要代表大会“立刻表示是或者不是”。“南方工人社”直接引证了《火星报》旧编辑部……在解散以后所引证过的那种“继承性”！叶哥罗夫同志说，“虽然我们大家是以个人为单位组成统一的政党，但是党终究是由许多组织组成的，这种组织应当受到尊重，因为它们是有历史性的单位……如果这样的组织对党没有什么害处，那就不必解散它。”

这样就完全肯定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当时所有的

火星派分子，由于他们自己的小组利益还没有提到眼前，都坚决反对那些不坚定的分子（这时崩得分子以及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已经退出了代表大会，不然他们一定会拚命主张必须“尊重有历史性的单位”的）。表决结果是三十一票赞成，五票反对，五票弃权（其中四票是“南方工人社”分子，还有一票大概是别洛夫，这一点可以从他早先的声明中推測出来，第 308 页）。这个拥有十票，激烈地反对《火星报》的彻底的组织计划、捍卫小组习气而反对党性的集团，在这里已经表现得十分明确了。在讨论中，火星派分子正是从原则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看朗格的演说，第 315 页），发言反对手工业方式和涣散状态，并不认为必须考慮个别组织的“同情”，而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南方工人社’的同志们早在一两年以前就抱着较有原则的态度，那末党的统一事业和我们在这里所批准的纲领的原则的胜利早就达到了”。奥尔洛夫、古谢夫、利亚多夫、穆拉维约夫、鲁索夫、巴甫洛维奇、格列博夫和哥林等人，都本着这个精神发了言。“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不但没有表示反对这些屡次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肯定指明“南方工人社”、马霍夫等人缺乏原则性政策和“路线”的意见，不但没有对这一点提出什么附带声明，反而以捷依奇为代表坚决赞同这些意见，斥责“混乱状态”，欢迎鲁索夫同志“直接提出问题”（第 315 页），但是这个鲁索夫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又居然——真不得了！——敢了从纯粹党的立场“直接提出”旧编辑部问题（第 325 页）。

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引起了该社的无比愤怒，这个迹象在记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要忘记，记录只能约略地反映出讨论情况，因为记录没有记下演说的全文，而只记下最简略的概要和要点）。叶哥罗夫同志甚至一听到有人把“工人思想社”<sup>13</sup> 的名字和“南方工人社”相提并论，就说这是“造谣”，——由此可以明显地看

出代表大会上一般人对于彻底的经济主义所持的态度了。叶哥罗夫甚至在很晚的时候，即在第三十七次会议上，还十分慷慨地提起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第356页），并请求在记录上写明：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既没有向该社社员征求过关于出版经费的意见，也没有征求过关于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监督的意见。波波夫同志在讨论“南方工人社”问题时暗示说，有一个紧密结合的多数派似乎已经预先决定了关于该社的命运问题。他说：“现在，在古谢夫同志和奥尔洛夫同志发言以后，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了。”（第316页）这些话的意思当然是说：现在，在火星派分子已经发了言，并且提出了决议案以后，一切都看得很清楚，换句话说，“南方工人社”将不是出自本意的被解散。“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自己在这里把火星派分子（并且是象古谢夫和奥尔洛夫这样的人）和自己的同道者分开，作为两种不同的组织政策“路线”的代表。所以现在的《火星报》把南方工人派（大概也把马霍夫？）形容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只是清楚地表明，新编辑部忘记了代表大会上的最大的（从这个团体的观点来看）事件，却想把那些足以说明所谓“少数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组成的痕迹抹杀掉。

可惜，代表大会上没有提到关于出版通俗机关报的问题。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无论在代表大会以前或者在代表大会期间都在会议以外非常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在目前党内生活的情况下创办这样一个机关报或者把现有的某一个刊物改成这样的机关报，都是非常不合适的。反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相反的意见，南方工人派也在自己的报告中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或者出于不愿意提出“没有希望的”问题，才没有提出由十个人署名的相当的决议案。

## (五) 使用语言平等问题引起的事件

我们仍然按照代表大会开会的顺序往下谈吧。

现在我们深信，还在代表大会转入讨论实质性问题以前，就不仅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完全确定的反火星派集团（八票），而且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决心支持这八个人而给它凑到大约十六至十八票的中间的不坚定的集团。

代表大会对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进行的非常详细而且过分详细的讨论，只是解决了原则性的提纲，实际的解决却一直拖延到讨论组织关系问题的时候。由于相当多的问题早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在刊物上很详细地解释过了，所以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所提供的新东西也就比较少了。不过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工人事业派（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虽然表示同意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却又声明说，他们认为这个决议案不够充分，不同意从这个决议案得出的结论（第 69、73、83、86 页）。

崩得的地位问题讨论以后，代表大会接着就讨论纲领问题。这次讨论大部分是一些意义不大的局部修正。在原则上，反火星派的反对态度只表现为马尔丁诺夫同志激烈地反对所谓自发性和觉悟性问题的提法。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当然是一致拥护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顺便说一下，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也曾经指责过马尔丁诺夫的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可笑的是，现在《火星报》编辑部（大概是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已经转到马尔丁诺夫方面，说的话和它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完全相反！大概这是符合有名的“继承性”原则吧…… 我们只好静候编辑部把问题完全弄清楚时再向我们说明一下，究竟它是在什么程度上同意马尔丁诺夫

的意见的，究竟是在哪一点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意的。在等待这个答案时，我们只想问一下，什么地方见过有这样的党的机关报，它的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后说的话竟然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说的正好相反呢？

现在我们不谈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争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也不谈党章问题辩论的开端（关于这些辩论，最好以后在分析党章问题的全部讨论情况时再来谈），而谈一下在讨论纲领时暴露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色彩。我们首先指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细节，即关于按比例分配代表名额问题的讨论。“南方工人社”的叶哥罗夫同志主张把这一点写在纲领里面，于是波萨多夫斯基（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公正地指出这里有“严重的意见分歧”。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说，“毫无疑问，我们在以下这个基本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是要使我们将来的政策服从某些基本民主原则而承认这些原则有绝对价值呢，还是使所有的民主原则都应当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我是坚决拥护后一种意见的”。普列汉诺夫“完全赞同”波萨多夫斯基的意见，并且用更肯定、更坚决的话反对那种认为“民主原则有绝对价值”的说法，反对“抽象地”看待这些原则。他说：“我们假设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普遍选举制。意大利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曾经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利。革命无产阶级也许会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正如上层阶级曾经限制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对普列汉诺夫的发言有人鼓掌也有人嘘斥，普列汉诺夫对会场上的喊声（Zwischenruf）（“你们不应当嘘斥”）表示反对，并说同志们不要拘谨，这时叶哥罗夫同志马上站起来说：“既然这个发言有人鼓掌，那我一定要嘘斥。”叶哥罗夫同志和哥里德勃拉特同志（崩得代表）一同发言反对波萨多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可惜辩论被中断

了，所以辩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就立即销声匿迹了。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徒然企图减弱甚至完全抹杀这个问题的意义，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些话（指普列汉诺夫的话）激怒了一部分代表，假使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补充说，自然很难设想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而必须践踏象出版自由这样的政治权利的悲剧，那末这种愤怒是不难避免的……（普列汉诺夫说：«merci»（“谢谢”）”（同盟记录第 58 页）。这种解释根本同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说法相矛盾，他当时完全肯定地认为在“基本问题”上是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意见的。关于这个基本问题，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右派”反火星派分子（哥里德勃拉特）以及代表大会上的“中派”分子（叶哥罗夫）。这是事实，并且我们可以大胆地保证：假如“中派”（我想，这个字眼该比任何别的字眼都更少使“正式的”温情主义者感到难堪……），假如“中派”（以叶哥罗夫同志或马霍夫为代表）有机会“不受拘束地”就诸如此类问题发表意见，那末严重的意见分歧是会立刻暴露出来的。

这种意见分歧在讨论“使用语言平等”问题时就暴露得更明显了（记录第 171 页以及以下各页）。关于这一项，表决情况比讨论更能说明问题，把表决的次数统计一下，可以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数目——十六次！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就是：究竟是在党纲中只要指明全体公民不分性别等等以及语言一律平等就够了呢，还是必须指出“使用语言自由”或“使用语言平等”？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相当正确地估计了这一事件，他说：“关于党纲一项条文措词的小小争论，竟有了原则的意义，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半数代表都决心推翻党纲起草委员会。”正是如此<sup>①</sup>。引起冲突的

<sup>①</sup> 马尔托夫补充说：“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关于萝卜的挖苦话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害处”（当谈到使用语言自由时，仿佛有一个崩得分子列举各种机关而提到了养马场，

导火线确实很小，但是冲突毕竟具有真正的原则的性质，因而也就具有非常残酷的形式，直到有人企图“推翻”党纲起草委员会，直到猜疑有人想要“欺骗代表大会”（叶哥罗夫就是这样猜疑过马尔托夫的！），直到彼此……破口大骂，反唇相讥（第 178 页）。甚至波波夫同志也曾经“表示遗憾，认为一点小事竟造成这样紧张的气氛”（着重号是我加的，第 182 页），一连三次（第十六、十七、十八次）会议都充满了这种气氛。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肯定、明确地指出一件最重要的事实：充满“猜疑”和最残酷的斗争形式（“推翻”）的那种气氛（即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有人硬说是由于火星报多数派造成的气氛！），其实远在我们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前早就形成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这是一件基本事实，许多人往往由于不了解这件事实而产生一种极轻率的看法，认为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的多数派是人为的。从现在硬说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十分之九都是火星派分子的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由于一点“小事”，由于“小小的”导火线就会爆发具有“原则性质”并且几乎弄到推翻代表大会党纲起草委员会地步的冲突，这是绝对解释不通和绝对荒诞的。对“有过害处的”挖苦话用埋怨和表示遗憾的口吻来搪塞这件事，是令人可笑的。冲突是不会由于任何尖刻的挖苦话就有了原则意义的，只有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的性质才能决定

---

当时普列汉诺夫就自言自语地说：“马是不会讲话的，而驴子有时却会讲话”。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挖苦话特别温和、特别谦让、特别慎重和特别灵活。但我终于觉得奇怪的是，马尔托夫既然承认争论具有原则的意义，为什么完全不来分析这方面的原则性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暴露出怎样的色彩，却只限于指出挖苦话的“害处”呢。这才真是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呢！尖刻的挖苦话确实“在代表大会上有过很大的害处”，其中不仅对崩得分子说了挖苦话，还对那些有时受到崩得分子支持甚至由他们从失败危险中救出来的人说了挖苦话。但是，既然已经承认这一事件有原则的意义，那就不能用指出某些挖苦话“不可容许”（同盟记录第 58 页）的说法来搪塞。

这样的意义。不是什么尖刻话或挖苦话引起了冲突，——这些话只是表明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派别有“矛盾”，有引起冲突的一切前提，有一种依仗它的潜力，顺着每一个甚至小小的导火线爆发起来的内在分歧。

相反地，从我用来观察代表大会的观点（我认为我应该坚持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事件的某种政治见解，尽管有人觉得这种见解令人难堪）看来，由于“小小的”导火线爆发出十分剧烈的原则性的冲突，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可避免的。既然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时刻都有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斗争，既然在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既然这些不坚定的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共占三分之一的票数（8票+10票=51票中的18票，这当然是根据我的粗略计算），那末，火星派分子方面有一些人，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人分离出去，就势必使反火星派的方针有可能取得胜利，因而引起“疯狂的”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由什么过分尖刻的胡言乱语或者攻击引起的，而是由政治的分化引起的。并不是什么尖刻话造成了政治冲突，而是代表大会上的派别本身存在的政治冲突造成了尖刻话和攻击，——这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也就是我们和马尔托夫在估计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及其成果方面的基本的原则性意见分歧的地方。

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使很少数火星派分子脱离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重大事件共有三次，即使用语言平等、党章第一条和选举问题，这三次事件都造成了终于引起现在的党内严重危机的残酷斗争。为了在政治上了解这个危机和这次斗争，不应该只限于空谈什么有人讲过不可容许的挖苦话，而应该考察一下在代表大会上彼此发生冲突的各种色彩的政治派别。所以，“使用语言平等”事件对于说明分歧的原因是有双重作用的，因为马尔托夫当时还

是(还是!)一个火星派分子，并且几乎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起劲地攻击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

战争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崩得首领李伯尔同志的争论开始的(第171—172页)。马尔托夫证明只要提出“公民平等”的要求就够了。“使用语言自由”的要求被否决了，但是立刻有人提出“使用语言平等”的要求，于是叶哥罗夫同志就同李伯尔一起加入了战斗。马尔托夫说这是拜物教，“因为发言人坚决主张民族平等，而把不平等现象转移到语言问题方面。其实，问题正应当从另一方面来考察：民族不平等现象是存在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人失去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第172页)。马尔托夫当时说得完全对。的确，李伯尔和叶哥罗夫毫无理由地妄想为他们自己的说法作辩护，并且企图证明我们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实行民族平等原则，这真正是一种拜物教的态度。其实，他们正象“拜物教徒”一样坚持词句而不坚持原则，他们作事不是怕犯什么原则错误，而是怕别人议论。这种动摇心理(如果“别人”因这一点而责备我们，那怎么办呢?)，即我们在分析组织委员会事件时已经指出的心理，也就是我们的整个“中派”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的心。另一个中派分子，即与“南方工人社”密切接近的矿区代表李沃夫“认为边疆地区提出的关于压制语言平等的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党纲中必须规定关于语言的条文，以便完全消除别人对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主张俄罗斯化的猜疑”。请看这是多么美妙的说明问题“严重”的理由。问题所以很严重，是因为必须消除边疆地区可能表示的猜疑！这个发言人根本没有谈什么涉及到问题本质的话，根本没有回答别人提出的拜物教的指责，反而完全证实了这个指责，暴露出他们完全缺乏自己的论据，只是用边疆地区会怎么说做借口搪塞过去。当时有人对他说：他们可能说的话

都是不对的。而他并不去分析这句话究竟说得对不对，却回答说：“别人可能猜疑。”

这样一种装模作样地硬说问题非常严重非常重要的提法，却真正有了原则性质，不过这完全不是李伯尔之流、叶哥罗夫之流、李沃夫之流想找到的那种原则性质。当时成了原则性问题的就是，究竟我们应该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运用党纲上规定的一般的基本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于具体条件并在具体运用上加以发挥呢，还是因为害怕别人猜疑就应该用枝节的条文、局部的指示、重复的语句和烦琐的解释来充斥党纲的篇幅。当时成了原则性问题的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怎能把反对烦琐的解释的斗争看成（“猜疑”）想缩小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企图。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丢掉这种迷信烦琐解释的拜物教心理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由于“语言”问题引起斗争时产生的感想。

由于进行过好多次记名投票，所以在这个斗争中代表的派别划分特别明显。这样的表决一共有三次。始终拼命反对火星派核心的，有所有反火星派分子（八票）以及只有一些很小变动的整个中派（马霍夫、李沃夫、叶哥罗夫、波波夫、梅德维捷夫、伊万诺夫、察辽夫和别洛夫，——只有后面两个人起初表现动摇，时而弃权，时而投票赞成我们，直到第三次表决时才完全肯定了自己的态度）。火星派方面有一部分人，主要是高加索人（三个人共有六票）脱离出去了，于是“拜物教派”终于占了优势。在进行第三次表决时，当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们都已经十分确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时，脱离火星报多数派而转到敌对方面去的是一共拥有六票的三个高加索人，而脱离火星报少数派的是一共拥有两票的波萨多夫斯基和科斯提奇；在头两次表决中转到敌人方面或弃权的，在火星报多数派方面有连斯基、斯切潘诺夫和哥尔斯基，在火星报少数派方面则有

捷依奇。火星派方面有八票（从三十三票总数里）脱离出去，结果就使反火星派分子和不坚定分子的联盟占了优势。这就是代表大会派别划分的基本事实，这一事实在表决党章第一条以及在进行选举时也是再次出现的（不过当时脱离出去的是别的火星派分子而已）。怪不得那些在选举时遭到失败的人现在竭力想抹杀他们失败的政治原因，竭力想抹杀各种色彩之间斗争的出发点，而这个斗争却在全党面前更厉害地暴露了和更无情地揭露了那些不坚定的、政治上没有气节的分子。使用语言平等事件所以特别明显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个斗争，是因为当时连马尔托夫同志也没有博得阿基莫夫和马霍夫两人的夸奖和赞许。

## （六）土地纲领

反火星派和“中派”的不坚持原则，在讨论土地纲领时也表现得很明显，这次讨论占了代表大会不少时间（见记录第190—226页），并且提出了不少很有趣的问题。果然不出所料，马尔丁诺夫同志（在李伯尔和叶哥罗夫两位同志发表了小小的责难意见以后）就对纲领发动了进攻。他提出一个旧论据，硬说我们要求修改“历史上的这种不公平现象”就是间接地“尊崇历史上的另一些不公平现象”等。叶哥罗夫同志也拥护他的意见，说他甚至“不了解这个纲领有什么意义。提出这个纲领是为了我们自己遵循，即确定我们所要提出的那些要求呢，还是我们想使它成为大家欢迎的东西”（！？！？）。李伯尔同志“也想提出叶哥罗夫同志所提的意见”。马霍夫同志本着他所固有的坚决精神发言说，“大多数（？）发言人都根本不了解这个纲领是个什么东西，其目的何在”。据他说，这个纲领“很难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有一种

把修改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当儿戏的味道”，有“一种蛊惑人心和冒险主义的色彩”。而他用来证实这个深奥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惯用的夸张其词和简单化的手法，硬说火星派似乎“想把农民看作是成分一样的；既然农民早已〈？〉分化为几个阶级，所以提出单一的纲领，势必使整个纲领成为蛊惑人心的东西，一旦实行起来就会成为冒险行为”（第202页）。马霍夫同志在这里“说穿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对我们的土地纲领持否定态度的真正原因，他们虽然决心“承认”《火星报》（正如马霍夫本人也承认它一样），但是根本没有想过它的方针、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正因为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结构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所以他们始终不了解这个纲领，而决不是因为在个别细节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于是，反火星派首领（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和“中派”首领（叶哥罗夫和马霍夫），很快就在这个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上趋于一致了。叶哥罗夫同志又直爽地表现了“南方工人社”以及所有倾向于它的团体和小组的一个特点，即他们不了解农民运动的意义，不了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批有名的农民起义时期表现的弱点，不是过高估计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多半是过低估计了它的意义（而且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利用这个运动）。叶哥罗夫同志说，“我丝毫不象编辑部那样迷恋农民运动，在农民骚动以后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迷恋过。”只是可惜叶哥罗夫同志丝毫没有向代表大会确切地指明编辑部的这种倾向究竟表现在哪里，也丝毫没有具体地指出《火星报》所发表的文章。此外，他还忘记了，我们土地纲领的一切基本条文都是在《火星报》第三号<sup>①</sup>上，即在农民骚动很久以

---

① 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376—383页。——编者注

前就已经发挥了的。谁如果不只是口头上“承认”《火星报》，那他就不妨稍微多注意一下《火星报》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

叶哥罗夫同志感叹地说：“我们在农民中间绝不会有有多大作为！”随后他又说明这种感叹不是表示反对某一个别“倾向”，而是否认我们的整个立场：“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口号不能同冒险主义口号相竞争。”这真是把一切都归结为各政党口号“竞争”的非原则态度的最典型的说法！并且这还是在他自称已经对理论解释“表示满意”以后说出来的，在这种理论解释中指出：我们力求在鼓动工作中取得牢靠的成绩而不怕暂时的失利，但是要取得牢靠的成绩（不管那些“竞争者”……片刻的“竞争者”如何叫嚷），就非得有纲领的巩固的理论基础不可（第 196 页）。既然自称对这种解释已经“表示满意”，又立刻重复从旧经济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庸俗论点，认为“口号竞争”不仅可以解决土地纲领的一切问题，而且可以解决全部纲领以及整个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策略的一切问题，这是多么糊涂的观点。叶哥罗夫同志说：“你们决不能强迫雇农同富农一道为已经有不小一部分落到这些富农手里的割地而斗争。”

又是那一套显然同我们的机会主义经济派有血统关系的简单化的论调，经济派硬说，不能“强迫”无产者去为现在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资产阶级手里而将来还会有更大一部分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东西而斗争。又是那一套庸俗化的论调，忘记了俄国雇农和富农之间的一般资本主义关系的特点。现在，事实上受到割地重压的也有雇农，他们为摆脱奴役地位而斗争是根本不必“强迫”的。要“强迫”的只是某些知识分子。要强迫他们更广泛地看到他们担负的任务，强迫他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丢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强迫他们考虑到使我们的目的复杂化并改变形态的历史情况。正因为有一种认为农民是傻子的偏见，即如马尔托夫同志（第 202 页）公

正指出的，在马霍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对土地纲领的人们的发言中流露出来的偏见，所以这些反对者也就忘记了我国雇农生活的现实条件。

我们的“中派”分子把问题简单化到只认为工人和资本家是对立的，因而力图把自己的狭隘观点强加在农民身上。马霍夫同志说：“正因为我认为农民就其狭隘的阶级观点的限度来说是聪明的，所以我以为他们会拥护夺取土地和分割土地的小资产阶级理想。”这里显然是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一件事情是把农民的阶级观点估计为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另一件事情是缩小了这个观点，把它归结为“狭隘度量”。叶哥罗夫之流和马霍夫之流的错误正在于做了这种归结（也如马尔丁诺夫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的错误正在于把无产者的观点归结为“狭隘度量”一样）。其实，逻辑或历史都教导我们，正是因为小资产者的地位有两重性，所以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可能是比较狭隘，又比较进步。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农民狭隘（“愚昧”）或者受“偏见”支配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始终不倦地扩大农民的观点，促使他们用理智战胜偏见。

对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可以说在《火星报》旧编辑部的忠实卫士马霍夫同志那篇原则性演说的结论中集中地表现出来了。怪不得这些话博得了掌声……虽然是讽刺性的掌声。普列汉诺夫曾说，我们丝毫不怕土地平分运动，我们不会阻碍这个进步（资产阶级的进步）的运动。马霍夫同志听了普列汉诺夫这些话以后慷慨地说：“我真不知道要把什么东西叫作不幸；但是，这个革命即便可以称为革命，也会是一个不革命的革命。更正确些说，不是革命而是反动（笑声），类似骚动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将使我们倒退，并且要经过相当时间才可以使我们重新回

到我们现在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却有比法国革命时期更多得多的东西(讽刺的掌声),我们有社会民主党(笑声)……”是的,如果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按照马霍夫的观点看问题的,或者是由受到马霍夫之流支持的中央机关来主持的党,那倒真好笑呢……

可见,就是在讨论土地纲领所引起的一些纯粹原则性的问题时,也立即表现了我们已经熟悉的派别划分。反火星派分子(八票)为拥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而出马上阵;尾随在他们后面的“中派”首领们叶哥罗夫之流和马霍夫之流,总是陷在那个狭隘的观点里面出不来。所以很自然的,在表决土地纲领的某些条文时,赞成的有三十票和三十五票(第225页和第226页),就是说,恰巧是我们在争论崩得问题讨论的次序时、在组委会事件时以及在讨论《南方工人报》停刊问题时所看到的那个大概数目。每当问题稍微超出陈规,稍微要求把马克思的理论独立地运用于新的(对德国人来说是新的)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时,真正胜任的火星派分子立刻就只占五分之三的票数了,而整个“中派”就立刻转到李伯尔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同志却拼命抹杀这一明显的事,胆怯地回避那些显然暴露出各种色彩的表决情况!

从土地纲领问题的讨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火星派分子同在代表大会上足足占有五分之二的人进行斗争的情况。高加索的代表在这里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这也许多半是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无数农奴制的残余的各种表现,所以他们不赞成马霍夫之流觉得满意的那套抽象而幼稚的简单对立法。当时发言反对马尔丁诺夫和李伯尔,反对马霍夫和叶哥罗夫的,有普列汉诺夫,古谢夫(他证实说,“对我们的农村工作所持的这种悲观看法”……即叶哥罗夫同志的那种看法……他“常常在俄国境内工作的同志中间听到过”),柯斯特罗夫<sup>14</sup>,卡尔斯基,还有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正确地

指出，土地纲领的批评者的“各种忠告”“是十分庸俗的”。不过我们在谈到研究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派别问题时必须指出，他的演说（第 208 页）把朗格同志同叶哥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相提并论却不一定正确。谁如果仔细地读一读记录就能够看出，朗格和哥林两人所站的立场跟叶哥罗夫和马霍夫两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朗格和哥林两人不喜欢关于割地一条的提法，但是他们完全领会我们土地纲领的思想，不过他们企图用另一种方式体现这个思想，积极努力找寻在他们看来更为完善的提法，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来说服土地纲领的起草人，或是站在土地纲领起草人方面反对所有的非火星派分子。例如，只要把马霍夫关于否决全部土地纲领的提议（第 212 页，九票赞成，三十八票反对）以及关于否决这个纲领的个别条文（第 216 页等）的提议，拿来和朗格对割地条文提出独立的修订方案（第 225 页）的立场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种立场是截然不同的①。

托洛茨基同志在继续谈论那些有“庸俗气味”的理由时指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时期，我们应当同农民联系起来”……“在这个任务面前，马霍夫和叶哥罗夫的怀疑态度和政治‘远见’比任何一种近视要更有害”。另一个火星报少数派分子科斯提奇同志，很准确地指出了马霍夫同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坚持原则的态度”，——这个估计真是一针见血地打中了我们的“中派”的要害。科斯提奇同志继续说，“马霍夫同志的悲观态度是跟叶哥罗夫同志一致的，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色彩。马霍夫同志忘记了，社会民主党人现时已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已在可能范围内领导农民运动。而他们却用这种悲观态度来缩小我们工作的规模”。（第 210 页）

---

① 参看哥林的演说，第 213 页。

在快要谈完代表大会讨论纲领问题的情形时，还应该指出关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简短辩论。我们的纲领说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sup>15</sup>。看来，这个限定语句，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支持的究竟是哪些反政府派别。然而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各种不同色彩在这里也立即暴露出来了，本来很难设想在这样一个已经再三说明过的问题上还会发生“疑问和误解”！显然，并不是由于什么误解，而是由于有各种不同的色彩。马霍夫、李伯尔以及马尔丁诺夫立刻就惊惶不安了，结果又落到了“紧密结合的”少数的地位，马尔托夫同志大概认为这也是由于有人进行阴谋、倾轧、玩弄权术以及其他种种卑鄙手腕（见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而那些不善于思考形成“紧密结合的”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政治原因的人就惯于诉诸这些东西。

马霍夫又是从庸俗地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开始。他说“我国唯一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接着他从这个正确的论点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其余的阶级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全场大笑）…… 是的，它们是无关紧要的，只是想来利用一下机会而已。我反对支持它们。”（第 226 页）马霍夫同志对自己立场作的这种绝妙的叙述，使许多人（他的许多同道者）都感到难为情，但是实质上，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两个人和他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提议删掉“反政府派的”字样，或者添上“民主的反政府派”字样加以限定。普列汉诺夫对马尔丁诺夫的这个修正作了公正的反驳。他说，“我们应当批判自由派，揭露他们的不彻底性。这是对的…… 但是我们在揭露一切非社会民主运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时，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同专制制度比较起来，就连不保证普遍选举制的那种宪法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无产阶级不应当保留现存制度而舍弃这种

光法。”马尔丁诺夫、李伯尔和马霍夫三位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维尔、托洛茨基，还有普列汉诺夫的第二次发言，都抨击了这种立场。马霍夫同志在这里又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起初他说，其余的阶级（除了无产阶级以外）都是“微不足道的”，并且说，他“反对支持它们”。后来，他又发慈悲心承认说，“资产阶级实质上虽然是反动的，但往往又是革命的，例如，在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的时候”。他又愈改愈糟地说，“可是，有些集团始终（？）是反动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的”。请看，后来拼命拥护旧编辑部的那些“中派”首领竟在原则方面发表了怎样的妙论！正是手工业者，甚至在行会制度十分盛行的西欧，也如同城市中其他小资产者一样，在专制制度崩溃时代起过特殊的革命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加思考地重复西欧同志关于距专制制度崩溃时代一百年和五十年之久的现代手工业者所讲的那些话，是特别荒谬的。在俄国，硬说手工业者在政治问题上比资产阶级反动，只不过是背诵一些陈词滥调而已。

可惜，记录完全没有写明马尔丁诺夫、马霍夫和李伯尔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已被否决的修正案所得到的票数。我们能指出的只是，反火星派分子的各个首领和“中派”的一个首领<sup>①</sup>在这里也结成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反火星派分子的派别。在总结对于纲领的全部讨论经过时，不能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哪一次比较热烈和引

---

① 该派即“中派”的另一个首领叶哥罗夫同志，在另一个地方讨论到阿克雪里罗得所提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时，发表了他对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意见（第359页）。叶哥罗夫同志认为：在纲领上既要求支持任何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派持否定态度，这是个“矛盾”。叶哥罗夫同志在这里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稍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问题的，但同样暴露出他也象马霍夫、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三位同志那样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他“所承认的”）《火星报》的立场采取了不坚定的、半敌视的态度。

起普遍兴趣的辩论不是暴露出马尔托夫同志和《火星报》新编辑部现在力图掩饰的那些色彩的区别。

### (七) 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

代表大会在讨论了纲领问题以后，接着就讨论党章问题（我们把前面提到的中央机关报问题以及各地代表所作的报告撇开不谈，可惜大多数代表的报告都作得不能令人满意）。不用说，党章问题对于我们大家都有重大的意义。要知道，《火星报》从创办时起就不仅以一个报刊机关，而且以一个组织细胞进行活动的。《火星报》在第四号专论（《从何着手？》）中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组织计划①，并且三年来始终一贯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说明这个决议的三条理由中（第147页）有两条正是谈到《火星报》的这个组织计划和组织思想：《火星报》在领导党的实际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统一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所以很自然，如果一定的组织思想得不到全党承认，没有正式规定下来，《火星报》的工作和组织党即事实上恢复党的全部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了。而党的组织章程就应当完成这个任务。

《火星报》所力求奠定的作为党组织的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个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从原则

---

① 波波夫同志在关于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演说中还说过：“我现在回想起《火星报》第三号或第四号上所发表的《从何着手？》一文。许多在俄国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它是不妥当的，另一些人觉得这个计划是个幻想，而大多数人（大概是波波夫同志周围的大多数人）则说这不过是好大喜功而已。”（第140页）读者可以看出，这种把我的政治观点解释成好大喜功的说法，这种现在又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煽起的说法，我早已听惯了。

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的组织问题的方法。第二个思想——即承认进行思想领导的机关报的特殊作用——正是估计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在革命进攻的最初根据地建立在国外这种条件下的暂时的和特殊的需要。第一个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第二个思想是由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产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火星报》的这两个建党的基本思想，我在《火星报》（第4号）专论《从何着手？》<sup>①</sup>一文以及《怎么办？》<sup>②</sup>一书中已经发挥过了，后来我在《给一个同志的信》<sup>③</sup>中用几乎是党章的形式又详细作了解释。其实，只要做一些修订工作就可以规定党章的条文，因为，如果承认《火星报》不是一纸空文，不只是句应酬话，那末党章正应当把这些思想体现出来。我在《给一个同志的信》一书再版的序言中已经指出：只要把党章和本书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和那里谈的组织思想是完全一致的<sup>④</sup>。

讲到党章上《火星报》的组织思想的条文的修订工作时，我要提到马尔托夫同志所掀起的一次事件。马尔托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你们考证事实时，就知道我的这一条（即第一条）条文陷入机会主义立场是如何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我曾经把我的草案给列宁看过，那里把第一条叙述得同我后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一模一样。当时列宁表示反对我的草案，说这个草案写得太详细了，并且说，他只喜欢第一条的思想，即关于党员的定义，他说要把这个思想用另一种

①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20—389页。——编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04—221页。——编者注

④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17—118页。——编者注

形式吸收到自己的党章中，因为他觉得我的条文不妥当。可见，列宁早就知道我的条文，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你们可以看出，我是光明磊落地去参加代表大会的，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曾经预先声明，我要反对相互补选，反对在补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委员时采取一致同意的原则，等等。”（第 58 页）

关于预先声明反对相互补选一事，我们在一定的地方就会知道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现在我们要谈一谈马尔托夫的党章中的这种“光明磊落”。马尔托夫在同盟里靠记忆叙述他那个不妥当的草案的插曲时（马尔托夫本人在代表大会上曾把这个草案当作不妥当的草案收回了，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又本着他所持有的一贯精神把它重新拖了出来），又是照例忘记了许多事情，因而又把问题弄模糊了。看来，已经有很多事实足以告诫大家不要引用私人谈话和凭靠本人记忆（有人总是不由得只记起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来说明问题，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终于因为没有别的材料好用就利用了恶劣的材料。现在甚至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学起他的样子——大概是近墨者黑吧。

马尔托夫草案第一条的“思想”是不能使我“中意”的，因为他的草案中根本没有后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那种思想。是他记错了。我侥幸在纸堆中找到了马尔托夫的草案，那里“第一条叙述得恰巧跟他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不一样”！请看这就是“光明磊落”！

马尔托夫草案第一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并且在党的机关（原文如此！）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我的草案第一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党员。”

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两相对比一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尔托夫的草案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而只是泛泛空谈。至于说党员应当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这样的，只有爱说空话，爱在“章程”中堆砌大量空洞的词句和官僚主义的（就是说，对事业不需要，只有在装饰门面时才似乎需要的）公式的人，才会这样说。第一条的思想只有在这样提出问题时才会产生：党的机关实际上能不能对那些不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党员进行领导呢。这种思想在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中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所以我也就无法知道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对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看法。可见，马尔托夫同志所作的事实考证竟是一笔糊涂账。

相反地，对马尔托夫同志正应该说，他从我的草案中“知道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且他无论在编辑委员会里——虽然我的草案在代表大会以前两三个星期就给大家看过了——无论在那些仅仅看过我的草案的代表面前，都没有抗议和反驳过我的这种看法。不但如此，甚至在代表大会上，当我提出自己的党章草案<sup>①</sup>

① 顺便说一下。记录委员会在第十一号附录上刊载了“由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第393页）。记录委员会在这里也搞错了一些事情。它把我交给全体代表（并且是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给很多代表）的最初的草案（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31—432页。——编者注）和我后来提交代表大会的草案混为一谈，并把第一个草案当作第二个草案刊载出来了。我当然丝毫不反对别人把我的草案，哪怕是所有各个准备阶段的条文一概公布出来，但是制造混乱毕竟是不应该的。而混乱终于造成了，因为波波夫和马尔托夫（第154页和第157页）批评我实际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草案中的那些粗略法，原来是记录委员会刊载出来的草案中所没有的（参看第394页第七条和第十一条）。如果对待问题比较仔细，那只要把我刚才指出的一些页数对照一下，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错误了。

并在选举党章起草委员会以前为这个草案辩护时，——马尔托夫同志还直截了当地声明：“我赞同列宁同志的结论。只是在两个问题上我和他有意见分歧”（着重号是我加的）——即关于总委员会组成的方法和一致同意补选的问题（第 157 页）。这里对党章第一条条文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却只字未提。

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关于戒严状况的小册子里，居然又把自己的党章草案再一次并且特别详细地重提了一下。他在这本小册子里硬说，他的党章草案，——对于这个草案，除了某些次要的细节以外，他现在（1904 年 2 月，——不知道过两三个月以后又会怎样）还是完全同意的，——“充分表明了他对于过分集中制的否定态度”（序言第 4 页）。这个草案之所以没有提交代表大会讨论，据马尔托夫同志现在解释是因为：第一、“《火星报》的教育启示了他对章程持藐视态度”（当马尔托夫同志喜欢这样做时，他就不把《火星报》字样看作狭隘的小组习气，而看作最坚定的方针了！可惜三年来的《火星报》的教育没有启示马尔托夫同志对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在为自己违背共同通过的党章的行为辩护时惯用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词句持藐视态度）。第二、原来是因为他马尔托夫同志，力求避免“在《火星报》这样一个基本组织核心的策略中加进任何杂音”。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呵！在关于党章第一条机会主义条文或关于过分集中制的原则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害怕杂音（只有从最狭隘的小组观点来看才是可怕的杂音），甚至在编辑部这样一个核心面前都没有提出自己的分歧意见！在谈到关于中央机关成员的实际问题时，马尔托夫同志却逃避《火星报》组织（这个真正的基本组织核心）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去向崩得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求救。马尔托夫同志暗中用小组习气替冒牌编辑部辩护，责备最了解情况的人在估计问题时似乎表现了“小组习气”。他的

这种言论分明带有一种“杂音”，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竟看不见这一点。为了惩诫他，我们现在把他那个党章草案全部引证出来，并指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观点和什么样的过分地方<sup>①</sup>：

“党章草案。——(一)党员。(1)凡是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党员如果违反党的利益，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开除其党籍。[说明开除理由的决定书，应保存在党的档案库，并须根据每个党委员会的要求而通知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议，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员会要求时，可以提交代表大会申诉]”……我打算用方括弧来表明马尔托夫草案中那些显然没有什么意思的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肯定的条件或要求，——例如在《党章》中绝妙地指明决定书究竟要保存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议（而不是它的一切决议和任何决议吗？）可以提交代表大会申诉。这正是过分玩弄词藻或十足的官僚形式主义，专门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显然只能耽搁问题的条款。“……(二)地方委员会。(3)党委员会是党在地方工作中的代表……”（真是新颖而又聪明呵！）“……(4) [凡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存在的并派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委员会，都可以认为是党的委员会]。(5)除了第四条指出的委员会以外，新的党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会或者承认该地方组织的现有成员为委员会，或者用改组该地方组织的办法来组成地方委员会]。(6)委员会用补选的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7)中央委员会有权用相当数量的同志（它所了解的同志）补充地方委员会的名额，人数不得超过该委员会原有名额总数的三分之一……”好一个典型的官样文章：为什么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呢？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根本起不了限制作用的限制——因为补充是可以重复许多次的——究竟有什么意思呢？“……(8)[如果地方委员会自行瓦解或者遭到破坏”（就是说不是全体被捕吗？）“中央委员会应当把它恢复起来”]……（已经不考虑第七条了吗？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觉得第八条和敕令平日工作而节日休息的俄罗斯品行法相似呢？）“……(9) [党的定期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中央委员会改组某个地方委员会，如果该地方委员会的活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利益的话。在这种

① 我要指出，可惜我找不到马尔托夫草案的第一种稿本，这种稿本共有四十八条，其中有几条有更“过分的”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

情况下，该委员会就可认为已被解散，而该委员会所属地区的同志可以不受其管辖①”]……本条所规定的规则，同迄今俄罗斯法律中规定的所谓“禁止人人酗酒”的条文一样，是大有好处的。“……(10)【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该地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并尽力协助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实现它所担负的全党的任务。】……”咳！试问这究竟有什么意思呢？(11)【“地方组织的内部规则，委员会和它所属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该集团的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难道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不是一回事吗？)“由委员会自行规定并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有一个缺点：没有说明这种报告应当保存在哪里)……“(12)【委员会所属的各集团和各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们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和愿望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13)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从自己的收入中按中央委员会分配的款数缴给中央会计处。(三)建立用其他语言(除了俄语以外)进行鼓动的组织——(14)【为了用某种非俄罗斯语言进行鼓动并把有关的工人组织起来，可以在特别需要把鼓动工作专门化并把这种组织划分出来的地方成立单独组织】。(15)至于是不是真有这种需要，这个问题由党中央委员会解决，如果发生争论，则提交党代表大会解决……”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章程后面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条的第一部分是多余的，而关于发生争论情况的第二部分，简直是滑稽可笑的……“(16)【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在其特殊事务方面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在地方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并受其管辖，这种监督的形式以及该委员会和该特殊组织之间的组织关系的标准，由地方委员会规定……”(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看出所有这些一大堆话都是十分无聊的废话。)“……在党的一般事务方面，这种组织应当作为委员会组织中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工作。】(17)【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可以成立自治联盟，以便顺利地执行它的特殊任务。这种联盟可以有自己专门的报刊机关和领导机关，但这种报刊机关和领导机关都应当受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这个联盟的章程可以自行规定，但是必须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批准。】(18)【如果党的地方委员会根据地方条件多半是用当地语言进行鼓动工作时，也可以加入第十七条所规定的自治联盟。附注：这种委员会虽然是自治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因此不

---

① 我们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注意这个字眼。这还了得！你看这就是甚至……甚至竟敢更换编辑部成员的那种“雅各宾主义”的根源……

成其为党委员会了”]……(整个一条都是非常有益处和非常聪明的，附注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凡是加入自治联盟的地方组织同该联盟中央机关之间的一切联系，都应当受地方委员会的监督。〕(20)〔各自治联盟的中央报刊机关和领导机关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四)党中央委员会和报刊机关。(21)〔党中央委员会和报刊机关——政治的报刊机关和科学的报刊机关——是全党的代表。〕(22)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全部实际活动实行总的领导，关心正确使用和正确配备全党的一切力量，监督全党各部分的活动，把报刊发给各地方组织，建立党的技术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23)党的报刊机关负责对党内生活进行思想领导，宣传党纲，用科学的和评论的方法阐明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24)所有党的地方委员会和自治联盟都同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编辑部发生直接联系，并定期报告本地的运动和组织工作情况。(25)党的机关报编辑部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26)〔编辑部在其内部事务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并且能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补充和更换自己的成员，但每次都必须通知中央委员会。(27)所有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声明或者经它批准的声明，都应当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刊载。(28)党中央委员会经党机关报编辑部同意后，可以成立专门从事某种文字工作的著作家团体。(29)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中央委员会可以用补选办法(人数不限)补充自己的名额，但每次都必须通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五)国外的党组织。(30)国外的党组织主管党在国外侨民中的宣传工作并组织其中的社会主义分子。国外的党组织由它们选出的领导机关领导。(31)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可以在国外设立自己的支部，以便协助执行联盟的专门任务。这些支部以自治团体的资格加入总的国外组织。(六)党代表大会。(32)党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机关。(33)〔党代表大会规定党纲、党章以及全党活动的指导原则；监督各级党机关的工作并处理它们之间发生的冲突。〕(34)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列组织和机关选派：(甲)党的各地方委员会；(乙)所有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丙)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丁)国外的党组织。(35)代表委托书可以转托，但是每一个代表至多只能拥有三张代表委托书。两个代表可以拥有一张代表委托书。不准使用限权代表委托书。(36)中央委员会如果认为吸收某同志参加代表大会有益处时，可以邀请该同志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37)凡是有关修改党纲或党章的问题，须经出席代表总

人数的三分之二的多数表决时才能解决；其他问题则按普通多数表决来解决。（38）代表大会只有在出席的代表能代表半数以上的现有的党委员会时，才可以认为有效。（39）代表大会应当尽可能每两年召开一次。〔凡因某种不以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障碍不能如期召开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延期举行。〕

读者如果能用极大的耐性读完这个所谓党章，大概就不会要求我们专门分析以下几个结论吧。第一个结论：这个章程染上了难以医治的水肿病。第二个结论：这个章程根本没有什么对过分集中制持否定态度的特别色彩的组织观点。第三个结论：马尔托夫同志把自己章程中的三十九分之三十八以上的东西都瞒过世人的耳目（并且不许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是作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居然把这种隐瞒行为称为“光明磊落”。

#### （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 集中制问题的讨论

在没有谈党章第一条这个确实有趣并且显然表明各种色彩的观点存在的问题以前，我们还要稍微谈一下关于党章问题的简短的一般讨论，这次讨论占去了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的全部时间和第十五次会议的部分时间。这次讨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是在《火星报》组织还没有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完全分离以前进行的。相反地，后来那些一般关于党章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补选问题的讨论，都是我们已经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发生分离以后进行的。自然，在尚未发生分离以前，我们还能比较公正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能比较不计较我们大家所关心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表自己的意见。前面我已经指出，马尔托夫同志当时

赞成(第 157 页)我的组织观点，只不过声明在细节上有两个分歧意见。相反地，不论是反火星派或“中派”，都群起攻击《火星报》的整个组织计划(也就是整个党章)中的两个基本思想：既反对集中制，也反对“两个中央机关制”。李伯尔同志把我的党章称为“有组织的不信任”，把两个中央机关制看作分权制(同波波夫和叶哥罗夫两位同志一样)。阿基莫夫同志主张扩大地方委员会的权限，尤其是要给以自行“改变自己成员的权利”。“必须给以更大的活动自由…… 地方委员会应当由当地积极的工作人员选出，正如中央委员会是由俄国所有积极组织的代表选出一样。如果这也不许可的话，那末就要把中央委员会指派到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名额限制一下……”(第 158 页)。可见，阿基莫夫同志在那里提出了反对“过分集中制”的理由，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没有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而跟着阿基莫夫跑，所以他对这些权威性的指示还是充耳不闻的。甚至当阿基莫夫同志把马尔托夫同志自己那个章程的“思想”(第七条——限制中央委员会指派委员加入地方委员会的权利)讲给他听时，他还是置若罔闻的！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不愿意唱出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杂音”，所以他也就忍耐了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他本人意见不一致的杂音…… 当时发言攻击“可怕的集中制”的只有那些觉得《火星报》主张的集中制对他们虽然不利的人，即阿基莫夫、李伯尔和哥里德勃拉特，小心翼翼地(所以如此，是为了随时可以向后转)跟着他们走的有叶哥罗夫(见第 156 页和第 276 页)等等。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都明白，崩得、“南方工人社”等等正是根据那种狭隘的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顺便说一下，现在党内大多数人也看得很清楚，《火星报》旧编辑部正是根据那种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

例如拿哥里德勃拉特同志(第 160—161 页)的演说来说吧。

他拼命攻击我所主张的“可怕的”集中制，说这种集中制是要导致下级组织的“消灭”，“完全是想使中央机关有无限大权来随意干预一切”，而各级组织“只有权驯顺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等等。“按照这个草案组织起来的中央机关将是孤独的，它周围不会有任何外围，只有一些无定形的散漫人群，而它那些唯命是听的代办员就会在这个散漫人群中进行活动。”这也就是马尔托夫之流和阿克雪里罗得之流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用来款待我们的那套虚伪空话。人们曾讥笑崩得，因为它一方面反对我们的集中制，同时又使自己那里的中央机关拥有更明确规定了的无限权利（例如，任意吸收党员和开除党员，甚至不许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人们了解了问题真相以后，也会嘲笑少数派的嚎叫，因为他们自己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大声疾呼地反对集中制和党章，而现在当他们占了多数时，立刻就又按党章办事了。

在两个中央机关制的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了派别划分：反对所有火星派的有李伯尔，有阿基莫夫（他首先唱出了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爱唱的调子，说总委员会内中央机关压倒了中央委员会），有波波夫，还有叶哥罗夫。根据旧《火星报》一向发挥的（而且是波波夫之流和叶哥罗夫之流的同志们在口头上赞成过的！）那些组织思想，自然要产生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计划。旧《火星报》的政策，是同“南方工人社”主张创办一个平行的通俗机关报并把它变成事实上占主要地位的机关报的计划截然相反的。这就是当时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泥潭派主张一个中央机关，即主张似乎更厉害的集中制的那种初看起来很奇怪的矛盾现象的根源。当然也有（特别是泥潭派中间）一些代表，未必清楚地了解“南方工人社”的组织计划将会引起，并且由于客观进程一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但是他们那种优柔寡断和毫无自信的天性，把他们推到反火星

派方面去了。

在火星派分子当时(在火星派尚未分裂以前)参加党章问题争论的发言中，马尔托夫(“赞成”我的组织思想)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发言特别值得注意。托洛茨基当时回答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时说的每一句话，都彻底揭露了“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和理论的全部虚伪实质。“他〈阿基莫夫同志〉说党章规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限不够确切。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恰恰相反，党章对这一点规定得很确切：既然党是一个整体，那就必须保证它对地方委员会的监督。李伯尔同志用我所用过的字眼说，党章表明‘有组织的不信任’。这是对的。但是，我用这个字眼是指崩得代表所提出的那个章程，因为他们的章程是意味着党内一部分人对全党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而我们的党章〈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还没有遭到失败时，这个章程还是“我们的”！〉则意味着党要对它的各个部分都表示有组织的不信任，就是说，要对各地方组织、各区组织、各民族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实行监督。”(第158页)是的，我们的党章在这里被估计得很正确，我们奉劝现在那些公然说“有组织的不信任”制度或所谓“戒严状况”制度是由阴险毒辣的多数派发明和实行的人多回忆一下这种估计吧。只要把上面引用的演说和他们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政治上毫无气节的典型事实，即马尔托夫这伙人怎样从有关他们自己的下级团体还是有关别人的下级团体出发而改变自己的观点。

### (九) 党章第一条

上面我们已经引用了在代表大会上引起热烈的有趣的争论的

不同条文。这种争论几乎占了两次会议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记名投票结束的（我记得，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似乎只举行过八次记名投票，由于这种记名投票花费时间太多，所以只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问题无疑是带原则性的。代表大会对于争论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这是我们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现象，这也证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试问，争论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相信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一条的分歧）有决定全党生死存亡的严重意义。我们决不会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第 250 页）<sup>①</sup>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揭露出各种原则上的色彩，但是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竭力寻求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末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种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意见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末这种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一条问题引起的比较不太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特别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上）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报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455 页。——编者注

这个联盟直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根本的主要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器皿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器皿本来可以用绳子把它捆紧（而不是用绞索弄裂，就象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疯狂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但是也可以想方设法使这个裂缝扩大，以至弄裂这个器皿。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局就是后一种情况。对党章第一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非常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

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一条问题已经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的派别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该确切地认识到早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就已经暴露或者开始暴露出来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真实性质。现在，在读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条文，象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第333页），表明他的（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者象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同盟记录第102页以及其他各页），表明他（或者他们）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诺夫拥护的我的条文，表明我在集中制问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昏愦刚愎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就是这样。在切实讨论那些赞成和反

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件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夸大一点的话）是历史行程决定的这种问题的提法。

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个发言，即叶哥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明白，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难以认清一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根本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拿那个大名鼎鼎的“大学教授”的例子作开场白就是很恰当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说，党应当是组织<sup>①</sup>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末，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容纳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

---

① “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一些细胞。广义的是指这种细胞团结成一个整体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指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的，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了。

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不清地搞到党内。这样的混淆不清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sup>16</sup> 和“民意党”<sup>17</sup>）为例，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自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谈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党”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七十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该仿效七十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使“混乱状态中的分子”得到党员的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为了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彻底引伸出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应当更进一步地说：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承认这个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

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末他们为什么又不把这位教授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适应，才不致成为空话（而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就是这样的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末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重要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了。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究竟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应当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应当扩大和增加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可以满足于所谓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继续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一部分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些党员的人抛到大门以外”。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说法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处的。所谓“抛到大门以外”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字样，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只有已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末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难道不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吗。如果说所谓抛到大门以外，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地，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则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显然绝对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

淆起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即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虽然不十分积极可是自觉地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其实他的说法正是犯了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根本就是我们的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是只有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做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所不同，所以必须区别他靠近党的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完全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那就是马尼洛夫<sup>18</sup>精神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的积极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其实就是漠视和遗忘的表现。

拿我们是阶级的党做借口来为组织的涣散状态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丁的错误，因为他“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

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一书第 91 页）①。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出来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过几十次了。“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人实行监督，这不是一句空话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都能够自作主张地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 239 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使他的错误变得更加荒谬，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之流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当然是对此表示高兴的，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各种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个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量齐观，那末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末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以为当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不熟练的极广大工人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倍受压迫、愚昧无知的时候，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那末我们就是安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331 页。——编者注

命意向同把每一个罢工者宣布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因为我们事实上是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是或者真正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之流才能由此做出结论说我们在口头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量齐观。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篇演说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大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 239 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它由广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仅是不容置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硬说列宁想以“密谋者的总和来限制全体党员的总和”。当时做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萨多夫斯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发言附和这个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一条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诫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型和色彩的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起，一直到非常广泛、自由、松散的组织止。”（第 240 页）<sup>①</sup>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了。但是，在日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往后拉，这就有必要“重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454 页。——编者注

提旧事”了。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个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

……“阿列克谢也夫、梅什金、哈尔土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始终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始终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sup>①</sup>。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该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该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这种组织内积极工作……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对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有这种初步了解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越广泛，我们对于它们的影响也就会越广泛，而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并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第 86 页）<sup>②</sup>顺便说一下，为了估计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至于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对于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318 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 324—325 页。——编者注

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了工会运动的范围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是使涣散和动摇分子自由地涌进社会民主党内。在汉堡做包工的石匠掀起有名的事件<sup>19</sup>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具体解决过这种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上城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决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混为一谈的要求，把对个别工会的个别步骤的责任加在党的身上的要求。党应当并且一定力求用自己的思想影响行业工会，使工会服从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完全自觉和政治上不完全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在各地普遍地组织起来，使它们担负各种不同的任务；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第 96 页）<sup>①</sup>从这种考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提醒我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大工人组织围绕起来这一说法是很不恰当的。我在《怎么办？》一书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个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

---

① 见《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336 页。——编者注

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中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上、发展上和斗争能力上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 工厂分委员会应当通过各种小组（或者代办员）力求掌握整个工厂，掌握尽量多的工人…… 一切集团、小组、分委员会等等都应当和委员会的机构或分部列于同等的地位。其中一些将公开声明愿意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一经委员会批准就可以加入，在委员会的委托或者同意下担负一定的工作，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一切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的直接的候补者，等等。另一些不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应当和党员建立的各种小组或者接近党的某一个集团的小组列于同等的地位，等等。”（第 17—18 页）<sup>①</sup> 从我加着重号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一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个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往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是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必须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知道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员。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提出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不一定要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一两个党员参加的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有时甚至完全不应该知道这一两个人是党员，等等。”（第 18—19 页）<sup>②</sup>

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光明磊落”问题的材料！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组织的关系，而我

---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213、215、216 页。——编者注

<sup>②</sup> 同上，第 216 页。——编者注

几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说过，一部分组织应该入党，另一部分组织不应该入党。在《给一个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些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各组织的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它们的秘密程度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也认为其他阶级中某些分子在一定条件下会参加这些工人组织的）。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在我看来，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地，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界限不清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使“称号”广泛散布而已。它的害处却能够造成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的涣散组织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大略地看一看代表大会后来讨论党章第一条的情况。勃鲁克尔同志发言（这一点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同我的联盟是跟阿基莫夫同志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勃鲁克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全部精神”（第 239 页），但是他拥护我所提出的条文，认为这是工人事业派分子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础。勃鲁克尔同志当时还不知道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采用害处比较少的办法：勃鲁克尔同志没有觉察到，在我们代表大会这样的会议上为民主制辩护，是白费力气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认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第 252

页)。他继续说，“我和勃鲁克尔，想挑选一个不大能达到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释说，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即建立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而且是有害的”；所以他象马尔丁诺夫同志<sup>①</sup>一样，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245页)一般讲来是很有趣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职务，就有可能考察它”(第245页)。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可能有两种解释：(1)凡是在党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之下经常亲自援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自己”(这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的话)是党员；(2)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领导之下经常亲自援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一种解释

---

① 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这两个名词有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给我们说明。马尔丁诺夫同志“装模作样地”说，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一书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一书(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95—115页。——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攻击的那些人不认为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不认为需要这种组织一样。

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博得了李伯尔之流、阿基莫夫之流以及马尔丁诺夫之流的衷心同情。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督和领导“每个罢工者”只能是“象征性地”谈一谈。正因为如此，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立刻就滚到第二种解释（不过，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被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因为代表大会否决了科斯提奇的决议案<sup>20</sup>，第 255 页），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们担负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成千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提到的大学教授，委托给李伯尔同志和波波夫同志所关心的中学学生（第 241 页），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指出的革命青年（第 242 页）。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种死板的字句和空洞的词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只有利于那些“渗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拥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纪律性和组织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参看考茨基论知识分子的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萎靡、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

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中，并不象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与拥护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人发生冲突。

波波夫同志说：“在各地，在彼得堡也如在尼古拉也夫或敖德萨一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有几十个散发书刊和进行口头鼓动的工人都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面，但是不能看作组织中的成员。”（第 241 页）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呢？这始终是波波夫同志没有说明的一个谜。上面我引证了《给一个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说明把所有这些工人编到（是数以百计，而不是数以十计）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入党。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列宁认为党内除了党组织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么组织。（完全对啊！）反之，我却认为这样的组织应当存在。实际生活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殖这些组织，以致我们来不及把它们一一纳入我们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体系中。”这个说法在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1）“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组织，要比我们所需要的，要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2）我们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命家组织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工人组织在内的体系。“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织。可是，勃鲁克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原文如此！）一定会如愿以偿，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留在党外，就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因此，勃鲁克尔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宁的意见。”请看，这真

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呢！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毫无主见而专以别人的议论为转移的人（见组委会事件）组成，那“实际生活”就真正会“如愿以偿”的，就是说，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优势（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尔托夫同志援引“繁殖”不可靠的分子的“实际生活”，正是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他继续说，“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不一定使它变成党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列入党组织中了”……请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糊涂到什么程度：接收入党的非党组织！请看一看他的方案吧：党 = (1) 革命家组织，+ (2) 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 (3) 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组织），+ (4) 执行各种职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学生等等，+ (5) “每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组成一个组织（!!），我们能够并且应该组成一个党。”（第 241 页）是的，当然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组成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组织起来。既说“组成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字来掩盖的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结果不过是一句空话。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和群众之间有许多组织的意图”。恰恰相反。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

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进大家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区分开来，而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sup>①</sup>。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十足的真理！〉，甚至自命为党的一部分”……这就根本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命为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下一道命令禁止”小组“自命为”整体的“一部分”，那末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文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得更荒谬了；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

①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 59 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一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末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烟消云散了。而我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的思想是要推动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该加入党根本是个可笑的问题，因为对于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是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了。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中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了）。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容许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学生”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先天弱点，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用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掩饰这个弱点。

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一条是根本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sup>(1)</sup>及其任务背道而驰的。”（第243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根本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背道而驰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拚命拥护这个理论。

必须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现在想把这个显然有<sup>机会主义</sup>倾向的错误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在代表大会上反而表示愿意“磋商”，他说：“但是我发现，我原来敲的是敞开的大门（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现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志既然承认外围小组是党组织的一部分，也就是迎合了我的要求（不仅承认外围小组，而且还承认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参看记录第242页所载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和《给一个同志的信》里引证的一些话），剩下的还有个别人，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磋商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一般说来，我并不反对磋商，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等等，我是决不会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末我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一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上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制定党章很久以前，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这样解释过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什么<sup>机会主义</sup>的论断<sup>(1)</sup>和“无政府主义”的观

---

<sup>(1)</sup> 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扎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248页和第346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

念”，但是在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中这一切显然都是俱全的。

我在引号内最后引用的那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说的。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作无政府主义思想。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不只是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不仅对于那些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并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的相当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否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炼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根源愈深，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根源”作为理由未为开门接纳机会主义的条文辩护，未免是十足的尾巴主义了。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已经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用来表示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表示不信任）的组织形式尚嫌薄弱松懈的情形辩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能够更容易地自行列入〈着重号是我加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棱两可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末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手段而是用表决方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编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倾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末这样的容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容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上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末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蓬勃发展的。法律上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所主张的“情况”。

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事情…… 巴甫洛维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的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末……那末，总罢工就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末我们的党就公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一贯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首先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 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原来不是多余的事，这在同一个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得以通过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sup>①</sup>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

---

① 投赞成这个条文的有二十八票，反对的有二十二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的主张，有一个人赞成我的主张。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即勃鲁克尔同志曾对我表示同意——时，才回想起这些人）。

真正本性，公然要求（第 254—255 页）只要（为了取得“党员资格”）抽象地承认党纲，只要承认党纲的“基本原理”就够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说，“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正因为这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形成的“紧密结合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结合的少数派！正因为这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似乎受到惊人的破坏！而这奇怪的七个人却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护符：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即那些曾投票反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编和党章第一条关于党纲的条文问题时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所捍卫的《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演出的一幕悲喜剧的伏线。

\* \* \*

\*

表决党章第一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也跟使用语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报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数目）的人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支持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在象我们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或者来到这方或者转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第一条这样

的问题时，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实质还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预先没有在报刊上研究过）。从火星报多数派方面跑出去五票（各有两票表决权的鲁索夫和卡尔斯基以及有一票表决权的连斯基）；同时，又有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勃鲁克尔）和三个中派分子（梅德维捷夫、叶哥罗夫和察辽夫）归附到火星报多数派方面；结果多数派共有二十三票（ $24 - 5 + 4$ ），比后来进行选举时最终形成的派别少一票。反火星派分子使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的主张，有一个人赞成我的主张（“中派”方面也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的主张，三个人赞成我的主张）。火星报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以及“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结合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一条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走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步骤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革命的社会民主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漏洞。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见阿基莫夫的演说）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忠实行革命的社会民主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枝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

## (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 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在谈党章问题继续讨论的情况以前，必须讲一下《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几次非正式会议，以便说明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分歧。这四次会议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是在表决了党章第一条以后举行的，所以，《火星报》组织在这次会议上发生的分裂，无论在时间上或者在逻辑上都是以后斗争的先声。

《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sup>①</sup>是在组委会事件以后不久召开的，因为这一事件成了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可能候选人问题的导火线。由于限权委托书被取消，所以这几次会议当然只是协商性质、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作用，但是这几次会议的意义毕竟是很大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在许多代表看来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们既不知道秘密名字，也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的内部工作情况，虽然这个组织造成了党在事实上的统一，并且实现了对实际运动的领导（这个领导作用成为正式承认《火星报》的理由之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火星派分子团结一致的时候，他们完全有保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五分之三的大多数，全体代表都很了解这一点。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正是期望《火星报》组织提出一个关于中央委员会一定人选的名单，并且《火星报》组织中没有一个人有一句话表示反对

---

① 为了避免那些无法解决的争论，我已经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对于非正式会议上的各种事实力求尽量缩小说明范围。基本的事实已经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中叙述过了。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答复》中并没有对这些基本事实表示异议。

预先在这个组织中讨论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到要批准组委会全体委员，即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全体委员协商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这个情况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值得十分注意的，因为现在马尔托夫分子事后热心拥护组委会，其实不过是三番五次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气节而已<sup>①</sup>。当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引起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尔托夫和阿基莫夫团结起来的时候，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人都明白每一个公正的人可以从代表大会的记录和《火星报》全部历史中看出的事实，即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有意让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同时必须指出，有几个火星派的组委会委员没有列席代表大会，完全是偶然的，有的是由于被捕，有的是由于其他种种“客观”情况）。列席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已由巴甫洛维奇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列举过了（见他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 13 页）<sup>21</sup>。

《火星报》组织内部激烈辩论的最终结果，就是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引证过的两次表决。第一次表决是“以九票对四票并在三票弃权的情况下否决了马尔托夫所支持的一个候选人”。看来，《火星报》组织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十六个成员一致同意讨论关于可能的候选人问题，以及由大多数否决了马尔托夫同志所提出的候选人之一（这个候选人就是现在马尔托夫同志自己也忍不住将其泄漏出来的施泰因同志，《戒严状况》第 69 页）——这不是最简

---

① 请仔细想象一下这幅“风俗画”吧：《火星报》组织的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同《火星报》组织协商过，并且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协商。而当他自己在这个组织内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他却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一事表示惋惜，事后赞扬组委会，并傲慢地漠视给他代表委托书的那个组织！我敢说，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和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历史中都是找不出来的。

单和最自然的事情吗？要知道，我们聚集起来举行党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和解决究竟把“指挥棒”交给谁掌握的问题，而我们全体党员的义务就是要认真对待议事日程上的这一项，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庸人的温情”出发——正如鲁索夫同志后来十分公正指出的那样。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候选人问题时，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和小型的会议上，不能不涉及到某些个人品质，不能不表示自己是赞成还是不赞成<sup>①</sup>。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警告过：把不赞成候选人的态度看作一种“侮辱”（同盟记录第49页）是很荒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党员的义务——即自觉地慎重地选择负责人员——而“发脾气”和乱吵乱闹，是很荒谬的。我们的少数派也就因为这件事情大发雷霆，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同盟记录第70页），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说施泰因同志是旧组委会的“主要人物”，说他无辜被人指责有“什么万恶的计划”（《戒严状况》第69页）。你看，在是否赞成候选人的问题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吗？有人当自己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上以及在正式的最高的党员会议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就向街头公众去诉苦，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这难

---

①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感伤地诉苦，说我表示不赞成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但是他没有觉察到，从他的诉苦里得出了对他自己不利的结论。列宁当时的举动——又用他自己所使用的字眼来表达……狂暴（同盟记录第63页）。真的，他使劲把门关了一下。不错，他的行为（在《火星报》组织的第二次或第三次会议上）激怒了当时在场的人。这是实情。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是我的论据在各个争论问题的实质上是有说服力的；而且这已经为代表大会的进程证实了。真的，如果《火星报》组织的十六个组员中竟有九个组员赞成我的立场，那末，显而易见，虽然态度激烈，哪怕态度激烈，人们还是赞成我的。可见，如果不是“态度激烈”，当时站到我这方面的人也许比九个还要多呢。可见，当时论据和事实愈是胜过“火气”，这些论据和事实也就愈显得愈有说服力。

道不是无谓争吵吗？有人后来竟用闹分裂和要求补选的办法来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谓争吵吗？我们侨居国外，在这个沉闷的气氛中，政治概念已经十分混淆了，以致马尔托夫同志分辨不清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了！有人竟以为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是一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谁都知道代表们在此聚会首先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谁也知道在此聚会的是搞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谁也知道在这里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可是现在我们这里，代替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点而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气：我们将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信口开河说，某某人在政治上被埋葬了，某某人的声誉被破坏了等等；候选人由一些文人在小册子里大加渲染，而且这些文人还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指手划脚地硬说这不是小组而是党……那些喜欢吵架的读者就会如获至宝地欢迎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什么据马尔托夫扬言，某某人曾是组委会的主要人物<sup>①</sup>。那些读者要比机械地根据多数通过决议的代表大会这类形式主义的机关有更大的本事去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的，在国外还有许多充满了无谓争吵的奥吉业斯的牛圈<sup>22</sup>需要我们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去打扫！

---

### 《火星报》组织举行的另一次表决，是“以十票对两票并在四票

---

<sup>①</sup> 我也在《火星报》组织里提出过一个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而且也象马尔托夫一样没有能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对于这个候选人，我本来也能说一下他在代表大会以前和在代表大会初期有过什么杰出事迹证明他的良好的声誉。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这位同志很有自尊心，决不会让任何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提出他的候选资格或者诉说什么政治上被埋葬，声誉被破坏等等。

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五人名单（即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由我提议列入这个名单的有一个非火星派首领和一个火星报少数派首领”<sup>①</sup>。这次表决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争辩地证明：后来在无谓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谎言，说什么我们想从党内驱逐或者丢开非火星派，说什么多数派只以代表大会半数来选举这个半数里的代表等等谎言，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所引证的这次表决情况表明，我们不但没有想把非火星派从党内丢开，甚至没有想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内丢开，而是让我们的对方占很大的少数。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占多数，当这种奢望实现不了时，他们就大吵大闹，根本拒绝参加中央机关。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同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上所说的截然相反，从下面一封信里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封信是我们《火星报》组织中的多数派（在七个人退出代表大会以后，就成了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在代表大会通过党章第一条以后不久从《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那里收到的（必须指出，我所说的那次《火星报》组织的会议是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火星报》组织事实上已经瓦解了，于是双方都力图说服代表大会的其余代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我们听了索罗金和萨勃利娜<sup>23</sup>两位代表关于编辑部和‘劳动解放社’<sup>24</sup>的多数愿意参加会议（某一天）<sup>②</sup>问题的解释，同时我们又在这两位代表的帮

---

①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05页。——编者注

② 据我计算，这封信指的日期是星期二。会议是在星期二晚上，即在代表大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后举行的。这种时间上的考证很重要。它证据确凿地驳斥了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即所谓我们的分离是由于中央机关的组成问题而不是由于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引起的。它证据确凿地证明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在《给编辑部的信》里的说明是正确的。在代表大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两同志大谈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却只字不提在总委员会人选或中央机关补选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次会议上曾经争论过）。

助下查明，在上一次会议上宣读过一个似乎是由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被人用来对我们的整个政治立场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同时我们注意到，第一，人们丝毫没有试图查一查来源就认定这个名单是我们提出的；第二、这种情况和公开加在《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劳动解放社’多数身上的机会主义罪名无疑是联系的；第三，我们十分了解这个罪名是同改变《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完全确定的计划有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对我们作的关于不让参加会议的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同时我们认为，不愿意让我们参加会议就是证明不愿意让我们有可能消除上述莫须有的罪名。

至于我们彼此能不能协商提出一个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我们声明：我们可以当作协商基础接受的唯一名单就是波波夫、托洛茨基、格列博夫三个人，同时我们着重指出这个名单是一个妥协性的名单，因为我们把格列博夫同志列入这个名单只是为了向多数方面的愿望表示让步，因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认清格列博夫同志的作用以后，我们并不认为格列博夫同志能满足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所应当满足的要求了。

同时，我们要着重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进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的谈判时，并没有把这件事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问题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决不同意对这个问题（编辑部成员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代表各同志署名的：

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

从这一封确切反映出争论双方的情绪和争论情况的信中，可以明白看出当时发生分裂的“中心”及其真实原因。《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虽然不愿同意多数派的意见，而宁愿在代表大会上自由地进行鼓动（他们当然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们终究想要使多数派的“代表”允许他们参加自己的非正式会议！当然，这种可笑的要求在我们的会议上（这封信当然是在会议上宣读过的）只是使人好笑和感到诧异，至于他们因“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叫大闹，简直只好令人付之一笑。但是，我们首先还是逐条剖析一下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那些伤感的怨言吧。

他们说：有人不正确地认为名单是他们提出的；有人不正确地估计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马尔托夫自己也承认（同盟记录第 64 页），我并不怀疑他说这个名单不是他提出的一语的真实性。一般说来，名单究竟是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名单究竟是由火星派分子中某个人或者是由“中派”代表中某个人拟订的等等，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完全由现在少数派分子构成的这个名单曾在代表大会上传阅过，尽管只是作为一种推测或假设而传阅的。最后，更重要的是，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在代表大会上曾经拚命表示拒绝这个名单，要是放到现在，他一定会表示欢迎。请看，在两个月以内他就由高喊“可耻的谎言”一变而为要挟党把这个似乎可耻的名单<sup>①</sup> 中开列的候选人接纳到中央机关去了，——这种变化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他对于人物和对于色彩的估计是多么不坚定啊！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说，这个名单，“在政治上意味着我们以及‘南方工人社’同崩得实行直接协定的联盟”（第 64 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第一、崩得始终不会同意实行没有一个崩得分子在内的名单的“协定”；第二，当时不仅同崩得，而且同“南方工人社”，也没有而且不可能谈到什么直接的（在马尔托夫看来是可耻的）协定。当时实行的恰恰不是协定，而是联盟，当时的问题不是说马尔托夫同志缔结过什么协定，而是说那些在代表大会前半期曾遭到马尔托夫同志反对，后来却拚命抓住马尔托夫同志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的错误加以利用的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支持马尔托夫同志。我上面引用的信就确凿

---

① 当我们听到关于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发生冲突的消息时，本书已经付排了。关于这次事件，我们将在本书附录中专门加以分析（见本书第 209—218 页）。——编者注。

地证明，他们“生气”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人家公开地给他们加上的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些曾经使人大发雷霆而现在马尔托夫同志不管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如何提醒仍然竭力回避的“罪名”，可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普列汉诺夫直截了当地说，党章第一条的问题是把“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和我们“分开”的问题，我提出的草案是防止这些人钻进党内的壁垒，“单是这一个理由就应该使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投票拥护”这个草案（代表大会记录第246页）。这些强有力的话尽管由我把语气缓和了一些（第250页）<sup>①</sup>，在鲁索夫（第247页）、托洛茨基（第248页）和阿基莫夫（第253页）等同志发言中还是明显地表现出强烈的反应。在我们“议会”的“走廊”里，大家都在党章第一条问题的无数争论过程中热烈地评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点，并解释得莫衷一是。但是我们那些亲爱的同志不但不从实质上来辩护，反而充满了可笑的怨气，直到用书面诉说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

那种充满小组习气和非常缺乏党性而经不起当众公开争论的新鲜空气的心理，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这正是俄罗斯人所熟悉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古谚来说就是：“不是咬牙切齿，就是握手言欢！”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小群亲密伙伴的小圈子里生活，一看见有人在自由的公开的舞台上由自己负责地发表言论，就手足失措了。给别人加上机会主义的罪名，给谁？给“劳动解放社”，而且是给该社的多数人加上这种罪名，——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可怕！或者是为了这个洗不掉的侮辱而造成党内分裂，或者是用恢复小圈子的“继承性”来消弭这种“家丑”——这就是上面那封信里已经相当

---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55—456页。——编者注

明确地提出的两个办法。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和小组习气的心理同必须在党面前公开发表意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你能设想在德国党内会有象诉说所谓“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样一种荒谬现象，这样一种无谓争吵吗！在那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早已使人抛弃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例如，李卜克内西是任何人都对他十分表示尊敬的，但是，李卜克内西在 1895 年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落到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一流的恶劣伙伴中间<sup>25</sup>，被人“公开加上机会主义罪名”（和倍倍尔一起），如果因此谈起苦来，人们该会怎样地嗤笑他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同德国工人运动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不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在这样一个比较小的局部问题上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哪怕他犯了这样的错误，这种联系还是存在的。同样，不管斗争如何使人气愤，可是，例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名字现在而且将来永远会受到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尊敬，这并不是因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护过机会主义的思想，也不是因为他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过旧的无政府主义的谬论，哪怕他拥护过这种思想，哪怕他提出过这种谬论，他的名字还是受人尊敬的。只有那些迷恋最顽固的小组习气而且抱定“不是咬牙切齿，就是握手言欢”的逻辑的人，才会因“‘劳动解放社’多数人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叫大闹，掀起无谓争吵和制造党内分裂。

这种可怕的罪名的另一个根据同前一个根据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第 63 页）力图回避和抹杀这个事件的一方面）。这个根据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动摇分子同马尔托夫同志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已经表现出来的联盟。自然，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缔结什么直接协定或间接协定，而且谁也没有怀疑他缔结过什么协定；这不

过是他自己由于害怕而产生的想法罢了。但是，那些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在他周围组成一个愈加“紧密结合的”多数（现在只是由于有七个代表“偶然地”退出代表大会才变成了少数），这一事实正暴露了他所犯的错误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联盟”，我们在讨论党章第一条以后当然也立刻公开地在代表大会上（见上面引用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评语，代表大会记录第 255 页）以及在《火星报》组织中指出过（我记得，普列汉诺夫曾特别指出过这一点）。这正象蔡特金在 1895 年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提出的意见和嘲笑一样：«Es tut mir in der Seele weh, dass ich dich in der Gesellschaft seh»（我看不见你（即倍倍尔）落在这这样的一伙人中间（即与福尔马尔及其伙伴在一起），是多么痛心呀）。说也奇怪，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人并没有歇斯底里地向考茨基和蔡特金写过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信……

关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我们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说他们当时还没有最后表示拒绝同我们协商等话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在政治斗争中企图依靠记忆来重述各种谈话而不根据文件来考证事实，这是多么不妥当。其实，“少数派”当时是丝毫不客气的，公然向“多数派”提出最后通牒：让“少数派”提出两个候选人而“多数派”提出一个候选人（作为妥协办法，并且只是为了表示让步！）。这真是怪事，但这是事实。从这件事实可以具体地看出，现在散布谎言，说什么“多数派”想由代表大会半数只选出这个半数里的代表等语，是多么荒唐。恰恰相反：马尔托夫分子只是为了表示让步才主张让我们在三个席位中占一个席位，因而也就是打算在我们不同意这个奇特的“让步”时完全选出他们自己的人！我们在自己的非正式会议上嘲笑过马尔托夫分子的这种谦逊态度，并给自己拟订了

一个名单：格列博夫、特拉文斯基（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以及波波夫。我们随后（也是在二十四人的非正式会议上）用瓦西里也夫同志（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代替波波夫同志，只是因为波波夫同志拒绝列入我们提出的名单，起初他在私人谈话中表示拒绝，后来又在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拒绝（第338页）。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

谦逊的“少数派”本来有一种想占多数席位的谦逊的愿望。当这种谦逊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少数派”就公然完全表示拒绝，而且无理取闹。但是现在竟有人煞有介事地大谈什么“多数派”“不肯让步”！

“少数派”出马上阵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的时候，曾向“多数派”提出可笑的最后通牒。当我们的英雄遭到失败的时候，就嚎啕大哭，叫喊起戒严状况来了。这就是全部情况（*Voilà tout*）。

给我们加上蓄意改变编辑部成员这一可怕的罪名，我们（即二十四人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也是一笑置之，因为大家从代表大会刚一开始，甚至早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很清楚地知道以选举原先预定的三人小组来改组编辑部的计划（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讲到代表大会选举编辑部的情况时还要详细说明）。至于“少数派”看到它同反火星派联盟就是明显地证明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以后，就被这个计划吓得目瞪口呆了，我们丝毫不觉得奇怪，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们当然不能把那种要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尚未进行斗争以前自愿变成少数的提议看得很严重，我们当然不能把那封信看得很严重，因为那封信的作者气愤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以致说起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来了。我们深信党员的职责是很快就会战胜那种想要“泄愤出气”的自然愿望的。

## (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成员

党章以后各条所引起的争论多半是关于细节问题的，很少涉及到组织原则。代表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完全是讨论选派代表出席党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坚决肯定地进行斗争来反对全体火星派共同计划的又只有崩得分子(哥里德勃拉特和李伯尔，第258—259页)以及阿基莫夫同志，后者以值得称赞的坦率精神承认他在代表大会上起的作用，他说：“我每次说话都完全意识到，我所提出的论据不会影响同志，反而会危害我所拥护的那个条文。”(第261页)这一段中肯的意见紧接在讨论党章第一条以后来讲是特别恰当的；只是“反而”一词在这里用得不完全正确，因为阿基莫夫同志不仅善于危害一定的条文，而且还善于“影响同志”……即影响某些倾向于机会主义词句的很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

总之，党章第三条——规定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条件——是在七票弃权的情况下由大多数通过的(第263页)，弃权的显然都是一些反火星派分子。

关于总委员会成员问题的争论占了代表大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这次争论暴露了在许多不同的草案周围形成的非常零散的派别划分。阿勃拉姆桑和察辽夫根本反对成立总委员会的计划。帕宁硬想使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的仲裁法庭，因此他完全一贯地提议把那些认为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以及总委员会可以由其中任何两个委员召集会议等词句删掉<sup>①</sup>。格尔茨<sup>26</sup>和鲁索

<sup>①</sup> 斯塔罗维尔同志显然也倾向于帕宁同志的观点，不同的只是后者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完全一贯地提出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仲裁性的调解机关的决议案；斯塔罗维尔同志虽然说总委员会按草案规定“只应当根据双方的愿望”(第266页)召集，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夫坚持各种组成总委员会的方法，他们认为党章起草委员会五个委员所提出的三种方法不很恰当。

争论的问题首先归结为确定总委员会的任务：是仲裁法庭呢还是全党最高机关？我已经说过，一贯赞成前一种意见的有帕宁同志。但是他只是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坚决反对这个意见，他说：“我提议否决那种主张把‘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一语删掉的建议，因为我们的条文（即我们在党章起草委员会内一致同意的关于总委员会任务的条文）正是想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党最高机关。我认为，总委员会不只是一个调解机关。”但是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来说，总委员会的成员完全而且仅仅适合“调解机关”或仲裁法庭的性质：两个中央机关各选派两个委员，第五个委员由这四个人来聘请。别说这样的总委员会成员，就是按照鲁索夫同志和格尔茨同志提议的由代表大会通过的总委员会成员（第五个委员由代表大会任命），也只适合调解或仲裁的目的。总委员会的这种人选是根本和它应该成为全党最高机关的使命相矛盾的。全党最高机关在成员方面应该固定不变，而不应当受中央机关成员中偶然（有时是由于被捕）变动的影响。最高机关应当同党代表大会有直接的联系，从代表大会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而不是从其他两个服从于代表大会的党机关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最高机关应该由党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组成。最后，最高机关组成的方式决不应该使它本身的存在受到偶然情况的影响：在两个委员会对于选举第五个委员的问题相持不下时，党就会处于没有最高机关的境地！反驳这个意见的人说：（1）当五个委员中有一个委员弃权，而其余四个委员又相持不下时，结果也是没有出路的（叶哥罗夫语）。这种反驳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法通过决议有时是任何一个委员会都免不了的，但是这完全不是说委员会就无法

组成。第二种反驳意见说：“如果象总委员会这样的机关都不能选出第五个委员，这就说明这个机关根本不中用。”（查苏利奇语）然而，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中用不中用，而在于最高机关存在不存在：没有第五个委员就不会有什么总委员会，就不会有任何“机关”，于是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中用不中用。最后，如果说无法组成的只是某一个服从于另一个委员会——上级委员会——的党委员会，那还是可以想办法纠正的弊病，因为这个上级委员会在非常情况下随时可以用某种方法来弥补这个缺陷。但是，在总委员会上面，除了代表大会以外，没有任何委员会了，如果在党章内留下一种使总委员会甚至无法组成可能性，那就显然不合乎逻辑了。

我在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个问题发表的两次简短的演说，只是为了剖析（第 267 页和第 269 页）马尔托夫本人以及其他同志用来替马尔托夫草案辩护的这两个不正确的反驳意见。至于总委员会中究竟是中央机关报占优势，还是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问题，我甚至没有提到过。最先提到这个问题而说中央机关报有占优势危险的是阿基莫夫同志，他还在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言时就提到这一点（第 157 页），至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同志在代表大会以后制造蛊惑人心的荒谬言论，说什么“多数派”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等，只不过是走阿基莫夫的老路而已。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况》一文中提起这个问题时，竟把真正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轻轻地闪过去了！

谁要想了解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问题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全部提法，而不只是断章取义地摘引个别词句，他就会很容易地发现马尔托夫同志歪曲了事实真相。还在第十四次会议上，不是别人，正是波波夫同志一开始发言就表示反对阿基莫夫同志的观点，说他想“在党的高峰上拥护‘最严格的集中制’，以便

**削弱中央机关报的影响**（第 154 页，着重号是我加的），这样的**（阿基莫夫式的）体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波波夫同志补充说，“对于这样的集中制，我不仅不拥护，并且要大力反对，因为它是**机会主义的旗帜**”。这就是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所谓问题的根源，怪不得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只好对这个问题的真实起源避而不谈。甚至波波夫同志也不能不发现阿基莫夫这些所谓中央机关报占优势的论调中包含的**机会主义性质**<sup>①</sup>，所以波波夫同志为了把自己和阿基莫夫同志好好地区分开来，便坚决声明：“让这个中央机关（总委员会）由编辑部提出三个人而由中央委员会提出两个人来组成吧。**这是个次要的问题**（着重号是我加的），重要的是要党的最高领导出自一个来源。”（第 155 页）阿基莫夫同志反驳说：“按照草案，单是从编辑部的成员固定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经常变化这一点来看，也就保障了中央机关报在总委员会内的优势”（第 157 页）——这一论据所说的只是**原则领导的“固定性”**（这是正常的、合乎愿望的现象），决不是有干涉或侵犯独立性意义的“优势”。于是波波夫同志（他当时还不属于以所谓中央委员会没有独立性的谎言掩盖其不满意中央机关成员的心理的“少数派”）完全正当地回答阿基莫夫同志说：“我提议把它（总委员会）当作全党的领导中心，那时**总委员会里面究竟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占多数**

---

① 无论波波夫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都没有害怕把阿基莫夫同志称为机会主义者，只是当人们对他们这些人使用了这个称呼，当人们由于“使用语言平等”问题或党章第一条问题而公正地使用了这个称呼时，他们才生了气并且发起火来。然而阿基莫夫同志（步其后尘的是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要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行动更庄重而有勇气些。阿基莫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说：“在这里，人们把我称为机会主义者：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骂人的侮辱性的字眼，并且我认为人家这样称呼我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我并不抗议这一点。”（第 296 页）也许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两同志曾向阿基莫夫同志建议在他们为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提出的抗议书上签名，但是被阿基莫夫同志拒绝了吧？

还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占多数，就完全是次要问题了。”（第 157—158 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在第二十五次会议重新讨论总委员会成员问题时，巴甫洛维奇同志继续原先的辩论，表示拥护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的优势，“因为前者具有坚定性”（第 264 页），而他所指的正是原则的坚定性，正如在巴甫洛维奇同志以后跟着上台发言的马尔托夫同志所理解的那样，马尔托夫同志在发言中认为不必“规定一个机关对另一个机关的优势”，并指出可以使一个中央委员会委员留在国外：“这样就能使中央委员会的原则坚定性在一定程度内保持下去。”（第 264 页）这里丝毫没有用蛊惑人心的口吻把关于原则坚定性以及保持这种坚定性的问题和关于保持中央委员会独立自主性的问题混淆起来。在代表大会以后几乎成为马尔托夫同志的主要法宝的这种混淆手法，在代表大会上只有阿基莫夫同志一人顽强地施用过，阿基莫夫同志当时已经说到“党章的阿拉克切也夫<sup>27</sup> 精神”（第 268 页），说“如果党总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是中央机关报提出的，那末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只是编辑部意志的执行者了”（着重号是我加的）。三个住在国外的人就会取得漫无限制地<!!>处理全<!!>党工作的权利。他们在安全方面是有保证的，因此他们的权力就会是终身的。”（第 268 页）正是为了反驳这些十分荒谬的蛊惑人心的词句；为了反驳这些把思想领导曲解为干涉全党工作的词句（这种词句在代表大会以后供给了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一个廉价的口号来大谈所谓“神权政治”），于是巴甫洛维奇同志又起来发言，着重声明他“拥护《火星报》所代表的那些原则的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主张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占优势，就是为了巩固这些原则”。

所谓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问题的真相就是如此。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指出这一有名的“原则性

的意见分歧”，无非是重复阿基莫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机会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调门而已，而这些词句的本质，波波夫同志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当然只是在他还没有在中央机关成员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前才看得很清楚！

\* \* \*

\*

关于总委员会成员问题的总结就是：不管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况》中怎样企图证明我在《给编辑部的信》中有矛盾和不正确的说法，代表大会的记录清楚地表明，这个问题和党章第一条比较起来确实只是细节问题，而《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火星报》第53号）说当时我们争论的“几乎只是”关于党中央机关的组成方法问题，这完全是歪曲事实的说法。这种歪曲所以更加令人气愤，是因为该文作者完全回避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其次，火星派分子在总委员会人选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派别，这一点也可以拿代表大会的记录来证实：没有举行过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和帕宁的意见不一致，我和波波夫的意见相同，叶哥罗夫和古谢夫两人坚持自己的立场，等等。最后，我最近（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认为马尔托夫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联盟已经巩固起来，这一论断也可以由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楚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转到阿基莫夫同志方面去的事实来证实。

## （十二）党章问题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补选问题。 “工人事业社”代表退出代表大会

谈到党章问题继续讨论的经过（代表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时

值得指出的只有关于限制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分子现在攻击过分集中制的用意。叶哥罗夫同志和波波夫同志企图限制集中制的立场的信心是比较坚强的，是不以他们自己的候选资格或他们所拥护的候选人为转移的。他们早在党章起草委员会里就已经提议要限制中央委员会解散地方委员会的权力，限制的条件就是必须得到总委员会的同意以及特别列举的一些情况（第 272 页，注释 1）。党章起草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格列博夫、马尔托夫和我）反对这种限制，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也曾拥护我们的意见（第 273 页），并反驳叶哥罗夫和波波夫，他说：“即使没有这些限制，中央委员会在决定象解散组织这样重大步骤时也会预先讨论的。”可见，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对于一切反集中制的企图还是充耳不闻的，结果代表大会否决了叶哥罗夫和波波夫的提议，——只是可惜我们不能从记录上查明究竟是多少票否决的。

在党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也曾“反对以‘批准’一词来代替‘组织’一词（党章第六条说：中央委员会负责组织各委员会等等）。必须也给以组织的权利”，——马尔托夫同志当时这样说，但是他还没有想到只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才发现的绝妙的明显的思想，即认为“批准”不包括在“组织”概念以内。

除了这两点以外，其余一切关于党章第五条至第十一条的讨论完全是细节的辩论（记录第 273—276 页），都没有多大趣味。第十二条是一般关于一切党委员会补选，特别是中央机关补选的问题。党章起草委员会提议把补选所必要的法定多数从三分之二提到五分之四。报告人（格列博夫）提议：补选中央委员会需要一致通过。叶哥罗夫同志认为留下一些疙瘩是不恰当的，主张在没有人提出理由充分的异议时只要普通多数通过就可以了。波波夫同

志既不同意党章起草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叶哥罗夫同志的意见，而要求要么是普通多数通过（没有否决权），要么是一致通过。马尔托夫同志既不同意党章起草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同意格列博夫、叶哥罗夫以及波波夫的意见，表示反对一致通过，反对五分之四（赞成三分之二），反对“相互补选”，即反对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权对中央委员会的补选提出异议，反之亦然（即反对“相互监督补选的权利”）。

读者可以看出，这里派别划分是很复杂的，意见分歧几乎表现在每一个代表的看法都“一致”有自己的特点！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认为，要同你所憎恶的人一起工作，在心理上是很难堪的。但是重要的是使我们的组织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在补选方面相互监督的权利是不需要的。我所以反对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要各行其是。决不是！例如，在是否应当把纳杰日丁先生接收到中央委员会里的问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忠告的。我所以表示反对，是因为我不愿意造成一种互相激怒的拖延。”

我反驳他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法定多数的问题，我反对从五分之四减为三分之二。采用说明理由提出异议的办法是不慎重的，所以我反对这一点。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相互监督补选的权利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两个中央机关的相互一致，是保证协调的必要条件。这里谈到的是两个中央机关决裂的问题。谁不愿意分裂，谁就应该关心维持协调。大家从党内生活中知道有过一些制造分裂的人。这是个原则问题，是个重要问题，是同党的整个未来命运有关的问题。”（第276—277页）这就是在党代表大会记录中所载的我那次发言内容概要的全文。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次发言特别重视。可惜他虽然

重视这次发言，但是他在提到这次发言时丝毫不联系作这次发言时的全部讨论情况和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政治形势。

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自己最初的草案中（第394页第十一条）<sup>①</sup>仅以三分之二的票数为限，而没有要求中央机关在补选问题上相互实行监督呢？继我以后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第277页）也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一封信，都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党章第一条“把器皿打破了”，我们必须用“双结”把它捆好，——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这样说过。这就是说：第一、马尔托夫在纯理论问题上暴露出自己是个机会主义者，而李伯尔和阿基莫夫又坚持了他所犯的错误；第二、马尔托夫分子（即火星派中的区区少数）和反火星派分子联盟的事实使他们有可能在选举中央机关成员时成为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我强调说必须维持协调并告诫必须防备“制造分裂的人”时指的正是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当时这种告诫确实有重要的原则意义，因为《火星报》组织（当然，它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是更有权威的组织，因为它最熟悉实际工作中的一切事务和所有候选人）已经表示了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已经通过了关于它所顾虑的那些候选人的相当的决议。无论在道义上或者在问题实质上（即按照提出决议者的权威程度），《火星报》组织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都应当起决定作用。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在形式上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请求李伯尔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帮忙反对《火星报》组织的多数派。阿基莫夫同志在关于党章第一条的出色的发言中非常明白而聪明地说，当他看到火星派分子中间在达到他们共同的火星派目

---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32页。——编者注

的方法上发生意见分歧时，他就自觉地、有意地投票赞成比较坏的方法，因为他阿基莫夫的目的是同火星派的目的针锋相对的。所以，毫无疑问，甚至不管马尔托夫同志的意志和意识如何，正是较坏的中央机关人选将会得到李伯尔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的支持。他们能够投票，他们一定会投票（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论，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根据他们对于党章第一条的投票情况来判断）赞成包括“制造分裂的人”在内的名单，并且他们投票的目的正是为了“制造分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说这个问题是关系着党的整个未来命运的重要原则问题（两个中央机关的协调），又有什么奇怪呢？

凡是稍微了解火星派的思想、计划以及运动史，稍微有诚意赞成这些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分钟也不会迟疑地认为，由李伯尔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解决《火星报》组织内部对于中央机关成员问题的争论虽然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是一定会造成最坏的结果。我们一定要同这种最坏的结果进行斗争。

试问：怎样进行斗争呢？我们进行斗争时既不用歇斯底里的手段，也不用无理取闹的办法，而是用完全老老实实和完全正当的办法，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处在少数地位时（正如讨论党章第一条时那样），我们就请求代表大会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在接受委员时采取更严格的绝对多数表决制（以五分之四代替三分之二），在补选时采取一致同意和中央机关相互监督补选制，——所有这些办法，当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时都是坚持了的。有些人总是忽视这一事实，他们喜欢在一两次朋友谈话之后就凭空评论代表大会，却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全部记录和所有当事人的“口供”。凡是愿意诚实地把这些记录和这些口供拿来进行研究的人，必然会看到我所指出的这一事实：在代表大会当时形势下，争论的

根源正是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我们所以力求规定更严格的监督条件，也就是因为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想用“双结捆好”马尔托夫在李伯尔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欣赏和欣然参加之下打破了的那个“器皿”。

巴甫洛维奇同志讲到代表大会的当时形势时说：“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只好认为，我们主张在补选时需要一致同意，就等于替敌人操心，因为，对于在某个机关中占多数的党，一致同意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不利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4页）可是，现在有人总是忘记事件发生的顺序，忘记现在的少数派在代表大会整个时期内都曾经是多数（由于李伯尔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的参加），忘记关于中央机关补选问题的争论正是发生在那个时期，并且这次争论的内在原因就是《火星报》组织内部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发生意见分歧。谁认清了这个情况，谁也就会懂得我们争论为什么这样激烈，谁也就不会对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表示惊奇：为什么一些细微末节的意见分歧居然引起真正重要的原则性问题。

捷依奇同志在同一会议上（第277页）说得很对，他说：“毫无疑问，这个建议是针对目前形势提出来的。”的确，只有了解当时形势的全部复杂性以后，才能了解争论的真正意义。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当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总是用任何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合情合理的方法来维护少数的权利的，即向代表大会请求对于中央机关人选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叶哥罗夫同志在同一会议上……不过是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得也很对，他说：“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我在辩论中又听到有人拿原则作借口（这是在代表大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谈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说的，就是说，据我所知，是在星期四早晨说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二

十六次会议则是在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看来，大家都应该明白，在最后几天内，所有的争论都不是围绕在某个原则问题上，而只是围绕在怎样保证或者阻止某人加入中央机关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原则早就丧失净尽了，我们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全场大笑。穆拉维约夫说：“请写在记录上，马尔托夫同志笑了。”）（第337页）怪不得马尔托夫同志和我们大家一听见叶哥罗夫同志这些确实可笑的怨言时都大笑起来了。是的，“在最后几天内”，许许多多争论都围绕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这是事实。这在代表大会上确实是大家都清楚的（现在只有少数派才力图抹杀这一明显的事）。最后，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这也是对的。可是，上帝呵，这究竟跟“原则丧失净尽”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我们所以聚集在一起举行代表大会，是为了（见第10页，代表大会议事日程）在最初几天谈一谈纲领、策略、章程并解决有关的问题，在最后几天内（议事日程第18、19项）谈一谈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有人把代表大会的最后几天用来为指挥棒而进行斗争，这本来是自然而然的、完全正当的现象。（至于在代表大会以后为指挥棒而吵架，那就是无谓争吵了）。谁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如叶哥罗夫同志那样）以后竟说什么“原则丧失净尽”，简直是令人可笑的。难怪大家都嘲笑叶哥罗夫同志。同样也难怪穆拉维约夫同志请求把马尔托夫同志也对他嘲笑这一事实写到记录上：马尔托夫同志嘲笑叶哥罗夫同志，就是自己嘲笑自己……

为了补充穆拉维约夫同志的讽刺，也许可以举出这样一件事。大家知道，在代表大会以后，马尔托夫同志到处扬言，说我们意见分歧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央机关补选问题；说“旧编辑部中的多数”曾经激烈反对两个中央机关在补选方面相互监督的办法。在

代表大会以前，马尔托夫同志在接受我提出的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以及按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补选的草案时，曾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写给我，他说：“在接受这样的相互补选形式时，应当着重指出，在代表大会以后，每个委员会人员的补充都将按照稍微不同的另一种原则来实行（我的意见是：每个委员会在补选新委员时都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另一个委员会：后者可以提出异议，那时争论就由总委员会来解决。为了避免拖延，这种手续应当用于那些已经预先确定的候补人（至少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应该这样做），拿这些候补人来补充，会更简便一些）。为了着重指出将来的补选应当按照党章规定的手续办事，必须在第二十二条<sup>①</sup>补充一句：‘……所有已经成立的决定都应该按照手续批准’。”（着重号是我加的）

这是用不着说明的。

在说明了中央机关补选问题进行争论的当时形势的意义以后，我们应当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的表决情况；至于讨论情况就不必谈了，因为我上面引用的两个发言（马尔托夫同志的和我的发言）发表以后，只有很少几个代表提出过一些简短的质问（记录第277—280页）。说到表决情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硬说我在自己的说明里作了“最大的歪曲”（同盟记录第60页），“因为他把当时围绕党章进行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无意中说出了一个很大的真理：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以后，激烈的争论正是围绕党章

---

① 这是指全体代表都知道的我最初提出的那个大会议事日程（Tagessordnung）草案以及草案说明。这个草案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是关于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由这六人按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补选”，由代表大会批准这个相互补选以及关于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自行补选的问题。

进行的)描写成《火星报》对那些同崩得结成联盟的马尔托夫分子的斗争”。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最大的歪曲”的有趣的问题吧。马尔托夫同志把关于总委员会成员问题的表决同关于补选问题的表决联系起来，并且举出八次表决：(1)由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各选出两人加入总委员会——赞成的有二十七票(马)，反对的有十六票(列)，弃权的有七票<sup>①</sup>。(顺便说一下：在记录第270页上写的是，弃权的有八票，但这是件小事情)；(2)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赞成的有二十三票(列)，反对的有十八票(马)，弃权的有七票；(3)由总委员会自行补选新委员来代替总委员会的离职委员——反对的有二十三票(马)，赞成的有十六票(列)，弃权的有十二票；(4)在补选中央委员会委员时要取得一致同意——赞成的有二十五票(列)，反对的有十九票(马)，弃权的有七票；(5)只要有一个能说明理由的异议就不能接受委员——赞成的有二十一票(列)，反对的有十九票(马)，弃权的有十一票；(6)在补选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委员时要一致同意——赞成的有二十三票(列)，反对的有二十一票(马)，弃权的有七票；(7)允许对总委员会有权取消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接受新委员的决议的问题进行表决——赞成的有二十五票(马)，反对的有十九票(列)，弃权的有七票；(8)对于这个提议本身——赞成的有二十四票(马)，反对的有二十三票(列)，弃权的有四票。马尔托夫同志最后说：“这里，显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拥护过这个提议，其余的崩得代表都表示弃权。”(着重号是我加的)(同盟记录第61页)

试问，当时没有实行记名投票，马尔托夫同志怎么会认为显然

---

① 括弧中“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马尔托夫(马)当时站在哪一方面。

有一位崩得分子投票拥护过他马尔托夫的主张呢？

原来是他注意到了表决人数，当表决人数表明崩得参加了投票时，他马尔托夫同志就深信这种参加是有利于他马尔托夫的。

试问我哪里有什么“最大的歪曲”呢？

总票数是五十一票，除去崩得分子只有四十六票，再除去工人事业派分子则只有四十三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的八次表决中有七次是四十三、四十一、三十九、四十四、四十、四十四和四十五个代表参加表决，有一次是四十七个代表（确切些说，是四十七票）参加表决，马尔托夫同志本人在这里也承认有一个崩得分子支持他的主张。可见，马尔托夫所描绘的（而且描绘得很不全面，这一点我们以后就可以看出来）情景原来只是证实和加重我所描写的斗争情况！原来在很多场合弃权的票数是很大的：这恰恰表明整个代表大会对于某些细节问题的兴趣是比较小的，火星派分子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派别分化。马尔托夫所说的崩得分子“弃权显然是帮助了列宁”一语（同盟记录第62页），恰恰是针对马尔托夫本人的：这就是说，只有在崩得分子缺席或者弃权时，我才有时有过胜利的机会。但是每当崩得分子认为值得对斗争干预一下时，他们总是支持马尔托夫同志的，而他们这种干预又不只表现在上述有四十七个代表参加的那次表决中。谁愿意查一查代表大会的记录，谁就能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所描绘的情景是十分奇怪的不完备。马尔托夫同志干脆把崩得参加过的整整三次表决都漏掉了，而这三次表决结果当然都是使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这三次就是：（1）通过佛敏同志提出的把法定多数从五分之四减为三分之二的修正案。赞成的有二十七票，反对的有二十一票（第278页），就是说，有四十八票参加了表决。（2）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关于取消相互补选制的提议。赞成的有二十六票，反对的有二十

四票(第 279 页)，就是说，有五十票参加了表决。最后，(3)否决我所提的只有取得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才能补选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提议(第 280 页)。反对的有二十七票，赞成的有二十二票(甚至是记名投票，可惜这次投票没有写在记录上)，就是说，有四十九票参加了表决。

总结：对于中央机关补选问题，崩得分子只参加四次表决(有三次是我刚才列举过的，有四十八、五十和四十九票参加，还有一次是马尔托夫同志列举过的，有四十七票参加)。所有这四次表决的结果，都是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我的叙述原来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无论是在指出马尔托夫分子和崩得的联盟方面，无论是在指出问题的比较细节的性质(在许多场合都有许多人弃权)方面，也无论是在指出火星派分子没有明显的派别分化(没有举行记名投票；参加讨论的人数很少)方面。

马尔托夫同志想在我的叙述中找矛盾，只是想施展一下不高明的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断章取义地抓住了只言片语，却没有花点气力把全部情景重述出来。

---

党章中最后关于国外组织问题的一条，又引起了充分表明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情况的讨论和表决。当时谈的是承认同盟是我们党的国外组织的问题。阿基莫夫同志当然马上表示反对，他提醒大家回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国外联合会<sup>28</sup>，并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他说：“我首先应当声明，我并不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某种解决办法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实际意义。直到现在我们党内进行的思想斗争显然还没有完结，但是它会在另一个方面和另一种力量配置下继续下去…… 党章第十三条是想把我们代表大会由党的大会变为派别大会这一倾向再一次而且特别鲜明地表现

出来。人们不是要强使俄国所有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党的统一而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所有的党组织统一起来，而是要代表大会消灭少数派的组织，强使少数派消失不见。”（第 281 页）读者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后，竟和阿基莫夫同志一样十分珍爱起“继承性”了。但是，在代表大会上，那些对自己用一个尺度而对别人用另一个尺度的人却起来猛烈地反对阿基莫夫同志。虽然党纲已被通过，《火星报》已被承认，党章几乎全部被通过了，但是恰恰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在原则上”把同盟和联合会分开的“原则”。马尔托夫同志高声喊道：“如果阿基莫夫同志想把问题提到原则的基础上，那我们是一点也不反对的：特别是因为阿基莫夫同志说到在同两个派别斗争时的各种可能的勾结。我们所以要批准一种方针的胜利（请注意，这是在代表大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说的！）并不是要向《火星报》再一次恭维，而是说要最终告别阿基莫夫同志提到的一切可能的勾结。”（第 282 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当时的情况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一切关于纲领问题的争论已经完结以后，还在继续最终告别一切可能的勾结……直到他还没有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时为止！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最终告别”他在代表大会以后第二天就顺利实现的那种可能的“勾结”。但是，阿基莫夫同志在当时就已经比马尔托夫同志有远见得多；阿基莫夫同志援引了“根据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带着委员会名称的一个老的党组织”五年来的工作，并以非常毒辣的有先见之明的警句作结语说：“至于说马尔托夫同志认为我希望我们党内产生另外一种派别是白费心思，那我应当说，连他自己我都抱着希望呢。”（第 283 页）

是的，应该承认，马尔托夫同志确实没有辜负阿基莫夫同志的

希望！

当一个可以算是做过三年工作的老的党委员会的“继承性”遭到破坏时，马尔托夫同志就深信阿基莫夫同志的话是正确的而跟着他走了。可见，阿基莫夫同志取得的胜利是没有花多大代价的。

但是，在代表大会上拥护过——而且一贯拥护过——阿基莫夫同志的只有马尔丁诺夫同志、勃鲁克尔同志和崩得分子（八票）。作为“中派”真正领袖的叶哥罗夫同志采取了中庸立场：请看，他赞成火星派分子的意见，对他们表示“同情”（第282页），并且为了证明这种同情而建议（第283页）要完全回避当时已经提出的原则问题，避而不谈同盟和联合会。他的提议由二十七票对十五票被否决了。显然，除了反火星派分子（八票）以外，几乎所有的“中派”分子（十票）都同叶哥罗夫同志一起投票拥护这个提议（投票总数是四十二票，可见有许多人是弃权的，或者是缺席的，象进行既没有兴趣而结果又是毫无疑义的表决时常常发生的情况）。每当要切实地实行《火星报》的原则时，立刻就暴露出“中派”的所谓“同情”原来只是口头上的同情，而拥护我们的原来只有三十票或者稍微多几票。对鲁索夫的提议（承认同盟为唯一的国外组织）举行的辩论和表决情况，更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已经直接采取了原则的立场，发言拥护这一立场的有李伯尔和叶哥罗夫两位同志，他们说鲁索夫同志的提议是不可能进行表决的，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提议是要杀害其余一切国外组织”（叶哥罗夫语）。他不愿意参加“杀害某个组织”，所以他不仅拒绝表决，并且退出了会场。但是我们要替“中派”首领说一句公道话：他表现了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要大十倍的坚定信心（坚信自己的错误原则）和政治勇气，他并不只是在事关自己那个已在公开斗

争中遭到失败的小组时才拥护“被杀害的”组织。

鲁索夫同志的提议以二十七票对十五票认为可以进行表决，然后又以二十五票对十七票通过了。如果我们把缺席的叶哥罗夫同志加到这十七票中，结果就会看到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的全班人马（总共十八票）。

党章第十三条关于国外组织的全文，是以三十一票对十二票并在六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三十一票这个数目表明，代表大会上大约有多少火星派分子，就是说大约有多少人一贯坚持并且切实执行《火星报》的观点，——这个数目，我们在分析代表大会的表决情况时已经碰到过不下六次（崩得问题在议事日程上的地位，组委会事件，解散“南方工人社”问题，关于土地纲领的两次表决）。而马尔托夫同志却硬要我们相信把这样一个“狭隘的”火星派集团划分出来是毫无根据的！

同时还要指出，在党章第十三条通过以后，立刻就因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声明“拒绝参加表决”而引起了非常值得注意的讨论（第288页）。当时大会主席团讨论了这个声明，并且完全合理地认为，即便把联合会干脆封闭也不能使联合会的代表有任何理由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拒绝参加表决是根本反常的和绝对不能容许的，——这就是当时整个代表大会同主席团一致的看法，其中也有火星报少数派分子，他们在第二十八次会议上还激烈地抨击他们自己后来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所干的事情！当马尔丁诺夫同志为自己的声明辩护时（第291页），起来反对他的有巴甫洛维奇，有托洛茨基，有卡尔斯基，也有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明显地意识到心怀不满的少数派的义务（是在他自己还没有成为少数派以前呵！），并且在讲台上特别有教益地训了他们一通。他指着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高声说，“或者

你们是代表大会的成员，那末你们应该参加大会的一切工作（着重号是我加的；当时马尔托夫同志还没有觉察到少数服从多数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或者你们不是代表大会的成员，那末你们就不能留在会场上…… 联合会的代表们的声明使我不得不提出两个问题：他们是不是党员呢，是不是代表大会的成员呢？”（第 292 页）

马尔托夫同志那时还在教训阿基莫夫同志了解党员的义务呢！可是，阿基莫夫同志那时就说他对马尔托夫同志寄托着某种希望，并不是徒然的…… 不过这种希望是马尔托夫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才实现的。当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自己而只涉及到别人时，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对第一次（我记得是这样）由马尔丁诺夫同志使用的所谓“非常法”这一吓唬人的字眼，也是充耳不闻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回答那些劝他收回本人声明的人说：“我们听到的解释，并没有解释清楚，究竟这是个原则的决定呢，还是用来对付联合会的一种非常办法。如果是一种非常办法，我们就认为这是对联合会的一种侮辱。叶哥罗夫同志也同我们一样认为这是用来对付联合会的非常法（着重号是我加的），所以甚至退出了会场。”（第 295 页）当时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都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坚决反对把代表大会表决结果看作一种侮辱的荒谬思想，反对这种确实荒谬的思想；托洛茨基同志在拥护代表大会根据他的提议通过的决议（说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位同志可以认为自己已经得到十分满意的解释）时说，“这个决议是有原则的而不是庸俗的性质，我们决不顾忌谁会因为通过了这个决议而感到委屈”（第 296 页）。但是，很快就证明，小组习气和庸俗观念在我们党内还是很厉害的，而我用着重号标出的那些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一些响亮的空话而已。

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拒绝收回自己的声明，并在大会代表一致说他们“真是枉费心机！”的叹息声下退出了代表大会。

###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

代表大会在通过党章以后，接着又通过了关于各区组织的决议以及好几个关于党内个别组织的决议，在进行了我在上面分析过的关于“南方工人社”的富有教益的讨论以后，跟着就讨论党中央机关的选举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整个代表大会都期待着《火星报》组织作一个权威性的介绍，但是《火星报》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因为《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竟想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公开的自由的斗争取得多数。同时我们还知道，早在召开代表大会很久以前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所有代表都知道选出两个三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来改组编辑部的计划。为了阐明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让我们把这个计划比较详细地分析一下。

我在代表大会议事日程草案上加了一个附注来说明这个计划，原文如下<sup>①</sup>：“代表大会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委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必要时，这六个人在一起，经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补选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代表大会作有关的报告。这个报告经大会批准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就可以分别进行补选。”

从这个附注可以十分肯定而明确地了解到上述计划的内容就

---

<sup>①</sup> 见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5页，并见同盟记录第53页。

是：在最有威信的实际工作领导者的参加之下改组编辑部。这个计划所包括的两个特点，是每一个愿意稍微留心阅读上述原文的人立刻就可以看出的。可是，现在就连最粗浅的道理也必须加以解释。这个计划的内容正是要改组编辑部，不一定是扩大，也不一定是缩减委员人数，而正是加以改组，因为可能扩大或可能缩小的问题还是一个悬案：补选只是预定在必要时才实行的。人们对改组问题提出种种设想，有人预计可能把编委人数缩小或者扩大到七个人（我本人从来就认为七人小组比六人小组更适当）甚至扩大到十一个人（我认为如果同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特别是同崩得以及波兰社会民主党实行和平联合时，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主张“三人小组”的人通常会忽略的最主要一点，就是要求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解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将来的补选问题。“少数派”方面所有身为本组织成员并出席代表大会的同志，都知道而且拥护这个计划（有些人曾特别表示赞同，有些人则缄默地表示赞成），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种要求的意义。第一、为什么正是把三人小组并且仅仅把三人小组作为改组编辑部的出发点呢？显然，如果提出这个计划的用意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扩大委员会，如果大家认为这个委员会是个真正“协调的”集体，那末这个计划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扩大一个“协调的”委员会时，不以这个委员会的全体人员为出发点，而只以其中一部分人为出发点，那就未免太奇怪了。显然，并不是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被认为完全适于讨论和解决改组编委会的成员问题，即把旧的编辑小组变成党机关的问题。显然，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扩大的办法进行改组的人也承认旧成员是不协调的，是不符合党机关的理想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为了扩大六人小组而先把它缩减为三人小组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因为问题暂时被“个

人意气”弄模糊了，人们才忘记这一点。

第二、从上面引用的那段原文可以看出，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三个委员一致同意，也还不能扩大三人小组。这一点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为了实行补选，必须六个人中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即四票表示同意；就是说，只要中央委员会三个当选的委员说“否决”，编委三人小组就根本不能扩大了。反过来说，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三个委员中有两个人反对实行补选，而补选还是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所有三个委员同意之下实现的。所以很明显，当时的用意是，要让代表大会所选出的那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在把旧的小组变成党机关时有决定权。至于我们当时大致提出的是哪些同志，从以下事实便可以看出来：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前曾一致选举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辑部中的第七个委员，使他在代表大会上必要时可以用编委名义表示意见；除了巴甫洛维奇同志以外，还有《火星报》组织中一个身为组委会委员的老组员被提为第七个委员，这个老组员后来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这样，选出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显然是打算：（1）改组编辑部，（2）消除编辑部中某些与党机关不相适应的旧的小组习气的特点（假如没有什么可消除的，那就根本不必想出最初的三人小组了！），最后，（3）消除这个著作家集团的“神权”特点（消除的办法就是吸收优秀实际工作者参加解决扩大三人小组的问题）。这个由全体编委看过的计划，显然是根据三年来的工作经验，并完全符合我们一贯奉行的革命组织原则的：在《火星报》问世的那个涣散时代，各个团体经常偶然地自发地形成起来，必然带有一些有害的小组习气的色彩。建立党就是要消除这种特点，而且也需要消除这种特点；吸收一些优秀实际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因为有些编委一向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编辑部加入党机关系统

不应当只是一个著作家集团，而应当是一个政治领导者集团。至于让代表大会选举最初的三人小组，这从《火星报》的一贯政策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十分慎重地筹备了代表大会，等待大家充分了解纲领、策略和组织方面发生争论的原则问题；我们并不怀疑代表大会一定是火星主义的代表大会，即绝大多数代表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一定是意见一致的（承认《火星报》为指导性机关报的决议也部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当让那些担负了传播《火星报》思想并准备把《火星报》变成政党这一切工作的重担的同志自己去决定，究竟谁是最适合参加新的党机关的候选人。只是因为“两个三人小组”计划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计划，只是因为这个计划完全符合《火星报》的全部政策，完全符合比较了解问题的人关于《火星报》所知道的一切，所以这个计划才得到大家的赞同，而没有任何一个计划可以同它抗衡。

所以，鲁索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首先提议选出两个三人小组。虽然马尔托夫曾用书面通知我们，说这个计划同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有联系，但是那些拥护马尔托夫的人却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把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的争论转到这个罪名是否正确的问题上。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中间谁也不敢说半句关于同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有关的各种色彩的原则区别。他们宁愿采用更流行更廉价的手法——意气用事，说什么可能使人感到受侮辱，并装模作样地说，编辑部问题已经由于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而得到解决了。柯里佐夫同志为反对鲁索夫同志而提出的后一个论据，简直是瞎说。在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规定了——当然不是偶然规定的——两个单独项目（见记录第10页）：第四项是“党中央机关报”，第十八项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是第一。第二、在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全体代

表都坚决声明说这不是批准编辑部而是批准方针<sup>①</sup>，谁也没有抗议过这个声明。

因此，认为代表大会批准一定的机关报其实就是批准编辑部这一说法，即少数派方面重复过许多次（柯里佐夫，第 321 页，波萨多夫斯基，同上页，波波夫，第 322 页，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说法，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这是谁都看得清楚的手法，这种手法是要掩盖他们所背弃的在大家还能真正大公无私地看待中央机关人选问题时而采取过的那种立场的行为。这种背弃行为决不能用原则动机来辩护（因为少数派明知在代表大会上提起“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问题对他们自己是很不利的，所以也就没有提起这一点），也不能拿六人小组或三人小组是不是真有工作能力的事实材料作借口（因为一涉及这些材料，就会有一大堆反对少数派的证据）。所以他们只好用所谓“严密的整体”，“协调的集体”，“严密的如结晶般完整的整体”等空话来搪塞。难怪这些论据立刻就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无聊的话”（第 328 页）。三人小组计划本身就清楚地证明不够“协调”，而代表们在一个多月的共同工作中得到的印象，显然又给他们提供了大批可以独立判断问题的材料。当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暗示到这种材料时（在他看来这是说话不慎和考虑不周的

---

① 见记录第 140 页，阿基莫夫发言说：“……据说我们将把中央机关报选举问题留到最后去谈”；穆拉维约夫发言反驳阿基莫夫，说阿基莫夫“对于未来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问题非常关心”（第 141 页）；巴甫洛维奇发言说，我们任命了机关报，也就得到了“我们能够用来实行阿基莫夫同志所关心的那些手段的具体材料”，至于《火星报》应该“服从”“党的决议”，那是毫无疑问的（第 142 页）；托洛茨基发言说，“既然我们不是批准编辑部，那末我们究竟是批准《火星报》的什么东西呢？…… 我们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方针……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旗帜”（第 142 页）；马尔丁诺夫发言说，“……我也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认为我们现在讨论承认代表一定方针的《火星报》为我们中央机关报的问题时，不应当涉及到选举方法或批准其编辑部的问题；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议事日程的适当场合再谈……”（第 143 页）

结果：第 321 页和第 325 页，他说他是“有条件地”使用了“疙瘩”一词），穆拉维约夫同志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现在代表人会上的多数派已经十分明白，这样的<sup>①</sup> 疙瘩无疑是存在的”（第 321 页）。当时少数派宁愿把“疙瘩”一词（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不是穆拉维约夫而是波萨多夫斯基）了解为仅仅是涉及个人意气的东西，不敢接受穆拉维约夫同志的挑战，不敢根据问题实质提出任何一种论据为六人小组辩护。结果就产生了一场十分可笑的争论：多数派（以穆拉维约夫同志为代言人）说他们十分了解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真正意义，而少数派根本不听这一点，硬说“我们没有可能进行分析”。多数派不仅认为可能进行分析，而且已经“进行分析了”，并且说这种分析的结果已使他们看得十分明白。少数派大概是害怕分析，所以就用一些“无聊的话”来掩饰自己。多数派劝人“注意到，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只是著作家集团”，多数派“希望，当选来主持中央机关报的都是一些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即符合我所说的那些要求的人物”（即符合于不只是对著作家提出的那些要求的人物，第 327 页，朗格同志的发言）。少数派又不敢接受挑战，一字不提他们究竟认为谁适合参加不只是著作家集团的委员会，究竟谁是“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少数派仍旧拿所谓“协调性”作护身符。不但如此，少数派甚至拿一些根本不符合原则的、理应受到公正抨击的理由做论据，说什么“代表大会既没有道义权利，也没有政治权利来改变编辑部”（托洛茨基语，第 326 页）；说什么“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原文

<sup>①</sup> 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指的究竟是什么“疙瘩”，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始终不知道。穆拉维约夫同志却在同一会议上（第 322 页）提出抗议，说人家把他的思想转述错了，后来他在批准记录时又直截了当地声明，说他“所讲的是在代表人会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疙瘩，这是原则性的疙瘩，目前这些疙瘩的存在，可惜已经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事实了”（第 353 页）。

如此!>问题”(也是他说的);说什么“那些落选的编委应当怎样对待代表大会不愿意把他们留在编辑部的事实呢?”(察辽夫语,第324页)①

这样的理由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埋怨和诉苦方面了,这就是公开承认他们在真正原则的论证上,在真正政治的论证上破了产。多数派立刻就用恰如其分的字眼——庸俗观念——来形容这种提问题的方法(鲁索夫同志语)。鲁索夫同志公正地指出,“一个革命家居然说出这样一些根本同党的工作概念相反,同党的道德概念相反的奇怪言论。反对选举三人小组的一些人所持的基本理由可归结为,以纯粹庸人的观点看待党的事业(所有的着重号都是我加的)…… 我们如果持着这种不是党性的而是庸人的观点,那末我们在每次选举时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选举甲而选举乙,甲会不会生气呢;如果我们不选举组委会某某委员而选举另一个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组委会某某委员他会不会生气呢。同志们,这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如果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说些相互捧场的话,不是为了表示庸人的交情,而是为了建立党,那末我们根本拒绝这样的观点。我们既然必须选出负责人员,这里也就谈不上什么对某个落选者是不是信任的问题,而只看对事业是不是有利和当选人是不是适合他当选后所担任的职务的问题。”(第325页)

我们建议每一个愿意独立研究党内分裂的原因并在代表大会上探讨这个分裂的根源的人,都把鲁索夫同志的演说读一遍或者读几遍,鲁索夫同志提出的理由少数派不仅没有推翻,而且也没有

---

① 参看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的演说:“……如果你们从旧编辑部六个人当中选出三个人,那末你们就是认为其余三个人都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而你们这样做,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根据。”

抗议过。这样一个起码的基本真理本来是抗议不了的；鲁索夫同志自己很公正地指出，人们忘记了这个真理只是由于“神经过敏”。这样来说明少数派怎样从党性观点滚到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观点，确实最不会使少数派感到不愉快<sup>①</sup>。

可是，少数派根本无法找出一条合理的切实的理由来反对选举，所以他们除了把庸俗观念加进党的事业中去，还公然采取了一种简直是无理取闹的手段。例如，波波夫同志劝穆拉维约夫同志

---

① 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况》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同他对于所涉及的其他问题的态度一样。他并没有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次争论情况的全貌。他竟然回避了这次争论中提出来的唯一真正原则的问题：是庸人的交情呢，还是选举负责人员？是党性观点呢，还是怕某某人生气？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也只顾于从整个事件中断章取义地引用了一些没有联系的词句，并且还加上许多漫骂我的话。马尔托夫同志，这还少了一点呀！

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拿来同我捣乱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代表大会没有选举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维尔三位同志。他所持的那种庸俗观念使他看不到这个问题不体面的地方（为什么他不去质问他们编辑部的同事普列汉诺夫同志呢？）。他硬说我的话自相矛盾，说我一向认为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对待六人小组问题的行为“不恰当”，同时又要求全党公论。其实这里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马尔托夫同志如果愿意费点气力把问题的全部事件作一个联贯的叙述，而不只是断章取义，那末他自己也不难了解到这一点。用庸俗观念对待问题，意气用事，这当然是不恰当的；为了全党公论，必须从实质上估计六人小组比三人小组究竟有什么优越的地方，估计负责职务的候选人，估计各种色彩，但是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却连提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马尔托夫同志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记录，就会知道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出一系列反对六人小组的理由。请看这些演说中的几段话吧：第一、旧的六人小组中间显然有原则性的疙瘩；第二、最好把编辑工作的技术手续简化一下；第三、事业的利益要高于庸人的交情；只有实行选举才可以保证当选人适合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第四、决不能限制代表大会的选举自由；第五、党现在所需要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当只是著作家集团，中央机关报内不仅必须有著作家，而且要有管理人；第六、中央机关报内应该有完全确定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第七、六人委员会往往没有工作能力；它的工作并不是靠一个不正常的章程实现的，而是不管有没有这个章程都能实现；第八、办报工作是党的（而不是小组的）事业等等。如果马尔托夫同志对于六人小组没有当选的原因很感兴趣，那就请他细心考虑一下这些理由中的每一条理由，并把其中某一条——哪怕是一条——理由驳倒吧。

“不要接受为难的委托”（第 322 页），他这种手段不是只能称为无理取闹吗？这不就是如同索罗金同志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笼络人心”吗？（第 328 页）这不正是在找不出政治理由时想利用“个人意气”吗？索罗金同志所说“我们一向反对这种手段”一语，说得是不是正确呢？“难道捷依奇同志公然企图对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给以当众侮辱的行为是可以容许的吗？”<sup>①</sup>（第 328 页）

现在我们要把大会讨论编辑部问题的情况作一个总结。少数派没法驳倒（而且根本没有驳倒过）多数派再三援引过的事实，即三人小组计划是代表们在大会之初以及在大会以前已经知道了的，因此这个计划所根据的一些理由和材料是同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和争论不相干的。少数派在拥护六人小组时采取了原则上错误的和不可容许的从庸人角度出发的立场。少数派暴露了自己完全忘记选举负责人员问题上的党性观点，甚至根本没有估计每个重要职务的候选人以及这个候选人是不是适合这个职务。少数派始终回避切实讨论问题，却一味援引所谓协调性，“流眼泪”和“发脾气”（第 327 页，朗格的发言），似乎“有人想要杀害”某某人。少数派甚至不惜采取“笼络人心”、叫嚷选举是“罪恶”以及诸如此类不能容许的手段，而这都是“神经过敏”的结果（第 325 页）。

---

① 索罗金同志在同一会议上是把捷依奇同志的话了解成这样的（参看第 324 页——“同奥尔洛夫的激烈对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第 351 页），他“根本没有讲过类似的话”，但他自己又立刻承认他讲过非常“类似的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我没有说过看谁敢这样做，而只是说：我很想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敢（原文如此！）捷依奇同志越说越端了！拥护象选举三人小组这样罪恶的（原文如此！）提议”（第 351 页）。捷依奇同志不是驳倒而是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话。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责难，他说“这里（在少数派拥护六人小组的理由中）把所有的概念都混淆了”。捷依奇同志证实说，索罗金同志提醒大家要记住“我们既是党员，就应当处处以政治上的理由为依据”这一起码真理是完全恰当的。叫嚷实行选举是罪恶行为，这不仅是堕落到庸俗观念，简直是堕落到无理取闹的地步了！

庸俗观念同党性作斗争，最坏的“个人意气”同政治上的理由作斗争，无聊的话同起码的革命责任感作斗争——这就是我们代表大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因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而发生的斗争的实质。

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当代表大会已经以十九票多数对十七票并在三票弃权的情况下否决了关于批准旧编辑部全体人员的提议（见第330页和勘误表），而旧编委们也已经回到会场上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代表旧编辑部多数提出的声明”中（第330—331页）更厉害地表现了他那种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让我们把这篇集体声明和我对该声明的答复（第332—333页）逐条详细地分析一下吧。

马尔托夫同志在旧编辑部未被批准以后说，“从今天起，旧《火星报》就停止存在了，所以把它的名称改一下，也许更前后一贯些。无论如何，我们认为代表大会新通过的决议大大缩小了它在头一次会议上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

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出了在许多方面确实值得注意和值得玩味的政治一贯性问题。我已经援引过大家在批准《火星报》时说的那些话来回答这一点（记录第349页，参看上面第82页）<sup>①</sup>。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把政治不一贯性表现得最明显的一件事实：至于表现了这种不一贯性的究竟是代表大会的多数还是旧编辑部的多数，请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同时，我们还要请读者自己解决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得正是时候的另外两个问题：（1）想把代表大会关于选举负责人员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决定看作“缩小对《火星报》的信任”，——这是庸人观点还是党

---

<sup>①</sup> 见本书第106—107页。——编者注

性观点？（2）旧《火星报》是从什么时候起真正停止存在的呢？是从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开始编辑第四十六号的时候起呢，还是从旧编辑部多数开始编辑第五十三号时候起？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很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那末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实问题。

马尔托夫同志继续说，“既然现在已经决定要选举三个人组成编辑部，我就要用本人和其他三个同志的名义声明，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参加这样一个新编辑部。至于我个人，我要补充说：如果某些同志真想把我的名字当作一个候选人列入这个‘三人小组’，那我应当把这件事情看作我不应当受的侮辱（原文如此！）。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注意到决定改变编辑部时所发生的情况。据说这样决定是因为考虑到有什么‘摩擦’<sup>①</sup>，是因为旧编辑部没有工作能力，可是代表大会从一定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向编辑部问过这种摩擦，甚至没有指定专门委员会提出关于它的工作能力问题。（奇怪得很，少数派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向代表大会建议“质问编辑部”或指定专门委员会！是不是因为在《火星报》组织分裂以后以及在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两位同志信中提到的那次谈判失败以后，这就没有益处了呢？）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不能不把某些同志以为我会同意在这样改组后的编辑部中工作的推测，看作是对

---

① 马尔托夫同志大概是指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用过的“疙瘩”字眼而言。我再说一遍，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始终没有向代表大会说明他想说些什么，而同样使用这个字眼的穆拉维约夫同志却说明，他指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中新表现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疙瘩。读者一定记得，有四个编委（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我）参加过的唯一真正原则性的讨论就是关于党章第一条问题的讨论；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两位同志曾用书面诉苦说，人们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当作“改变”编辑部的理由之一。马尔托夫同志在这封信中认为“机会主义”同改变编辑部的计划有明显的联系，而他在代表大会上却只隐约地暗示“什么摩擦”了。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他已经忘记了！

我本人政治名誉的中伤……”<sup>①</sup>

我故意把这段话全部引下来，是为了使读者知道在代表大会以后十分流行的一种行为的标本和开端，而这种行为只能叫作无谓争吵。我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已经使用过这个字眼，不管编辑部怎样感觉不满，我不得不反复使用它，因为它无疑是个用得正确的字眼。有人以为无谓争吵一定是出于“卑鄙的动机”（正如新《火星报》编辑部所推论的那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凡是稍微熟悉我们的流放生活和侨居生活的革命家，都一定看见过数十次无谓争吵的现象，当时由于“神经过敏”以及由于不正常的沉闷的生活条件，人们往往提出并且嘟囔一些最荒谬的责难、猜疑、自咎、“个人意气”等等。不管这种无谓争吵表现得多么卑鄙，但是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定要在这些无谓争吵中寻找卑鄙的动机。只有用“神经过敏”一语才可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演说中的上述言论，即把谬论、个人意气、幻想出来的恐怖、笼络人心的行为、矫揉造作的侮辱和中伤等搅做一团的言论。沉闷的生活条件在我们这里产生数以百计的无谓争吵，而一个政党假如不敢照实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

---

(1) 马尔托夫同志还补充说：“这样的角色恐怕只有梁赞诺夫才会同意扮演，至于你们想必从他的工作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的那个马尔托夫，是决不会同意扮演这种角色的。”既然这是对梁赞诺夫的一种个人攻击，马尔托夫同志也就把这个声明收回了。可是，梁赞诺夫所以在代表大会上被当作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决不是因为大家注意到他的某些个人品质（这些个人品质是不应该涉及的），而是因为大家注意到“斗争社”的政治面貌，注意到“斗争社”的政治错误。马尔托夫同志收回他所臆想的或者他确实给人硬加上的个人侮辱，这样做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忘记那些应当使党接受教训的政治错误。“斗争社”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受到斥责，是因为它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和“毫无原则理由造成的分散状态”（第38页，马尔托夫同志的演说）。这样的政治行为，不仅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在普遍混乱时期，当它还是在一个小组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应该受到斥责，而且在党代表大会以后，在混乱状态肃清时期，即使是由“《火星报》编辑部多数和‘劳动解放社’多数”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完全应该受到斥责。

人尊敬了。

如果从这一团糟的言论中可以分出什么原则性的东西，那末势必得出一个结论：“实行选举是同破坏政治名誉毫不相干的”，“否认代表大会有权实行新的选举，有权随便变动负责人员，有权改组由它全权委任的委员会”，那末就会把问题弄得一塌糊涂，而“马尔托大同志在是否可以从旧委员会中只选举一部分委员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表现了政治概念的极大的混淆”（这是我在代表大会上说的话，第332页）。①

现在我不谈马尔托夫同志对于是谁提出三人小组计划这一问题所作的“个人”评论，而只谈一下他对于旧编辑部没有被批准这一事实所作的“政治”估计：“……现在发生的事件是代表大会后半期进行的那个斗争的最后一幕〈对呵！但这后半期是从马尔托夫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落入阿基莫夫同志牢笼的时候开始的〉。谁都知道，实行这种改革时所注意的并不是‘工作能力’，而是争取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影响〈第一、谁都知道，当时既注意工作能力，又注意中央委员会成员问题所引起的意见分歧，因为提出“改革”计划时还根本谈不上后一种意见分歧，当时我们和马尔托夫同志还一起选出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委会第七个委员呢！第二、我们已经根据文件材料指明，当时的问题关系到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当时的问题归根到底（à la fin des fins）归结为两个不同的名单：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特拉文斯基、波波夫，另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编辑部的多数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又唱起阿基莫夫式的调子来了：问题在于每一个党代表大会上的每一个多数派随时随地都要努力争取影

---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59、460页。——编者注

响，以便在中央机关中争得多数而把这种影响巩固起来，但是人们把这个问题转移到机会主义的诽谤方面去了，说什么编辑部的“工具”，说什么编辑部的“简单附属品”，正象同一个马尔托夫同志在比较晚的时候说的那样，第334页。所以必须缩减编辑部委员人数<sup>(!!)</sup>。因此我也就不能加入这样一个编辑部（请仔细看一看这个“因此”二字：编辑部什么时候才能把中央委员会变成附属品或工具呢？不是只有当编辑部在总委员会内拥有三票并且滥用这个优势的时候才会如此吗？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同样，当选为第三个委员的马尔托夫同志随时都能阻止任何滥用职权的现象，并以自己的一票来消灭编辑部在总委员会内的任何优势，——这难道不也是很明显的吗？所以问题正是在于中央委员会的人选，而所谓工具和附属品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诽谤而已）。我和旧编辑部的多数认为，代表大会将会结束党内的‘戒严状况’而奠定党内的正常秩序。谁知用非常法反对个别团体的戒严状况仍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了。只有在保存旧编辑部的全体成员时，我们才能担保编辑部根据党章享有的那些权利不会使党受到危害”……

以上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第一次提出所谓“戒严状况”口号的那段言论的全文。现在请看我对他的答复：

“……虽然我纠正了马尔托夫所发表的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是私人性质的这样一个声明，但是我并不想反对马尔托夫所说的我们不批准旧编辑部是我们所实行的一个有‘政治意义’的步骤的断语。恰恰相反，我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同意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这个步骤是有巨大的政治意义的，——不过不是马尔托夫所强加给它的那种政治意义罢了。他说，这是为争取影响俄国境内的中央委员会而进行的斗争的一幕。我还比马尔托夫更进一步。到现在为止，作为一个并非党的正式组织的《火星报》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争取影响而进行的斗争，但现在问题已经进了一步，已经是要在组织上巩固这种影响，而不只是为争取这种影响而斗争了。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样希望影响中央

委员会是我的罪过，而我却认为我过去和现在力求在组织上巩固这种影响正是我的功劳，由此可以看出，我和马尔托夫同志在政治上的分歧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原来我们甚至竟是在用不同的语言讲话。如果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仍然是照旧为争取影响而斗争，而不是完全获得和巩固这种影响，那末这些工作、这些努力又有什么意思呢？是的，马尔托夫同志说得完全对：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无疑是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步骤，它证明我们选定了现在已经显露出来的方向之一作为我们党今后工作的方向。‘党内戒严状况’、‘专为对付个别分子和个别团体而施行的非常法’等等吓唬人的字眼，是绝对吓不倒我的。对那些不坚定的和动摇的分子，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必须造成一种‘戒严状况’，而我们的整个党章、我们现在已由代表大会批准的整个集中制，正是为了克服许多政治态度模糊的根源而造成的‘戒严状况’。为了对付这种模糊态度，我们正需要有一个特别的、甚至是带有非常性质的法律；而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步骤给这样的法律和这样的办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就是正确地规定了政治方向。”①

我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这次发言提要中用着重号指出的一句话，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况》中（第16页）故意删掉了的。他不喜欢这句话而且不愿意了解这句话的明显意义，那是毫不奇怪的。

马尔托夫同志，“吓唬人的字眼”一语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意味着嘲笑，嘲笑那些小题大作的人，嘲笑那些用装腔作势的空话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的人。

唯一能够引起而且确实已经引起马尔托夫同志“神经过敏”的小小的简单事实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遭到了失败。这一简单事实的政治意义在于，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取得胜利以后就着手巩固自己所争得的影响，方法就是使自己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取得多数，建立起组织基础，以便根据党章克服多数派认为是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一切东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61页。——编者注

西<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怀着一种目瞪口呆的恐怖神情说什么“争取影响的斗争”，抱怨什么“戒严状况”，那只不过装腔作势的空话，吓唬人的字眼罢了。

马尔托夫同志不同意这一点吗？那末我们要请问他，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次党代表大会，是不是一般可以设想出这样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竟会不去努力（1）使自己在中央机关内占多数，（2）使这个多数拥有克服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权力来巩固已经赢得的影响呢？

临到选举的时候，我们代表大会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把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内三分之一的票数给党的多数派呢，还是给党的少数派？保留六人小组和通过马尔托夫同志所提的名单，就是给我们以三分之一的票数，而给马尔托夫同志方面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选举三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委员和通过我们所提的名单，就是给我们以三分之二的票数，而给马尔托夫同志方面以三分之一的票数。马尔托夫同志拒绝同我们妥协或向我们让步，并在代表大会上用书面向我们提出挑战，而当他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时，他就如泣如诉地说起“戒严状况”来了！难道这不是无谓争吵吗？难道这不又是知识分子软弱性的表现吗？

说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想起考茨基不久以前对于这种知识分子软弱性所作的精辟的社会心理学的估计。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往往患同样的毛病，我们向更有经验的同志们学习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疗法是很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引证考茨基对于某些知识

① 火星报少数派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态度模糊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在哪里呢？第一、表现在他们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说出的一些机会主义词句；第二、表现在他们和陶基茨夫同志以及李伯尔同志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在代表大会后半期成长得很快；第三、表现在他们竟把选举中央机关报负责人员的问题降低到一味表现庸俗观念、专说无聊话以至笼络人心的地步。在代表大会以后，所有这些可爱的品质表现得更厉害了。

分子所作的估计，只不过是表面上离开本题罢了。

“……现在关于知识分子①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问题又使我们产生了很多兴趣。我的同事们（考茨基本人是个知识分子、著作家和编辑）一定会往往由于我承认有这种对抗而表示愤慨。但是这种对抗确实是存在的，企图（这里也象在其他场合一样）用否认事实的办法来掩饰这种对抗，那就未免是很不适当的策略了。这种对抗是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的社会对抗。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完全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会改变自己的性质。我在以后的叙述中谈的主要不是这种至今还是本阶级中例外现象的知识分子。在以后的叙述中，如果不特别附带说明，那我只是把知识分子一词了解为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脚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级是同无产阶级有某种对抗的。

这种对抗和劳资对抗不同。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虽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式的，并且他在没有变成流民以前不得不维持这种水平，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经常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一定程度的社会轻视。所以，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对抗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情绪上和思想上也就有某种对抗。

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从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中汲取来的。当他成为伟大而强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伟大而强有力的了。在他看来，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作为的。无产者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以无名群众的一分子的资格——毫不计较个人利益，毫不考虑个人荣誉——进行着斗争，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那贯穿在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中的纪律。

知识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这样或那样运用实力来进行斗争，而是利用论据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

---

① 我把德文 Literat. Literatentum 一词译为知识分子或知识界，因为德文 Literat. Literatentum 一词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一般所谓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不同的脑力劳动者（即英国人所谓 brain worker）。

人的信念。他只有凭靠自己个人的品性，才可以获得一定的意义。因此，在他看来，发挥本人个性的完全自由是顺利进行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整体的从属部分而服从这个整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心意的。他认为纪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是不必遵守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之列的……

……尼采的哲学主张迷信超人，在这种超人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保证他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认为对任何伟大的社会目的的任何程度的服从都是卑鄙可耻的事情，这个哲学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它使知识分子完全不能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除了尼采以外，易卜生也是适合知识分子情绪的知识分子人生观的出色代表人物。易卜生的医生斯多克芒（在《人民公敌》戏剧内）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必然会同无产阶级运动以及一般人民运动发生冲突，如果他企图在这个运动中有所作为的话。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运动也和任何民主<sup>①</sup>运动一样是以尊重多数同志为基础的。斯多克芒这类典型的知识分子认为‘紧密结合的多数派’是应当被推翻的怪物。

……李卜克内西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理想的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情绪，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是他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特点，他毫无怨言地在普通行列中行进，他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他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按照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一落到少数地位时就抱怨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的那种颓丧的啜泣（weiches Gewinsel）。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没有想要出什么风头，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sup>②</sup>。

马尔托夫及其同事们只是因为一个旧小组没有被批准就拒绝

① 最能表明我们那些马尔托夫分子把一切组织问题都弄得一塌糊涂的事实，就是他们在转到同基莫夫和不适当的民主主义方面时，却又埋怨用民主手续选举编辑部成员的办法，即由大家预先拟订而后在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的办法！先生们，也许这就是你们的原则吧？

② Karl Kautsky: «Franz Mehring», «Neue Zeit», XXII, I, S. 101-103, 1903, №4 (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载于《新时代》杂志第22年卷第1分卷第101—103页，1903年第4期。——编者注)。

担任工作，埋怨人家用戒严状况和非常法来“对付个别团体”，这不过是知识分子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发出的颓丧的啜泣罢了，当“南方工人社”和“工人事业社”被解散的时候，马尔托夫对这些个别团体还是不重视的，一旦他的团体被解散时却重视起来了。

马尔托夫首先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sup>①</sup>（尤其是在代表大会以后）喋喋不休地对“紧密结合的多数派”发出的诉苦、非难、暗示、斥责、造谣和诽谤，也不过是知识分子处在少数地位时发出的颓丧的啜泣罢了。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紧密结合的多数派举行了自己的非正式会议，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对他们不愉快的事实的，这件事实就是那些被少数派邀请参加少数派非正式会议的代表竟拒绝出席这种会议，而那些乐意参加这种会议的代表（叶哥罗夫之流、马霍夫之流、勃鲁克尔之流），却又由于少数派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作过斗争而不能邀请。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人家提出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不愉快的事实的，这件事实就是那些时常跟着反火星派分子跑的机会主义者连同一部分反火星派分子组成了一个紧密结合的少数派，拼命拥护机关方面的小组习气，拥护言论方面的机会主义，拥护党务方面的庸俗观念、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软弱性。

在下一节我们将要说明，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形成“紧密结合的多数派”这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事实的原因何在，以及少数派为什么不顾一切挑战而一味小心翼翼地对多数派形成的原因和经过的问题避而不谈。但是，让我们首先把我们对于代表大会讨论情况的分析告一段落吧。

---

<sup>①</sup> 见代表大会记录第337、338、340、352页以及其他各页。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马尔托夫同志提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决议案（第336页），我把这个决议案的三个基本特点称为“三着致命棋”。这三个特点就是：（1）按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而不是按照单个候选人来进行表决；（2）在宣读名单以后，必须再放过两次会议（大概是为了讨论）；（3）在没有绝对多数时，第二次表决就算是最后的表决。这个决议案是考虑得非常周密的战略（对于敌人也要说句公道话呀！），这个战略是叶哥罗夫同志所不同意的（第337页），可是如果那七个人——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没有退出代表大会，那末这个战略是一定会保证马尔托夫取得完全胜利的。产生这个战略，是因为火星报少数派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直接协定”（而火星报多数派内部则有这种协定），不仅是同崩得以及勃鲁克尔，而且同叶哥罗夫以及马霍夫一伙同志也没有并且不可能有“直接协定”的。

你们想必记得，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哭哭啼啼地说，似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是以他和崩得订立直接协定为前提的。我再说一遍，这是马尔托夫同志因害怕而产生的想法，当时叶哥罗夫同志不同意按名单进行表决（叶哥罗夫同志“还没有失去自己的原则”，大概就是那些使他在估计民主保证的绝对价值时同哥里德勃拉特打成一片的原则吧），这也就明显地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实，他当时甚至同叶哥罗夫也谈不上什么“直接协定”的。但是同叶哥罗夫以及同勃鲁克尔的联盟在当时是可能而且确实有过的，这里所谓联盟，就是说每当马尔托夫分子同我们发生重大冲突时，每当阿基莫夫及其伙伴必须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时，马尔托夫分子总是保证能得到叶哥罗夫和勃鲁克尔两个人的支持的。阿基莫夫和李伯尔两位同志一定会把选举六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编委，以及选举马尔托夫所提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当作害处较

少的办法，当作使《火星报》的目的最难达到的办法（见阿基莫夫关于党章第一条的发言以及他对马尔托夫抱的“希望”），这是丝毫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疑问的。按照名单进行表决，放过两次会议以及重新进行表决，所有这些办法都是预定不用任何直接协定而又能以几乎是机械的准确性达到这种结果的。

但是，我们的紧密结合的多数派仍然是紧密结合的多数派，所以马尔托夫同志的迂回办法也就不过是一种拖延手段，我们不能不拒绝这种办法。少数派曾用书面（在声明书中，第 341 页）埋怨这一点，按照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两个人的先例拒绝参加表决和选举中央委员会，理由是“由于已经有了进行选举的那些条件”。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埋怨选举条件不合常态的话（《戒严状况》第 31 页）是在党内那些数以百计的搬弄是非的人面前滔滔不断地到处宣扬的。但是，这里有什么不合常态的地方呢？是不是秘密投票制，即事先由代表大会的章程规定出来（章程第六条，记录第 11 页）而不能认为这里面有什么“虚伪”或“不公平”成分的秘密投票制呢？是不是被怯懦的知识分子看作“怪物”的那个紧密结合的多数派的形成呢？或者是这班高贵的知识分子想违背他们自己在代表大会面前说的承认大会一切选举（第 380 页，代表大会章程第十八条）的诺言的不合常态的愿望吗？

波波夫同志巧妙地暗示了这种愿望，他在进行选举的当天的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问道：“既然有半数代表拒绝投票，请问主席团是不是确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有效的和合法的呢？”<sup>①</sup>主席团当然回答说确信这一点，并提醒大家注意同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有关的事件。马尔托夫同志赞成主席团的意见，并且直

① 见第 342 页。这是指选举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而言。当时投了二十四张选票（总共有四十四票），其中两张是空白票。

截了当地说波波夫同志弄错了，说“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合法的”（第 343 页）。请读者自己判断一下，只要把这个在党面前作的声明同在代表大会以后干的事情以及在《戒严状况》中所说的“还在代表大会上就已开始的党内半数的暴动”（第 20 页）一语对照一下，就会看出究竟是怎样一种正常的政治一贯性。阿基莫夫同志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的希望胜过了马尔托夫本人的昙花一现的善良意图。

阿基莫夫同志，“你胜利了”！

\* \* \*

\*

所谓“戒严状况”这几个字现在已经永远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意义了，至于它是怎样一个“吓唬人的字眼”，这可以从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即进行选举以后发生的表面上很小但是实质上很重要的几件事实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现在逢人便说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戒严状况”，煞有介事地硬要自己和读者相信，似乎他所臆造的这个稻草人是意味着“多数派”对“少数派”施行过什么不正常的迫害、攻击和欺凌。往下你们就会看见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是怎样的。但是，单拿代表大会快结束时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在选举以后，“紧密结合的多数派”不但没有迫害过这些不幸的、被欺凌的、被侮辱的、被绑上刑场的马尔托夫分子，反而自动提议（以利亚多夫为代言人）把记录委员会中的三个席位送给他们两个（第 354 页）。你们看一看关于策略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决议（第 355 页以及往下各页），就可以看出当时完全切实地讨论问题的情况，当时有许多决议案往往是由古怪的紧密结合的“多数派”和“被欺凌被侮辱的”“少数派”联合署名提出来的（记录第 355、357、363、365、367 等页）。这不是很象“解除工作”以及其他什么“欺凌”吗？

只有在讨论斯塔罗维尔提出的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案时才发生

很有趣的、但可惜太简短的切实的争论。这个决议案所以被代表大会通过，按照这个决议案的署名情况来看（第357页和第358页），是因为有三个“多数派”分子（勃拉温、奥尔洛夫、奥西波夫<sup>29</sup>）既投票赞成斯塔罗维尔的决议案，又投票赞成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并不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初看起来，这两个决议案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规定一般的原则，是表示在原则上和策略上对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应采取的一定的态度，而斯塔罗维尔的决议案则是企图规定容许同“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订立“暂时协定”的具体条件。两个决议案的主题是不同的。但是，斯塔罗维尔的决议案恰恰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是一个琐碎的决议案。它没有规定俄国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没有指出代表这个自由主义的具体的政治派别，没有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对待这些具体派别的基本宣传鼓动任务，竟把学生运动和“解放社”这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是因为它患有态度模糊的毛病），竟过分琐碎地诡辩地规定了容许订立“暂时协定”的三个具体条件。政治态度模糊在这种情况下也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引起了诡辩的态度。没有总的原则而想列举“条件”，结果就把这种条件规定得很琐碎，严格说来，甚至是规定错了。的确，请你们看一看斯塔罗维尔提出的三个条件：（1）“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应当“明显而肯定地声明，说他们在同专制政府斗争时将坚决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方面”。自由派和自由民主派的区别在哪里呢？决议案并没有提供任何材料回答这个问题。区别不就在于自由派代表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小的阶层的立场，而自由民主派则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大的阶层的立场吗？如果是这样，难道斯塔罗维尔同志认为资产阶级中进步性最小的（但终究是有进步性的，否则就谈不上什

么自由主义)阶层“将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吗??这是谬论,即使这样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明显而肯定地声明这一点”(这种假定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我们无产阶级政党还是不应该相信他们的声明。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件事情。

其次,我们假定“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真的会明显而肯定地声明,说他们在同专制制度斗争时将坚决站在社会革命党人<sup>30</sup>方面。这种假定是远不如斯塔罗维尔同志所作的假定那样绝对不可思意的(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派别)。如果按照他那个意思模糊和内容琐碎的决议案来说,在这种情形下是不允许同这类自由派缔结暂时协定的。于是从斯塔罗维尔同志的决议案中必然得出的这个结论,就引伸出一个根本不正确的论点。其实,暂时的协定既可以同社会革命党人缔结(见代表大会关于社会革命党人问题的决议),因而也可以同一旦站到社会革命党人方面的自由派分子缔结。

第二个条件:如果这些派别“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一种同工人阶级利益以及一般民主派利益相抵触或者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这里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自由民主派在自己的纲领中不提出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的要求和不模糊他们的(即无产阶级的)意识的。甚至我国自由民主派中最民主的派别,即社会革命党人,也象一切自由派一样,在自己的一塌糊涂的纲领中提出了同工人阶级利益相抵触并且模糊他们的意识的要求。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必须“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决不是不许缔结暂时的协定。

最后,斯塔罗维尔同志的第三个“条件”(自由民主派应当把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制作为自己的斗争口号),就其一般提

法来说，也是不正确的：如果宣布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容许同那些以争取有资格限制的宪法或一般“残缺不全的”宪法作为口号的自由民主派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那就不合理了。其实，“解放派”<sup>31</sup>先生们这一“派别”可以说就是这样的派别，但是事先禁止同那些甚至是最怯懦的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因而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那就是患了同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相容的政治近视病了。

总之，斯塔罗维尔同志提出的而为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签名赞成的决议案，是一个错误的决议案，如果第三次代表大会撤销这个决议案，那就做对了。这个决议，在理论立场和策略立场方面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在它所要求的实际“条件”方面犯了诡辩的毛病。它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了：（1）要揭露任何一个自由民主派所固有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特点，必须同这些特点作斗争；（2）同这些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的条件。这个决议案并没有做它应当做的事情（分析自由主义的阶级内容），而做了它不必做的事情（预先规定“条件”）。在党代表大会上拟订这种暂时的协定的具体“条件”，根本就是荒谬的，因为这时连具体的对方，即这种可能的协定对象都还不存在；即便有了这样的“对象”，也不如让党中央机关去决定暂时的协定的“条件”，就象代表大会对待社会革命党人先生的“派别”问题时所做的那样（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决议案中普列汉诺夫修正过的末尾一段，载于记录第362页和第15页），那要更合理百倍。

至于“少数派”所提的反对普列汉诺夫决议案的异议，马尔托夫同志的唯一理由是说：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以必须揭露一个著作家的浅薄的结论作结尾的。这岂不是‘拿斧头去砍苍蝇’吗？”（第358页）。用“浅薄的结论”这一尖刻的字眼作为掩盖思想贫乏

的理由，这又是一种典型的夸夸其谈。第一、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是说要“向无产阶级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一切表现”。所以，马尔托夫同志所谓“全部注意力都应当集中在一个司徒卢威，一个自由主义者身上”的论断（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断，记录第 88 页），纯粹是一句废话。第二、在说到可不可以同俄国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时，把司徒卢威先生比作“苍蝇”，就等于为了说尖刻话而忽略一件极明显的政治事实。不，司徒卢威先生不是一只苍蝇，而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所以是一个政治人物，不是因为他本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是因为他的立场是秘密活动界中唯一代表俄国自由派，即稍微有点活动能力和组织性的自由派的。所以，说到俄国的自由派以及我们党对待他们的态度时，正是要注意到司徒卢威先生，正是要注意到“解放社”，不然就是说空话了。也许马尔托夫同志想要向我们证明俄国有另一个——哪怕只是一个也好——“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目前能稍微比得上“解放派”？对这样的尝试研究一下，倒也不是没有趣味的！①

---

①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反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时还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必须反对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理由，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完全忽略了我们的义务是要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不回避同自由民主派缔结联盟。列宁同志也许要把这种回避叫作马尔丁诸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这种倾向已经表现出来了”（第 88 页）。

这一小段话就其内容丰富来说，真是一个少见的“精美的杰作”集。（1）所谓同自由派结成联盟，这句话是十分糊涂的观念。马尔托夫同志，谁也没有说要结成联盟，而只是说要成立暂时的或局部的协定。这是有很大区别的。（2）如果普列汉诺夫在决议案中忽略了不可思议的“联盟”而只一般说到“支持”，那末这不是该决议案的缺点，而正是它的优点。（3）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可以费点力气给我们解释一下“马尔丁诸夫倾向”的一般特征呢？他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些倾向同机会主义的关系呢？他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这些倾向同党章第一条的关系呢？（4）我实在急欲从马尔托夫同志那里听到“马尔丁诸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马尔托夫同志，请你赶快说出来免得我等得着急吧！

柯斯特罗夫同志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他说，“司徒卢威的名字对于工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未免是（请柯斯特罗夫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不要发火吧）阿基莫夫式的理由了。这未免好象是关于无产阶级一词的所有格问题的议论了<sup>32</sup>。

“司徒卢威的名字”（以及在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中同司徒卢威先生的名字相提并论的“解放社”的名字）对于什么工人才是“毫无意义的”呢？是对那些不太了解或者完全不了解俄国“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为何物的工人。试问，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应当怎样对待这样的工人呢：是责成党员向这些工人说明俄国唯一确定的自由派呢，还是把某些工人由于自己不大了解政治而不大知道的那个名字隐讳不谈？如果柯斯特罗夫同志跟着阿基莫夫同志走了第一步，而不愿意再跟着他走第二步，那他一定会根据前一种看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根据前一种看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会知道，他当时所持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如何，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中提到的“司徒卢威”和“解放社”字样，要比斯塔罗维尔的决议案中所讲的“自由派和自由民主派”字样更能给工人多好几倍的东西。

现在俄国工人不看《解放》杂志，就不能真正了解俄国自由派比较坦率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合法的自由主义刊物在这里毫无用处，正是因为它的论据模糊。我们应当大力（并在最广大的工人群众面前）运用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反对解放派，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能用真正的批判的武器打破解放派先生们必然想削弱革命的民主性质的企图。

---

除了我上面指出的叶哥罗夫同志对于我们“支持”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问题表示“大惑不解”以外，对于决议案的讨论并没

有提出任何有趣的材料，而且差不多没有进行过任何讨论。

---

当代表大会结束时，主席简短地提醒说，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全体党员都必须执行的。

#### (十四) 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

##### 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完了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现在我们应当作个总结，以便根据代表大会的全部材料回答一个问题：在选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暂时成为我们党内基本划分的最终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是由哪些人、集团和色彩组成的呢？必须把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各种色彩在原则上、理论上和策略上的丰富材料拿来作个总结。如果不作总的“概括”，如果不把整个代表大会以及在表决时一切最主要的派别情况作一个全面的观察，那末这些材料仍然是一些非常零零碎断的材料，乍看起来，特别是在那些不愿意费点气力从各方面独立地研究代表大会记录的人看来（而下过一番工夫的读者难道是很多么？），某些个别派别好象是偶然产生的。

在英国国会报告中时常看到一个典型的字眼 division，意思就是“划分”。人们在谈到对于某个问题的表决情况时，就说议院“划分”成某种多数派和少数派。我们社会民主党的议院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各种问题所发生的“划分”，给我们描绘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十分完备的、准确的、说明党内斗争、党内各种色彩和集团的图画。为了使这幅图画一目了然，为了看到一幅真实的图画，而不是一堆没有内在联系的、零零碎断的事实和细节，为了结束对于个别表决的

许多无谓争论(谁拥护过谁,谁支持过谁?),我决定用图表形式表明我们代表大会上所有各类基本的“划分”。这样的方法想必有许许多多的人觉得奇怪,但是我很怀疑可以找到别的什么真正有综合性和总结性、叙述得尽量完备而准确的方法。某个代表是投票赞成某个提议,还是反对某个提议,都可以根据记名投票结果绝对准确地弄清楚,而关于某些重要的无记名投票,也可以根据记录作出一个很正确、很接近真实情况的判断。同时,如果对所有记名投票和所有涉及比较重要(例如,按照讨论的详细程度和热烈程度来判断)问题的无记名投票都一一注意到,就可以把我们党内斗争情况作一个在现有材料的情况下可能做到的尽量客观的描写。并且我们不作照相式的描写,换句话说,我们不去单独描写每一个表决,而是设法勾划出一幅图画,即列举所有各类主要的表决,把那些比较次要而只能使问题模糊不清的细微末节撇开不谈。无论如何,根据记录,每个人都能检查我们图表中的每一种线条,用任何个别的表决来补充,总之,不只是用判断、怀疑和指出个别偶然事件的方法来批判它,而是用根据同一材料绘出另一幅图画的方法来批判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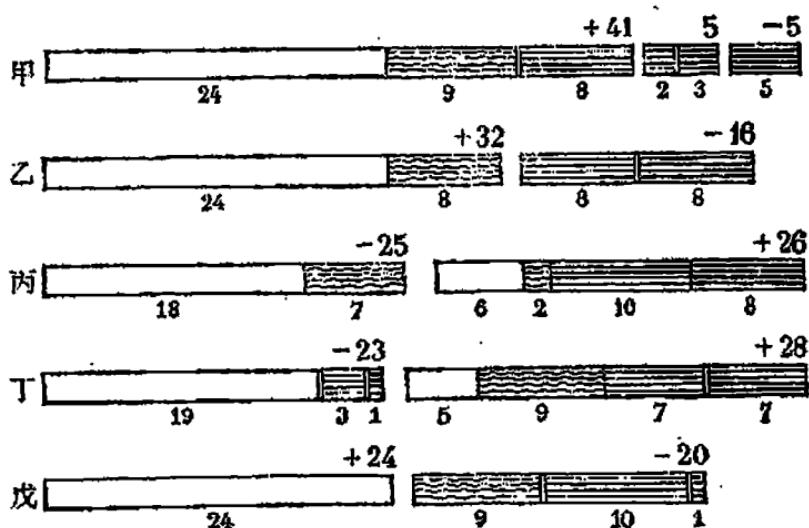
当我们把每一个参加投票的代表列在图表中时,我们便以特别的线条标出我们在代表大会整个讨论过程中详细考察过的四个基本集团,即:(1)火星报多数派;(2)火星报少数派;(3)“中派”;(4)反火星派。这些集团在原则色彩上的区别,我们已经从许多例子中看到了,如果有人因这些集团的名称太使爱拐弯抹角的人联想到《火星报》组织和《火星报》方针而不喜欢这些名称,那末我们要向他们指出,问题不在于名称。现在,我们已经根据代表大会的一切争论查明各种色彩,也就容易用估计各个集团色彩的实质的评语来代替那些已经用惯和听惯的党内的别名(使某些人听来刺耳的代号)。这样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四个集团的名称

如下：（1）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2）小的机会主义者；（3）中等的机会主义者；（4）大的（按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讲是大的）机会主义者。但愿那些近来公然说火星派分子只是包括一个“小组”而不是表明一种方针的人听到这些名称时不太感到刺耳吧。

现在我们就详细说明图表上（见《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景》图表）究竟“拍摄了”哪几类表决情况。

第一类（甲）表决包括的是，“中派”同火星派一起反对反火星

### 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景



图表上附有“+”号和“-”号的数字，是表示对于某个问题投票赞成或反对的总票数。各线条下面的数字，是表示四个集团中每个集团的票数。从甲到戊各类究竟包括哪种表决，将在正文中加以说明。

#### 各集团的符号

- 火星报多数派
- ▨ 火星报少数派
- ▨ 中派
- ▨ 反火星派

派或其中一部分人。属于这类表决的有关于整个党纲的表决（除了阿基莫夫同志一人弃权以外，其余的人都赞成），关于反对联邦制的原则的决议的表决（除了五个崩得分子以外，大家都赞成），关于崩得章程第二条问题的表决（反对我们的有五个崩得分子，弃权的有五票，即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勃鲁克尔以及拥有两票的马霍夫，其余的人都赞成我们）；这次表决也就是图表甲中所表明的。其次，关于批准《火星报》为党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三次表决，也属于这一类表决：编辑部（五票）表示弃权，有两票（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在所有三次表决中都投反对票；此外，在表决批准《火星报》的理由时，有五个崩得分子和马尔丁诺夫同志表示弃权<sup>①</sup>。

这一类的表决回答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重要问题：代表大会的“中派”在什么时候跟火星派一道行进的呢？或者是在反火星派也跟我们一道行进的时候，这里只有很少的例外情况（通过党纲，不问理由如何而批准《火星报》）；或者是在问题仅限于作一些声明而不必直接采取一定的政治立场的时候（承认《火星报》的组织工作，不一定要个别集团切实地实现《火星报》的组织政策；否决联邦制，还可以在讨论联邦制的具体草案问题时表示弃权，例如马霍夫同志就有过先例）。我们在上面一般谈到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的意义时，已经看见这个问题在正式《火星报》的正式说明中解释得很不正确，正式的《火星报》（以马尔托夫同志为代言人）拿反火星派也同我们一道行进的情况作借口来抹杀和模糊火星派和“中派”之

① 为什么正是要把关于崩得章程第二条问题的表决在图表上描绘一下呢？因为关于承认《火星报》问题的表决是不很完备的，而关于党纲和联邦制的表决又涉及到不是很确定的具体的政治决议。一般说来，从一批同类性质的表决中挑出某一次表决作典型，一点也不改变图画的基本特点，这是每个人作过相当的变更以后都会知道的。

间的区别，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甚至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右的”机会主义者，也不会在承认整个党纲这样的问题上投反对票。

第二类（乙）表决包括的是，彻底的火星派和不彻底的火星派共同反对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这类表决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实现《火星报》政策的具体的确定的计划，要在事实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承认《火星报》。属于这一类的，有组委会事件<sup>①</sup>，把崩得在党内地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第一位讨论，解散“南方工人社”，对于土地纲领问题的两次表决，以及第六，反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工人事业社”），即承认同盟为党在国外唯一组织的表决。在这里同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坚持原则的彻底政策对抗的，是在党尚未成立以前流行的那种旧的小组习气，机会主义组织或小集团的利益，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火星报少数派在许多场合，在许多极重要的表决（从组委会、“南方工人社”以及“工人事业社”的观点看来极重要的表决）中……当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性时，是跟我们一同行进的。这一类的“划分”明显地指出，在实现我们的原则的许多问题上，中派是跟反火星派一同行进的；他们接近反火星派比接近我们的程度大得多；他们在事实上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比倾向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程度大得多。那些虽然叫做“火星

① 这次表决正是我们在乙类列出的，火星派当时有三十二票，赞成崩得分子的决议案的有十六票。我们要指出，在这类表决中没有一次是记名投票。在很大程度上确切指明代表分布情况的有以下两种材料：第一、在讨论时，火星派中两个集团的发言人表示赞成，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发言人则表示反对；第二、表示“赞成”的票数始终是很接近三十三票的数字。同时不要忘记，在分析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时，我们除了指出表决情况之外，还指出“中派”同反火星派一起（即同机会主义者一起）反对我们的许多场合。属于这种场合的，有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问题，支持反政府派问题，限制集中制问题等等。

派”但是以成为火星派为可耻的人，随时都暴露出自己的真相，而不可避免的斗争又引起不少的愤怒，结果使那些考虑最差而感受性最强的人看不见这个斗争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原则的色彩的意义。但是现在斗争的烈火已经稍微减退了，而许多热烈战斗情况的客观的摘要又保留在记录上，只有闭着眼睛的人才看不见马霍夫和叶哥罗夫之流同阿基莫夫和李伯尔之流的联合并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只好回避全面而确切地分析记录，或是企图事后用各种惋惜的口吻来改变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行为。似乎用惋惜的口吻就可以消除观点上的区别和政策上的区别！似乎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现在同阿基莫夫、勃鲁克尔以及马尔丁诺夫结成联盟，就能迫使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恢复起来的党——忘记火星派在几乎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同反火星派进行的斗争！

代表大会上第三类表决包括的是，图表五部分中的最后三部分（即丙、丁、戊），其特征就是一小部分火星派分子脱离出去而转到反火星派方面，结果就使反火星派获得胜利（当他们还留在代表大会时）。为了十分确切地考察火星报少数派同反火星派结成的这一有名的联盟（在代表大会上一有人提起这个联盟就使马尔托夫暴跳起来并上书诉苦）的发展情况，我们把这类记名投票所有三个基本类别都列举出来。丙类是关于使用语言平等问题的表决（这里列举的是对这个问题举行的三次记名投票中最完全的最后一次表决）。整个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都联成一气拼命反对我们，同时火星派方面又有多数派的一部分人和少数派的一部分人脱离出去。当时还看不出，哪些火星派分子同代表大会上的机会主义“右派”结成了最终的和牢固的联盟。其次，丁类是对于党章第一条问题的表决（这里举出的是两次表决中最肯定的，即没有一个人弃权

的那次表决）。这个联盟已经表现得更明显和结合得更牢固了<sup>①</sup>。火星报少数派全体都已经站在阿基莫夫和李伯尔方面，火星报多数派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站在他们方面，弥补当时转到我们方面的三个“中派”分子和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只要看一看图表就可以知道，究竟哪些分子是偶然和暂时地时而转到这边，时而又转到那边；哪些分子又是一往直前地同阿基莫夫之流结成牢固的联盟。根据最后一类表决（戊——中央机关报编委、中央委员会以及党总委员会的选举），即表明最后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那次表决，显然可以看出火星报少数派同整个“中派”以及同反火星派残余完全打成一片了。这时八个反火星派分子当中留在代表大会上的已经只有勃鲁克尔同志一人了（当时阿基莫夫同志已经对勃鲁克尔说明了他的错误，于是勃鲁克尔就在马尔托夫分子当中占了应有的地位）。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者退出大会，决定了选举的命运，使马尔托夫遭到了失败<sup>②</sup>。

现在我们就根据各类表决的客观材料给代表大会作一个总结。

人们往往说我们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多数派带有“偶然”性质。

---

① 按照所有材料看来，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关于党章的四次表决：在第二七八页载明，赞成佛敏的有二十七票，反对我们的有二十一票；在第二七九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二十六票，赞成我们的有二十四票；在第二八〇页载明，反对我的有二十七票，赞成我的有二十二票，在同一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二十四票，赞成我们的有二十三票。这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对于中央机关补选问题的表决。没有载明记名投票（只举行过一次，但是已经遗失了）。崩得分子（全部或者一部分）显然是在援救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在同盟中）对这类表决所作的错误的论断，已在上面纠正了。

② 退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七个机会主义者，就是五个崩得分子（崩得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原则以后退出党的）和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即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这两个人是在代表大会只承认火星派的同盟为党的国外组织以后，即在代表大会把工人事业派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解散以后退出代表大会的。（这是列宁在1907年版上加的附注。——编者注）

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就是拿这个理由来安慰自己的。从图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说多数派是偶然的现象，这是在一个意义上，而且只是在一个意义上，即在断定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分子是偶然退出代表大会的意义上，才能这样说。他们退出有多大偶然性，我们成为多数派也就有多大偶然性（一点也不更大）。只要看一看图表，就能比阅读任何长篇大论的文章更清楚地知道，如果这七个人不退出的话，他们会站在哪一边，一定会站在哪一边<sup>①</sup>。但是，试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认为这七个人的退出是偶然的呢？这就是那些爱说多数派是“偶然”现象的人不愿意理会的问题。这就是使他们不愉快的问题。退出代表大会的正是我党右派中的最激烈分子而不是左派中的最激烈分子，难道这是偶然的吗？退出代表大会的正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种“偶然”退出，难道不是同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进行的并且在我们图表中十分明显表现出来的反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有某种联系吗？

只要提出这些对少数派不愉快的问题，就可以看出那些硬说多数派是偶然现象的话里掩藏着什么事实。这就是那件毫无疑问和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少数派是由我党内最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党员组成的。少数派是由党内那些在理论上最不坚定，在原则上最不坚持的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正是由党的右派组成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划分，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划分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sup>②</sup>的直接的必然的继续，这种划分不只是在昨天，不只是在俄国工人政党出现的，大概也不是在明天就会消灭的。

---

① 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在代表大会以后，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阿基莫夫同志最有血缘关系的沃龙涅什委员会，都是公然对“少数派”表示同情的。

这个事实，对于弄清分歧的原因及其变迁的问题有根本的意义。谁企图用否认或者模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以及这个斗争表现出来的各种原则色彩的方法来回避这个事实，谁就完全证明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贫乏的。但是要推翻这个事实，必须证明：第一、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各次表决和“划分”的一般情况并不象我描写的那样；第二、按照代表大会发生“划分”的一切问题的实质来说，那些在俄国博得火星派称号的最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错误的<sup>①</sup>。先生们，请给我们证明这一点吧！

少数派是由党内最带机会主义性质、最不坚定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组成的，这个事实也就回答了那些不熟悉实际情况或者对问题考虑很差的人向多数派提出的那些怀疑和异议。有人对我们说，把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错误看成分离的原因，这不是小气吗？是的，先生们，马尔托夫同志的错误，本来是不大的（还在代表大会激烈进行斗争的时候，我就指出了这一点），可是这个小错误可能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许多恶果，因为那些犯了许多错误、在许多问题上表现了机会主义倾向、不坚持原则的代表把马尔托夫同志拉到自己方面去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个同志表现得不坚定，本来是一件属于个人性质的次要的事

---

① 专供马尔托夫同志参考的附注。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已经忘记火星派分子一语是表示一个方针的拥护者，而不是表示一个小组组员，那末我们劝他根据代表大会的记录看一看托洛茨基同志对阿基莫夫同志所作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明。代表大会上有三个小组（和党相对而言）——“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编辑部，《火星报》组织——是火星派的小组。这三个小组中有两个小组做得很恰当，它们自行宣告解散了；第三个小组则表现得党性不强，没有这样做，于是就被代表大会解散了。最广泛的一个火星派的小组，即《火星报》组织（它既包括编辑部又包括“劳动解放社”在内），在代表大会上只有十六个人，其中只有十一个人有表决权。那些只在方针上是火星派而不属于任何一个火星派“小组”的人，据我计算，在代表大会上有二十七人，一共拥有三十三票。这就是说，火星派中属于火星派小组的不到半数。

实，但是所有一切最不坚定的分子，所有一切根本不承认《火星报》方针并公然反对这个方针，或者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却往往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人，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少数，这就不是属于个人性质的，而是有全党意义的，决不是次要的事实了。

把《火星报》旧编辑部这样一个小组中充满顽固的小组习气和革命的庸俗观念的事实说成分离的原因，岂不可笑吗？不，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因为起来拥护这种个人小组习气的有我们党内所有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都为拥护任何小组习气而斗争的分子，所有根本不能超出革命的庸俗观念的分子，所有借口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的祸害具有“历史”性而加以辩护和保持的分子。狭隘的小组利益如果只在《火星报》编辑部一个小组中比党性占上风，那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偶然现象。但是拚命拥护这种小组习气的正是同样（也许是更加）重视有名的沃龙涅什委员会的“历史继承性”以及所谓彼得堡“工人组织”<sup>34</sup>的“历史继承性”的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之流同志，正是象哀悼旧编辑部“被杀害”事件那样痛心地（也许更加痛心地）哀悼“工人事业社”“被杀害”事件的叶哥罗夫之流同志，正是马霍夫之流同志等等，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常言说得好：“请你告诉我，你同谁相识，那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请你告诉我，谁是你的政治同盟者，谁投票赞成你，那我就能告诉你，你的政治面貌是怎样的。

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错误，如果它还没有成为他们同我们党内整个机会主义派结成牢固的联盟的出发点，如果它还没有由于这个联盟而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使那些受到《火星报》反对而现在决心拿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出气并引以为快的人进行报复，那末这仍然是而且可能仍然是一个小错误。但是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事件，恰恰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新《火

星报》上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了，阿基莫夫之流和勃鲁克尔之流存心进行报复（见沃龙涅什委员会的传单①），马尔丁诺夫之流在幸灾乐祸，因为他们终于（终于呵！）得到许可在这可恨的《火星报》上用自己的蹄子踢那可恨的“敌人”，报复过去受的所有一切侮辱了。这特别明显地告诉我们，为了保持《火星报》的“继承性”，是多么需要“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摘自斯塔罗维尔同志 1903 年 11 月 3 日的最后通牒）……

代表大会（以及党）划分为左派和右派，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事实，本来不仅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危险，而且甚至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恰恰相反，俄国（而且不仅是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中最近十年来的事，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这样的划分。至于形成这一划分的根源竟是右派所犯的许多小错误，许多次要的（比较来说）意见分歧，那末这个情况（这个使从表面看问题的人和头脑庸俗的人感到惊奇的情况）就表明我们全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前我们因为大问题而发生分离，这些大问题有时甚至可以造成分裂，但是现在我们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已经趋于一致了，现在我们已经只有色彩上的区别，为了这些色彩可以而且应当进行争论，但是，为了这些色彩发生分离，就未免是愚蠢和幼稚的了（正如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他的值得注意的《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完全公正地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我们下面还要谈到）。现在，当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无政府行为几乎使党陷于分裂状态时，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聪明人，他们竟说：一般说来，为了组委会事件、“南方工人社”或“工人事业社”的解散、党章第一条、旧编辑部的解散等等这一类小事情，是不是值得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斗

---

① 见本书第 201—202 页。——编者注

争呢？谁这样推论<sup>①</sup>，谁就是把小组观点带到党的事业中，因为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斗争，当它还没有导致无政府行为和造成分裂的时候，当它还是在全体同志和全体党员一致承认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而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党的右派，同阿基莫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进行的斗争，是绝对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只要列举两件事就可以确凿地证明这一点：（1）当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声明退出代表大会时，我们大家都决心设法澄清所谓“侮辱”的想法，我们大家通过了（是三十二票通过的）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劝这两位同志对所作的解释表示满意而收回他们的声明。（2）当问题谈到中央机关的选举时，我们让代表大会的少数派（或机会主义派）在两个中央机关中占少数席位；让马尔托夫加入中央机关报，让波波夫加入中央委员会。既然我们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决定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从党的观点来看，我们也就不能有别的做法了。如果说代表大会上暴露出来的色彩上的区别不大，那末我们从这些色彩斗争中作出的实际结论也是不大的，因为这个结论只不过是说两个三人小组中三分之二的席位应当让给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

### 只是由于党代表大会上的少数派不同意成为中央机关中的少

---

①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谈话。他向我诉苦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呵！这是多么残酷的斗争，这是怎样在鼓动互相反对，这是多么激烈的论战，这是怎样的非同志态度呵！……”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多么好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哪。这才不是无休无止的讨厌的知识分子的无谓口角，人们结束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

这个“中派”同志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诧异地耸了耸肩。原来我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话。

数，那些遭到失败的知识分子才起初发出“颓丧的啜泣”，随后又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了。

在作结束时，我们要再一次从中央机关成员问题上看一看图表。当然，除了色彩问题以外，代表们在进行选举时还注意到某某人是不是适当、工作能力强不强等问题。现在少数派很乐意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至于这两个问题各不相同，那是不言而喻的，只从一件简单事实就可以看出，选举最初的三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编委的计划，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即当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的联盟还是谁都料想不到的时候就已经拟订好了。对于不同的问题，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来回答。对于色彩问题，应当在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在所有一切问题的公开讨论和表决情况中去找答案。关于某人是不是适当的问题，大家在代表大会上一致决定用秘密投票来解决。为什么整个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呢？——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无须多谈的问题。但是，少数派（他们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甚至连浅显的道理也开始忘记了。我们听到过无数热烈的、狂热的、兴奋得几乎发狂的拥护旧编辑部的话，但是谈到代表大会上那些同拥护六人小组和拥护三人小组的斗争有关的色彩的话，我们简直连半句也没有听到过。我们从各个角落听到什么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没有工作能力、不适当、心怀叵测等等流言蜚语，但是我们简直没有听到过半句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为中央委员会中的优势而斗争的色彩的话。我觉得，在代表大会外面散布关于个人品质和行动的流言蜚语，是不体面的和卑鄙的（因为这种行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只能向全党最高机关揭露的组织秘密）。用这种流言蜚语在代表大会以外进行斗争，我确信，这就是诽谤行为。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我能给予公众的唯一回答就是指出代表大会的斗争：你们说，中央

委员会是由不大的多数派选举出来的。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不大的多数派是由所有那些最坚持一贯的，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为实现《火星报》计划而斗争的人组成的。因此，这个多数派的道义威信应该比它的形式威信要高得多，对于那些把《火星报》方针的继承性看得比《火星报》某个小组的继承性更重要的人来说，这个道义威信更要高得多。谁能够更有资格判断某人是不是适于实行《火星报》的政策呢？是那些在代表大会上实行过这个政策的人呢，还是那些往往反对这个政策而维护一切落后性、一切无用的东西以及一切小组习气的人？

### （十五）在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

以上我们已经把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分析完毕，这种分析已经 *in nuce*（溯本求源地）说明了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切情况，所以对于我们党内危机的以后各个阶段也就可以谈得简短一些了。

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参加选举，立刻就使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党的斗争渗进一种无谓争吵的气氛。格列博夫同志不相信那些落选的编委真想转到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方面去，以为问题是由于气愤，所以他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第二天就向我和普列汉诺夫提议和平了结，在保证编辑部有相当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条件下（即两个代表中一定有一个代表属于党的多数派）把所有四个人都“补选”进去。这个条件在普列汉诺夫和我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他们同意这个条件，就等于说他们默认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就等于说他们愿意和平而不愿意战争，愿意同我和普列汉诺夫接近，而不去同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接近，不去同叶

哥罗夫和马霍夫接近。于是，“补选”方面的让步就带有个人的性质，而在个人问题上让步，以平息怒火和恢复和平，是我们不应该拒绝的。因此我和普列汉诺夫就表示同意了。但是编辑部的多数拒绝这个条件。格列博夫也就离开了。于是我们就观察后果：或者是马尔托夫坚持他在代表大会上（在反对中派代表波波夫同志时）表示过的忠诚立场，或者是他所追随的那些不坚定的、倾向分裂的分子占上风。

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是马尔托夫同志想把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联盟”当作个别的政治事实（正象倍倍尔在 1895 年同福尔马尔的联盟是个别事实一样——*si licet parva componere magnis*（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或者是 he 想把这个联盟巩固起来，竭力证明我和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因而成为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的真正首领。换句话说，有两种可能的办法：或者是无谓争吵，或者是进行政治上的党的斗争？我们三个人中间（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第二天，中央机关只有我们三个人），格列博夫最倾向于前一种解决办法，并且尽一切力量给吵了架的儿童调解。最倾向于后一个解决办法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的态度十分坚决。我这一次装扮成“中派”或“泥潭派”，并试图采取说服方法。现在如果企图把口头上的说服重述一遍，那就等于干一件糊涂透顶的事情，所以我也就不去重蹈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位同志的覆辙。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从我给一位火星报“少数派”分子写的一个书面劝告中引证几段话：

……“马尔托夫拒绝加入编辑部，他和党内的其他著作家拒绝参加报社工作，有一批人拒绝卷中央委员会工作而宣传抵制或消极反抗的思想，所有这一切都必然——甚至违反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意旨——会造成党内分裂。即便马尔托夫会坚持忠诚的立场（他在代表大会上十分坚决表示的立

场)，其他人也是坚持不住的，——因此我所指出的那个结局将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我们心自问：究竟我们为什么要发生分裂呢？我再三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一切事件和印象，我意识到我常常在十分气急的时候行动‘疯狂’，我愿意向任何人承认自己的这个过错，如果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感、责备和斗争等等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作过错的话。但是，现在当我们一点也不痴狂地观察已经达到的结果，观察用疯狂的斗争办法实现的东西时，我根本看不出这些结果中有一点，哪怕有一点对党有害的地方，有一丝一毫对少数派侮辱或凌辱的地方。

当然，处在少数地位本身也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难堪，但是我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我们‘玷污过’某人，以为我们想侮辱或者欺辱某人的看法。绝对没有这么回事。决不应该把政治上的分歧变成给对方加上所谓居心不良、行为卑鄙、倾轧以及在日益到来的分裂气氛中非常流行的动听的罪名来说明事件。决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至少是极端不合理的。

我在政治上（以及在组织上）同马尔托夫发生分歧，正象我同他发生过几十次分歧一样。既然我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遭到失败，就不能不极力设法利用我（以及代表大会）所剩下的机会来进行报复。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成立严密的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我又不能不设法选出三人编委会…… 我认为只有这个三人小组才能成为负责的机关而不会变成以小圈子作风和怠慢习气为基础的团体，才能成为唯一真正的中央机关，其中每个人可以随时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党性观点，丝毫不掺杂其他成分，不管任何个人意气，任何侮辱、退出等想法。

在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以后，这个三人小组一定能使在一个方面反对马尔托夫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合法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因此要撕裂党吗？因此要破坏党吗？难道在示威问题上，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不是反对过我吗？难道在党纲问题上，我和马尔托夫不是反对过普列汉诺夫吗？难道任何三人小组不总是以自己的一方反对每一个参加者吗？既然火星报多数派无论在《火星报》组织内或者在代表大会上都认为马尔托夫的路线这一特别色彩在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是错误的，可是企图用什么‘陷害’和‘攻击’等字眼来解释这一点，难道不就是愚蠢的行为吗？难道用‘恶棍’字眼辱骂这个多数派堵塞这件事，不就是愚蠢的行为吗？

我再说一遍：我也同代表大会上的火星报多数派一样，深信马尔托夫采

取了不正确的路线，认为必须把他纠正一下。因为受到纠正而生气，由此作出结论说受了侮辱等等，那就不合理了。我们过去没有‘玷污过’任何人，而且现在也不想‘玷污’任何人，不想排除任何人参加工作的机会。由于被排斥出中央机关而掀起分裂，这是一种我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①

我认为现在必须把我这个书面声明重说一遍，因为这个声明确切地指出多数派极力想一下子分清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由于攻击的激烈性和“疯狂性”等可能产生的（在激烈斗争中也是必然产生的）个人怒火和个人气愤；另一件事情则是一定的政治错误，政治路线（即同右派的联盟）。

从这些声明中可以看出，少数派的消极反抗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立刻就开始了，因此我们马上警告说：这是一个使党走向分裂的步骤；这是根本同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忠诚的声明相矛盾的；这只是由于被排除出中央机关（就是说由于落选）而进行分裂，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想过要排斥任何一个党员参加工作的机会；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究竟是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还是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线错误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还没有解决）开始被越来越歪曲成夹杂着漫骂、猜疑等成分的无谓争吵了。

但是警告并没有起作用。少数派的行为表明，最不坚定和最不重视党的分子在他们中间占了上风。于是我和普列汉诺夫只好收回我们对于格列博夫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既然少数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仅在原则方面而且在起码的党员忠诚态度方面

---

① 这封信（1903年8月31日〔9月13日〕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编者注）早在8月间（新历）就写好了。这里删掉了我认为与问题无关的一些话。如果收信人认为删掉的话正是十分重要的，他可以很容易地把删掉的地方补上去。顺便说一下。我要趁此机会讲清楚，我允许我所有的论敌公布我所有的私人信件，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好处就可以了。

也是政治上不坚定的，那末所谓“继承性”的话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普列汉诺夫比谁都更巧妙地嘲笑了那种十分荒唐的要求，即要求把公开说自己有越来越多的新的分歧意见的人“补选”到党编辑部中去，让这些人占多数！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怪事，当新的分歧还没有在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以前，中央机关的党的多数派竟会自动把自己变成少数呢？让人们先把分歧谈出来吧，让党去讨论这些分歧的深度和意义吧，让党自己纠正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犯的错误吧，如果它确实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为了一些尚未说明的分歧就提出这种要求，这已经表明提出要求的人是十分不坚定的，表明他是想用无谓争吵来完全压倒政治分歧，表明他既根本不尊重整个党，又根本不尊重本人的信念。世界上还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种原则性坚定的人，他们在自己打算说服的机关里取得（用非正式手续）多数以前，竟然拒绝进行说服。

最后，10月4日，普列汉诺夫同志宣称他要最后试图结束这种荒谬现象。召集们编辑部所有六个委员在一起开会，有一个新中央委员也曾经列席会议<sup>①</sup>。普列汉诺夫同志费了足足三个钟头证明，那种想从“少数派”中“补选”四个人而跟“多数派”的两个人作对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他提议补选两个人，以便一方面排除那种担心我们想“欺凌”、压制、围困、杀戮、埋葬什么人的顾虑，另一方面则保障党的“多数派”的权利和阵地。补选两个人的提议也被否决了。

10月6日，我和普列汉诺夫给《火星报》全体旧编委以及撰稿人托洛茨基同志写了一封正式的信件，内容如下：

“敬爱的同志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得不对你们拒绝参加《火星报》和

<sup>①</sup> 除此以外，这个中央委员<sup>35</sup>专门同少数派举行过几次个别谈话和集体谈话，驳斥过荒诞的谰言，并规劝他们不要忘记党员的职责。

《曙光》杂志的工作一事正式表示惋惜。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一闭幕立刻就邀请你们，之后又多次邀请你们参加工作，可是我们始终没有从你们那里收到任何一篇作品。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你们拒绝参加工作丝毫不不是编辑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种个人意气，当然都不应该成为你们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如果你们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某种意见分歧，那我们认为详细说明这种意见分歧对于党是非常有好处的。不但如此，我们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意见分歧的性质和深度。”①

读者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还不十分了解，“少数派”的行为究竟是由于他们意气用事，还是由于他们愿意给机关报（以及党）以新的方针，这新方针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又是如何。我想，现在即使指定七十个诠释家根据无论什么刊物和无论什么证词来阐明这个问题，那他们也是永远弄不清这笔糊涂账的。无谓争吵的结子恐怕是没有解开的日子：要么把它斩断，要么就把它摆脱②。

接到我们10月6日的信以后，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托洛茨基以及柯里佐夫给我们回了一个不到三行字的答复，说自从《火星报》转入新编辑部手里时候起，他们根本不参加《火星报》的任何工作了。马尔托夫同志比较愿意说话，于是就赏赐了我们这样的回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收。敬爱的同志们！为了回答你们10月6日的来信，我特声明如下：我认为用不着再来协商我们在一个机关报共同工作的问题了，因为你们在10月4日由一个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已拒绝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你们收回了你们要阿克雪里罗得、

① 在给马尔托夫同志的信中，还补充一段关于一本小册子问题的话以及如下话语：“最后，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再一次通知您，我们现在还准备补选您为中央机关报的编委，以便您有充分可能在党的最高机关正式申述自己的一切观点并进行辩护。”

② 普列汉诺夫同志大概会在这里补充说，要么就满足那些制造无谓争吵的人的一切奢望。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是做不到的。

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以及我在我们担保选举列宁同志为总委员会的‘代表’的条件下加入编辑部的建议。既然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再三拒绝说明你们自己当着见证人所发表的声明，那我也并不认为需要在给你们的信里说明在目前情况下我拒绝参加《火星报》工作的理由。如果必要的话，我将向全党详细说出我对于这一点的意见；党已经可以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看出，为什么我拒绝了你们现在又提出来的要我在编辑部和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的建议……①

尔·马尔托夫”

这封信以及上述几个文件不容反驳地说明，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况》中竭力（用感叹号和删节号）回避关于抵制、捣乱、无政府状态、制造分裂的问题，即关于用忠诚的斗争手段和不忠诚的斗争手段的问题。

人们向马尔托夫同志等等提议，要他们说明他们的意见分歧，请他们直爽地说出问题的底细以及他们的意图，劝他们不要再闹脾气而要平心静气地分析他们在党章第一条上犯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同他们转向右方的错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公然拒绝交谈，却叫喊说：我被围困了，我受欺凌了！人们对于这些“吓唬人的字眼”的嘲笑，并没有使这些可笑的怒气平息下去。

怎么能围困一个拒绝共同工作的人呢？——我们这样质问马尔托夫同志。当少数派拒绝处在少数地位时，怎么能侮辱、“欺凌”和压迫他们呢？要知道，任何一种少数地位，都一定和必然对处在少数地位的人有某些不利的地方。这种不利的地方，要么就是必须加入在某些问题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委员会，要么就是必须站在委员会之外攻击委员会，因而也就要受到从坚固的炮台中射出来的炮火的攻击。

---

① 下面一段话是马尔托夫对当时翻印他那本小册子问题的回答，这里从略了。

马尔托夫同志叫喊什么“戒严状况”，是不是想说人们用不公平不忠诚的手段反对他们这些处在少数地位的人或者统治他们呢？只有这样的论点（在马尔托夫心目中）也许有半点合理的影子，因为——我再说一遍——少数地位是一定和必然有某些不利的地方的。但是可笑的是，当马尔托夫同志还拒绝交谈时，无论怎样也是不能同他进行斗争的！当少数派还拒绝处在少数地位时，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统治他们的！

当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编辑部工作时，马尔托夫同志找不出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也找不出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委员会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不管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况》一文里如何支吾搪塞，但是始终有一个完全不容反驳的事实就是：在所谓戒严状况的叫喊声中，除了“颓丧的啜泣”以外，是没有任何东西的。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根本没有正当的理由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编辑部，这最好是用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是农奴！”（《戒严状况》第34页）一语来说明。这就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高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的“上等人物”。用“我们不是农奴”作为说明拒绝在党内工作的理由，就等于彻底暴露了自己，就等于承认自己完全没有理由，完全不能论证，完全没有什么引起不满的正当原因。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声明，我们认为他们拒绝工作完全不是由我们这方面引起的，我们请他们说出自己的分歧意见，可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农奴”（并补充说：我们关于补选问题还没有磋商好）。

那些在争论党章第一条时就已经暴露了自己倾向于机会主义推论和无政府主义空谈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总觉得任何一种

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都好象是农奴制。读者们很快就会知道，新的党代表大会，在这些“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看来，也会是“上等人物”忍受不了和觉得可怕的农奴制机关……这个“机关”对于那些喜欢利用党员招牌但是又觉得这个招牌不符合党的利益和党的意志的人看来，确实是可怕的。

我在给新《火星报》编辑部的信里列举的并由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况》里刊印出来的那些委员会的决议，在事实上证明少数派的行为是一贯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是一贯破坏积极的实际工作的。由机会主义者和仇恨《火星报》的人组成的少数派割裂了党，损害并破坏了工作，因为他们想给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这件事出口气，并感到用正派的忠诚的手段（在刊物上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说明问题）他们永远不能驳倒人家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责备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和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罪名。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说服党，于是就用破坏党和妨碍任何工作的手段来要挟。人家责备他们，是说他们（因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错误）把我们的器皿砸了一个缝，而他们针对着这种责备却拼命设法把已经损坏的器皿完全打破。

概念混淆到极点了，甚至把抵制和拒绝工作都当成“正派的”<sup>①</sup>斗争“手段”。马尔托夫同志现在竭力回避这个为难的问题。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有原则性”，以至当抵制手段由少数派使用时，……他就拥护抵制手段，而当抵制手段威胁到处于多数地位的马尔托夫本人时，他就斥责抵制手段了！

我认为，究竟这是无谓争吵还是对于社会民主工党内正派的斗争手段的“原则的意见分歧”的问题，可以不必分析了。

---

① 矿区委员会的决议（《戒严状况》第38页）。

在两次企图（10月4日和6日）要求那些掀起“补选”纠纷的同志说明理由都失败了以后，中央机关只好看一看那些口头上答应用忠诚手段进行斗争的同志在事实上将是怎样的态度。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给同盟发了一个通告（见同盟记录第3—5页），声称中央委员会正在拟订章程并邀请同盟会员来协助。同盟领导机关当时否决了（以两票对一票，见同盟记录第20页）召开同盟代表大会的建议。少数派对这个通告所作的答复立刻就表明，所谓忠诚和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只不过是空话罢了；其实，少数派是立意绝对不服从党中央机关的，却以十足的诡辩和无政府主义词藻的敷衍话来回答中央机关关于共同工作的号召。我和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多数派分子在收到领导机关成员捷依奇的所谓公开信时（第10页），立即坚决表示“抗议同盟的负责人用粗暴的违反党纪的手段阻碍党机关的组织活动和号召其他同志也违反纪律和章程的行为。所谓‘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响应中央委员会号召参加这项工作’，所谓‘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让它（中央委员会）给同盟制定新章程’等话，是一种鼓动手法，这只能引起每一个稍微懂得什么是党、什么是组织、什么是党纪的人的气愤。这种手法令人十分气愤，是因为他们用这种手法来对付刚刚成立的党机关，他们无疑是企图在党员同志中间破坏对这个党机关的信任，而且这是在同盟领导机关成员的名义下背着中央委员会使用的手法。”

（第17页）

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代表大会当然只能成为一幕滑稽剧。

马尔托夫同志从一开始就继续使用他在代表大会上使用过的“笼络人心”的策略，不过这一次他是针对着普列汉诺夫同志，用的方法是歪曲私人谈话的内容。当普列汉诺夫同志提出抗议，马尔托夫同志只得收回（同盟记录第39页和第134页）他那种轻率的

或者充满火气的非难。

轮到做报告的时候了。代表同盟参加党代表大会的是我。读者只要把我的报告提纲(第 43 页以及以下各页)<sup>①</sup>拿来参照一下，就知道我当时已经大致分析了代表大会上的历次表决情况，而本书内容就是对这种分析加以发挥。报告的全部重心就是要证明马尔托夫及其伙伴怎样由于犯了错误而成为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的事实。虽然这个报告是在大多数最怀恨在心的论敌面前做的，他们也不能从这个报告中发现一点点不符合党内斗争和辩论的忠诚方法的成分。

相反地，马尔托夫的报告，除了对我的叙述作了部分的局部的“修正”以外(这些修正的不正确性，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了)，却是……一种神经失常的产物。

怪不得多数派拒绝在这样的气氛下进行斗争。普列汉诺夫同志对“发脾气”(第 68 页)——这确实真正是“发脾气”！——提出抗议，同时表示不愿意申述他已经准备好了的对于该报告实质的反驳，接着就退出了代表大会。其余的多数派分子，也差不多都对马尔托夫同志那种“无理行为”提出了书面抗议(同盟记录第 75 页)，接着也退出了代表大会。

少数派的斗争方法大家已经都看得十分明白了。我们责备少数派，是说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犯了政治错误，是说他们转向机会主义方面，是说他们和崩得分子、阿基莫夫之流、勃鲁克尔之流、叶哥罗夫之流以及马霍夫之流结成联盟。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现在“制定了”两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多种多样的个别袭击、攻击和进攻等形式。

---

① 见《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56—67 页。——编者注

第一种方法就是破坏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力图阻挠一切而“不说明理由”。

第二种方法就是“发脾气”等等①。

这个“第二种斗争方法”在同盟的所谓“原则的”决议中也有所表现，“多数派”当然没有参加对于这些决议的讨论。让我们仔细看一看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况》里转载的这些决议案吧。

第一个决议案是由托洛茨基、佛敏、捷依奇等同志署名的，其中包含专为反对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而提出的两个论点：（1）“同盟深表惋惜的是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一些实际上同《火星报》原先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倾向，以至在制定党章时没有充分注意到造成一种足以维护中央委员会独立性和威信的充分保障。”（同盟记录第 83 页）

这个“原则的”论点，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样，是属于阿基莫夫式的空话，这些话的机会主义性质连波波夫同志也在党代表大会上揭露过了！其实，那些硬说“多数派”不想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威信的断语，始终不过是诽谤罢了。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当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并没有什么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而当马尔托夫分子加入编辑部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却果然造成了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当我们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内是俄国实际工作者多于国外著作家；而当马尔托夫分子加

---

① 我已经指出，把国外生活和流放生活的气氛中经常见到的无谓争吵的最卑鄙的表现形式，都归结为卑鄙的动机，这是愚蠢的。这是在一定的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在一定的神经失常等情况下象传染病一样流行的一种毛病。我只得在这里把这种斗争方式的实质重提一下，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况》里完全重复了这种斗争方式。

入编辑部的时候，情况却相反了。当我们两个人在编辑部工作的时候，总委员会一次也没有企图干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问题；自从按一致意见实行补选的时候起，就开始进行这种干涉了。这一点读者们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详细知道的。

该决议案的另一个论点说：“……代表大会在成立党的正式中央机关时，忽略了同事实上已经形成的中央机关的继承性的联系……”

这个论点完全归结为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少数派”宁愿回避旧中央机关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证明自己不中用并且犯了许多错误的事实。但是最可笑的是竟在组委会问题上引用“继承性”。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代表大会上任何人也没有提到批准组委会的全体委员。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甚至气得发狂地嚷道，包括三个组委会委员在内的名单使他感到可耻。“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最后名单中包括一个组委会委员（波波夫，格列博夫或佛敏，托洛茨基），而“多数派”提出的并使它通过了的名单，在三个人中则有两个组委会委员（特拉文斯基、瓦西里也夫和格列博夫）。试问，难道用“继承性”作借口就可以叫作“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我们现在来谈另一个决议案，即由旧编辑部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首的四个委员署名的决议案。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给“多数派”加上的后来又在报刊上一再提起的主要罪名。这些罪名最好按照编辑小组组员们的说法来考察。这种罪名针对的是“专制的官僚主义的治党方式”，是跟“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中制”不同的“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它“所重视的不是内部的统一，而是用纯粹机械手段，用一贯压制个人首创性和社会主动性的办法实现和保持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所以，这个集中制“根本不能有机地把社会的成员统一起来”。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大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自己也不大明白，他是在写地方自治派申请实行符合愿望的行政改革的呈文呢，还是在那里发泄“少数派”的怨言。心怀不满的“编委”所叫喊的党内“专制”究竟指什么呢？所谓专制，就是一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监督的、不负责任的、不经过选举的权力。从“少数派”的报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认为这个专制君主就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当该决议案起草和通过的时候，我是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在中央机关报工作的。因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就是认为普列汉诺夫以及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都不是按照他们自己对于事业利益的观点，而是按照专制君主列宁的意志来“统治党”的。既然责难说什么专制的统治，那就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其余一切参加统治的人——除了专制君主一人以外——都不过是别人的御用工具，唯命是听的小卒，执行别人意志的差役罢了。我们要再三问明：难道这就是最值得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所谓“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吗？

其次，我们的“党员”，即这些刚刚从党代表大会（他们曾冠冕堂皇地承认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合法的）回来的“党员”在这里所说的，究竟是怎样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呢？他们是不是知道在一个根据比较牢固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内，除了党代表大会以外，还有什么另外可以达到一致的方法吗？如果说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勇敢地爽直地说他们已经不承认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合法的代表大会了呢？为什么他们不试来向我们说出自己的新意见和在似乎有组织的似乎是个党的内部达到一致的新方法呢？

再其次，我们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在这里说的是怎样的“压制个人首创性”呢？他们刚刚在此以前还被党中央机关报规劝说

出他们的意见分歧，但是他们非但不发表意见反而谈起“补选”生意了。一般说来，我和普列汉诺夫或者中央委员会怎么能把根本拒绝同我们进行任何共同“活动”的人的首创性和主动性压制下去呢！在被压制者拒绝参加的机关或者委员会里，怎么能“压制”什么人呢？落选的编委既然拒绝“做被统治者”，那末他们又怎能埋怨“统治制度”呢？我们根本不可能在领导我们这些同志方面犯什么错误，因为这些同志根本就没有在我们领导下做过什么工作。

看来很明显，高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于中央机关人选的不满，不过是要掩盖他们违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冠冕堂皇地说过的那种谎言的丑恶行为。你是官僚主义者，因为你是代表大会不按照我的意志而违反我的意志委派的；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是根据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你做事极端机械，因为你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的”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补选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柄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代表大会愈是直接斥责他们那种小组习气，就愈使他们感到不愉快，因而他们愈加努力坚持他们那种小组习气的“继承性”。

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喊中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实在的内容<sup>①</sup>。这样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再一次证明少数派的知识分子不坚定性罢了。少数派想使党信服，似乎中央机关人员选举得不恰当。是用什么方法使党信服呢？是用批评我和普列汉诺夫所编辑的《火星报》的方法吗？不是的，这是他们没有力量干的。他们想用一部分党员拒绝在他们所仇视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的手段来使党信服。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内的任何一

---

<sup>①</sup> 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说，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实行了有效的补选以后，就不再被少数派看作“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拥护者了。

一个中央机关，都不能证明自己有本领对那些不愿意服从领导的人进行领导。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不是说服办法，而是破坏办法。用破坏方法来代替说服方法，这就表明自己没有坚定的原则性，也就是表明对自己的思想没有信念。

人们在大谈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词在俄语中可以理解为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升官思想，就是特别注意地位而忽视工作，争吵补选席位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于是我平心静气地请读者自己来判断，现在我们党内斗争的双方究竟哪一方犯了这种官僚主义毛病…… 人们在说什么粗暴的机械的统一方法。粗暴的机械的方法当然是有害的，但是我要请读者自己来判断，如果新方针和旧方针斗争时，在尚未使党信服新观点的正确以前，在尚未向党说明这些观点以前，硬要对自己的人送进党机关中去，这难道不是最粗暴、最机械的斗争方法吗？

但是也许少数派爱用的字眼有某些原则的意义，表现出一种与细小的局部的理由（这个理由在当时情况下显然成了“转变”的起点）无关的特殊思想吧。如果撇开因“补选”引起的吵闹不谈，也许这些字眼终究反映另一种观点体系吧？

我们就从这一方面来观察问题。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在同盟中最先着手作这种观察的是普列汉诺夫同志，他指出了少数派转向**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事实，而马尔托夫同志（他现在最感到气愤的是，并不是大家都愿意承认他的立场是原则的<sup>①</sup>立场）在

① 新《火星报》由于列宁似乎不愿看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或者否认这些分歧而感到气愤，是再可笑不过的了。如果你们比较有原则地对待问题，那你们就会比较快地考察我再三指出你们转向机会主义去的声明。如果你们的立场比较有原则，那你们就不会这样厉害地把思想斗争降低为地位观念。既然你们自己竭力妨碍别人把你们当

他的《戒严状况》里宁愿完全回避这一事件。

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掀起的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同盟或者某一委员会为自己制定的章程不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或者违反中央委员会意见，是不是有效呢？看来，问题再明显不过了：章程是组织性的正式表现，而组织每一委员会的权利按照我们党章第六条规定应该无条件地属于中央委员会；章程要求确定各委员会的自治范围，在确定这些范围方面有决定权的是党的中央机关，而不是党的地方机关。这是一个基本道理，而那些说什么“组织”并不常常以“批准章程”为前提的深奥的论断纯粹是幼稚的想法（实际上同盟自己也曾表示想要成为一个根据正式章程组成的团体）。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忘记了（也许是暂时忘记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道理。按照他的意见，要求批准章程，只是表明“以前的革命的火星派的集中制已经由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代替”（同盟记录第95页），同时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篇演说里又说，他认为这正是问题的“原则的方面”（第96页），而他在他的《戒严状况》里却宁愿回避这个原则的方面！

普列汉诺夫同志立刻就回答马尔托夫，请他不要使用如官僚主义、昏愦刚愎等等这类“有失代表大会尊严”的字眼（见第96页）。于是他就同马尔托夫同志辩论起来，因为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些字眼是“对于一定方针的原则的表述”。当时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同所有的多数派分子一样，曾根据这些字眼的具体意思来加以考察，清楚地了解这些字眼没有什么原则的意思，而只有所谓“补选的”

---

作有原则性的人看待，那末就请你们埋怨自己吧。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况》里说到同盟代表大会时，隐讳了他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但是又喋喋不休地说列宁是高于中央的人，说列宁一闪目光就能使中央下一道命令，说中央委员会是以得胜的姿态冲进同盟的等等。我决不怀疑，马尔托夫同志这样选择主题正是证明他有自己的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则性。

意思。虽然如此，但是他还是对马尔托夫之流和捷依奇之流那种顽固态度做了让步（第 96—97 页），愿意对他们那些似乎是原则的观点作原则的考察。他说，“如果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各委员会在建立其组织方面、在制定其章程方面是自治的），那它们就会是在对整体的关系上，对党的关系上实行自治了。这已经不只是崩得派的观点，而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了。其实，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人的权利是无限的，认为他们可能彼此发生冲突，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自行确定自身的权利范围。自治的范围不应当由该集团自己确定，而应当由它作为其一部分的那个整体来确定。崩得就是违反这个原则的明显的例证。可见，自治的范围是要由代表大会或者由代表大会所成立的最高机关来确定的。中央机关的权力应当以道义的和理性的威信为基础。这一点我当然是同意的。组织中的每一分子，都应当关心使机关有道义的威信。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需要有威信，那就不需要有权力了……把思想的威信和权力的威信对立起来，——这是这里所不应当有的无政府主义词句。”（第 98 页）这些论点本来是再浅显不过的，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定理，根本用不着进行什么表决（第 102 页），至于说人们不相信这个定理，那只是因为“目前各个概念都混淆了”（同上页）。但是，少数派既然满怀着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思想，也就势必企图把代表大会的成果推翻，违抗多数的意志；但这种企图是只能用无政府主义的调匈来辩白的。最可笑的是，少数派除了埋怨普列汉诺夫使用了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一类过分厉害的字眼以外，再也不能向普列汉诺夫提出任何其他的责难了。普列汉诺夫很公正地嘲笑了这种埋怨，他问道：为什么“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字样不便使用，而 *lèse-majesté*（得罪陛下）和昏愦刚愎字样却便于使用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种独特的

误会 (qui pro quo) 原来是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习以为常的了：他们的新字眼带有鲜明的“火气”的迹象；当人家指出这一点时，他们就很气愤——说什么我们是有原则性的人；但是，人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在原则上否定局部服从整体，那末你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了。于是他们又因人家使用了厉害的字眼而生气了。换句话说：他们想同普列汉诺夫搏斗，但是又要普列汉诺夫别认真攻打他们！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他一切“孟什维克”企图用同样幼稚的手段揭露我的一个“矛盾”，已经不知有过多少次了。他们从《怎么办？》或者从《给一个同志的信》里引证一些谈到思想影响，谈到争取影响的斗争等话，同经过党章实行“官僚主义”影响，以及依靠权力实行“专制”倾向等等对立起来。多么幼稚的人啊！他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真的，向自己的老同志谆谆讲解这样的基本道理，真叫人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你感觉到，问题只是在选举问题上少数不愿意服从多数！但是，在原则上，所有这些滔滔不绝地瞎说我有自相矛盾之处的责难，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新《火星报》并不拒绝利用党机关的招牌和权利，但是不愿意服从党的多数。

如果说这些谈论官僚主义的词句中有什么原则，如果说这不是用无政府主义态度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那末这个原则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减轻个别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所负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认为组织关系只不过是口头上的抽象承认而已。这

一点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看见了，当时阿基莫夫之流和李伯尔之流，正如后来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一样，大谈“可怕的”集中制。机会主义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机会主义的本性，而且不仅在俄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分析新《火星报》所刊载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论文时就会看出来了。

### (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

同盟否决了关于同盟章程必须经中央批准的决议案（同盟记录第105页），正如党代表大会的整个多数派立刻指出的，这是“粗暴地违反党章的行为”。这样违反党章（如果把这看成是一些有原则性的人的做法），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这种做法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环境中必然造成一种印象，即党的少数派在向党的多数派“进行报复”（同盟记录第112页），这种做法是意味着党内的少数派不愿意服从党和不愿意留在党内。同盟既然拒绝根据中央的声明通过必须修改章程的决议（第124—125页），结果同盟大会势必被认为是一个非法的大会，因为这个大会虽然想算作党组织的大会，同时却又不服从党中央机关。党内的多数派也就立刻离开了这个冒充党的大会，不去参加这一幕不体面的滑稽剧。

于是，那种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而在讨论党章第一条问题时暴露出思想动摇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在实践上就走到了早在9月间，即在一个半月以前我曾经预言过的那种合乎逻辑的结局，即走到了破坏党组织的地步。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在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普列汉诺夫同志居然向两个党中央机关的同事声明，说他不忍“枪杀自家人”，说他“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

裂”，说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必须作最大限度的个人让步，其实当时进行这种极残酷的斗争正是为了取得这种让步（这种成分比为了维护党章第一条上的不正确立场所暴露的原则要大得多）。为了确切说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种有全党的重大意义的转变，我认为最好不拿私人谈话做根据，也不拿私人信件（这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去援引）做根据，而是拿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全党面前对情况作的说明，即拿他发表在《火星报》第五十二号上的《不该这么办？》一文做根据，这篇文章正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在我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03年11月1日）以后，在补选马尔托夫分子（1903年11月26日）以前写成的。

《不该这么办？》一文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在政策方面不应当采取太激烈太不让步的莽撞的态度，认为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对修正主义者（即那些和我们接近或者态度不一贯的分子中的修正主义者）以及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是必要的。这种抽象的一般的论点当然使《火星报》的读者莫名其妙。普列汉诺夫同志那些漂亮的傲慢的声明（在以后各篇文章中所作的声明），说人们由于不了解他的新奇思想和不懂得辩证法而没有懂得他的意思等话，使人听起来真是忍不住要发笑。其实，当《不该这么办？》一文写成时，能懂得的只有十来个住在日内瓦郊区两个地方（其地名的第一个字母是相同的）的人。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不幸，就在于他把只是针对这十来个参加代表大会以后全部同少数派作斗争的人发出的一大堆暗示、非难、代数符号和猜测，都搬到成千上万的读者面前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所以陷入这种不幸，是因为他违背了他那提法很不恰当的辩证法的基本论点：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想用抽象的形式把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向马尔托夫分子让步的这个很具体的思想包起来，是不妥当的。

普列汉诺夫同志当作新颖的战斗字眼提出来的让步作法，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让步者已经深信那些要求让步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政治活动家总是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向那不合理的、对事业有害的要求实行让步。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他爽直地说要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现在全体党员已经从同盟代表大会记录中知道这就是马尔托夫分子）实行让步，即为了避免分裂而必须让步。可见，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所谓新颖思想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并不新颖的处世格言：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不大的无政府主义词句高于党内的大分裂。普列汉诺夫同志写这篇文章时，分明知道少数派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并且知道少数派是用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斗争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主张，要用个人让步的办法同这个少数派作斗争，正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伯恩施坦作斗争时那样（又是 *si licet parva componere magnis* [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数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说他不知道有什么人比伯恩施坦同志（不象普列汉诺夫同志以前所爱称呼的那样称为伯恩施坦先生，而是称为伯恩施坦同志）更善于接受周围人们的影响：我们要把他放到自家人中间，我们要选派他做国会议员，我们将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太激烈的手段（如梭巴开维支-帕尔乌斯之流）来反对这个修正主义者，我们将“用温柔的手段杀死”（*kill with kindness*）这个修正主义者，正如麦·伯尔（M. Beer）同志（我记得似乎是他）在一次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称道德国人乐于让步、爱好和平、温柔、灵活和审慎，而反对英国的梭巴开维支-海德门的攻击时所说的那样。同样，普列汉诺夫同志也想“用温柔的手段杀

死”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位同志的小无政府主义和小机会主义。诚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十分明显地暗示到“无政府个人主义者”时，有意地把修正主义者说得含糊不清，似乎他指的是从机会主义转向正统派方面的工人事业派分子，而不是开始从正统派转向修正主义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但这终究是幼稚的军事策略<sup>①</sup>，是构筑得很不高明的工事，根本挡不住全党公论的炮火。

所以，谁只要了解当时政治形势的具体情况，谁只要洞察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心理，谁就会懂得我当时不能有什么别的做法。我这段话是专对那些责怪我不应该让出编辑部的多数派分子说的。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由一个赞成多数派意见的人变成了坚决主张调和的人，可是我当时不能不把他这种转变了解为用意极好的转变。也许普列汉诺夫同志想在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达到公正的和平的纲领？凡是这样的纲领都归结于由双方当事人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普列汉诺夫同志究竟指出了多数派的什么错误呢？——他指出，对修正主义者采取了只有梭巴开维支才惯于采取的太激烈的态度。不知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是他自己说了关于驴子的那些挖苦话呢，还是当阿克雪里罗

① 在党代表大会以后根本就没有人谈到要对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勃鲁克尔等同志实行让步。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也要求“补选”。我甚至怀疑，斯塔罗维尔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们两人以“党内半数”名义递给我们纸条和“照会”时，未必和勃鲁克尔同志商量过…… 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以坚强的政治战士十分气愤的心情提出抗议，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同聚赞诺夫或马尔丁诺夫联合”，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同他们“勾结”，甚至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一起（以编委资格）“为党服务”（同盟记录第 53 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严厉地指斥了“马尔丁诺夫的倾向”（第 88 页），而当奥尔托多克斯同志<sup>37</sup>巧妙地暗示说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也许“承认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以及其他同志同样有权随心所欲地召集会议，为自己制定章程并按照这个章程行事”（第 99 页）时，马尔托夫分子马上就来否认这一点，就象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一样（第 100 页，“奥尔托多克斯同志对于阿基莫夫之流、马尔丁诺夫之流等人的耽心”，“是毫无根据的”）。

得在场时很轻率地讲了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话；普列汉诺夫同志宁愿使用“抽象”说法，并把罪过转嫁到别人头上。这当然是各人有各人的兴趣。但是，我无论在给一个火星派分子的信中以及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都公开承认过我说话太激烈；难道我能不承认多数派方面的这种“错误”吗？至于讲到少数派，普列汉诺夫同志很清楚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是修正主义（参看他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机会主义和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关于饶勒斯主义的评语）和导致分裂的无政府主义。难道我能阻挠想用个人让步以及一般用种种 «kindness»（亲切的、温柔的手段等等）使大家承认这种错误并消除它的害处的企图吗？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公然劝告大家“宽恕”“只是由于稍微不一贯”而成了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修正主义者中的“敌人”，我又怎能阻挠这样一种企图呢？既然我不相信这种企图能有什么良好结果，那末我除了在中央机关报方面表示个人让步，并为维护多数派的立场而转移到中央委员会去以外，又有什么办法呢？<sup>①</sup>当时我不能绝对否认这种企图可能成功而独自对于分裂的危险负责，因为我自己在 10 月 6 日的信中也曾经想把无谓争吵解释为是出于“意气

---

① 关于这一点，马尔托夫同志很中肯地说我是带着武器和行囊 (*avec armes et bagages*) 转移的。马尔托夫同志喜欢使用军事比喻：向同盟进军，战役，治不好的创伤，如此等等。老实说，我也有爱用军事比喻的癖性，特别是现在从太平洋传来的消息很引人注意的时候。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如果按军语来说，下面就是事实真相。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占领了两座炮台。你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攻击这两座炮台。在第一次小规模的相互射击以后，我的一位同事，一座炮台上的指挥官，敞开了大门迎接敌人。我当然就带着自己的一小队炮兵转到另外一座几乎还不巩固的炮台上——“避开”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我甚至提议讲和，难道可以同两个强国作战吗？但是，新的联军拒绝同我讲和，反而用炮轰击我这座“残存的”炮台。于是我就开炮自卫。而我过去的那位同事，指挥官却怀着十分愤怒的心情一本正经地喊道：看哪，善良的人们，这个张伯伦多么不喜欢讲和呵！

用事”。至于拥护多数派的立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我自己的政治职责。在这方面指望普列汉诺夫同志是很困难而且很危险的，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显然决心要把他所谓“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当自己的好战癖性同政治的考虑相抵触时便没有权利迷恋这种癖性”一语用辩证法的口气解释成：如果真要射击，那就以射击多数派更合算些（按日内瓦11月间的天气来说）……当时所以必须拥护多数派的立场，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公然违反必须具体地全面地观察问题的辩证法要求，说到革命家的善良（？）愿望时居然回避了对一个革命家的信任问题，对一个领导了我们党内一定派别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信任问题。普列汉诺夫同志讲到无政府个人主义，并劝告大家说“有时”应该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装作看不见，“有时”要向“完全不是由忠实行革命思想的情感所引起的”知识分子放肆行为表示让步，但是他显然忘记了也应当考虑到党内多数派的善良的愿望，忘记了在什么限度内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让步的问题应当由实际工作者去解决。同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进行文字斗争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个组织内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实际工作就比较困难了。如果一个著作家竟然要负责决定对于无政府主义实行可能的实际让步的限度，那就只能暴露出他的过分的、十足学究气的、文人的自大狂了。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竟皇地宣称（正如巴札罗夫<sup>38</sup>所说的那样，为了摆一摆资格），一旦发生新的分裂，工人们不会了解我们，同时他自己又在新《火星报》上登载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按其真正的具体的意義来说，不仅工人始终不能了解，而且根本是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了解的。怪不得有一个中央委员读了《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校样，曾警告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他这篇文章恰巧破坏了他自己想把某些文件（党代表大会记录和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公布范围稍微缩小

的计划，因为这篇文章激起一般人的好奇心，把一些带有刺激性而又完全暧昧不明的东西送到街头去裁判<sup>①</sup>，必然引起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怪不得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一篇议论抽象和态度暧昧的文章使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拍手称快：使《革命俄国报》<sup>40</sup> 的作家欢欣鼓舞，使《解放》杂志方面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者大加赞扬。所有这些可笑而又可悲的误会，所有这些使普列汉诺夫同志后来很可笑而又很可悲地企图摆脱的这些误会所以发生，正是因为他违背了具体问题应该完全具体分析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例如，司徒卢威先生高兴是完全自然的，因为他根本不愿理会普列汉诺夫同志所追求的（但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那些“良好的”目的（用温柔的手段杀死）；司徒卢威先生欢迎而且也不能不欢迎现在人人都看见的在新《火星报》上开始产生的这种朝向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方面的转变。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欢迎各该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每一次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哪怕是最小的和暂时的转变。聪明的敌人所作的估计很少是纯粹的误会：请你告诉我，赞扬你的是谁，那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普列汉诺夫同志徒然地期望读者不细心，竟说多数派根本反对在补选方面做个人让步，而不是反对从党的左派转变到右派方面去。问题实质完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避免分裂而实行个人让步（这是很值得表扬

---

① 我们在一所关着房门的屋子进行了非常热烈的争论。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跳了起来，把临街的两扇窗子打开，并叫骂什么梭巴开维支、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什么修正主义者等等。当然，街头上聚集了一群好奇的人，而我们的敌人就幸灾乐祸了。那时，其他参加争论的人也走到窗前，表示愿意把问题从头到尾说个清楚，而不暗示那些谁也不知道的事情。这时忽然有人把窗子关上了，说什么用不着谈无谓争吵（《火星报》第 53 号第 8 页第 2 栏倒数第 24 行）。普列汉诺夫同志，如果说本来就不需要在《火星报》上提起“无谓争吵”<sup>39</sup>，那就对了！

的事情)，而在于他虽然完全承认必须同那些态度不一贯的修正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争论，却又宁愿同多数派进行争论，而他所以同多数派发生分歧，又是由于对无政府主义可能实行实际让步的限度问题。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编辑部的成员，而在于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他已经不在党中央机关报上维护这个立场了。

至于说到当时作为多数派的唯一有组织的代表机关的中央委员会，那末普列汉诺夫同志当时同中央委员会发生分歧，只是由于对无政府主义可能实行的实际让步的限度问题。自从 11 月 1 日我退出编辑部而让用温柔的手段杀死的政策自由进行的时候起，几乎已经一个月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有充分可能通过各种交往来检验这个政策是不是行得通。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钻进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应该用宽恕敌人的态度同修正主义进行争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应当用温柔手段使无政府个人主义就范），特别鲜明地印在这个入场券上。先生们，请进吧，我会用温柔的手段杀死你们的，——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个请帖上对自己的编辑部新同事们说的话。当然，中央委员会只得说出自己的最后的话（最后通牒，也就是关于可能和平的最后的话），说从中央委员会的观点看来，在什么限度内可以容许对无政府个人主义实行实际的让步。或者是你们愿意和平，那时我们就会给你们一定数量的席位，以表明我们态度温和，爱讲和平，愿意让步等等（我们为了保障党内和平所能给予你们的不过如此，和平并不意味着没有争论，而是意味着不允许无政府个人主义破坏党）。请你们接受这些席位并逐渐从阿基莫夫方面转向普列汉诺夫方面吧。或者是你们想坚持并发展你们的

观点，最终地转到（哪怕只是在组织问题上）阿基莫夫方面去，想使党信服你们是正确的，而普列汉诺夫是错误的，——那就请你们组织自己的著作家集团，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开始用正派斗争和公开论战的手段争取多数吧。中央委员会在 1903 年 11 月 25 日的最后通牒内（见《戒严状况》和《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sup>①</sup>）十分清楚地向马尔托夫分子提出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完全符合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在 1903 年 10 月 6 日给旧编委们写的那封信的内容：或者是意气用事（那时可以——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实行“补选”），或者是原则性的分歧（那时应当先说服党，然后才谈得上改变中央机关的成员）。中央委员会当时有理由让马尔托夫分子自己来解决这个二者必取其一的难题，尤其因为正是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宣言（《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里写过如下一段话。

“少数派只要求得到一种荣誉，即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作出第一个范例：处在‘失败者’的地位时可以不组织新党。少数派的这

---

① 至于马尔托夫在《戒严状况》中引用私人谈话等等歪曲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的把戏，我当然是不会加以分析的。这套把戏就是我在前一节曾经说过的“第二种斗争方法”，这套把戏只有神经病理学专家才有本事把它弄清楚。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在那里硬说他们同中央订立过不发表谈判内容的协定，可是这种协定不管怎样去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当时代表中央进行谈判的特拉文斯基同志曾用书面通知我，说他认为我有权在《火星报》以外的刊物上发表我给编辑部的信。

马尔托夫同志那里只有一个词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词就是“最坏的波拿巴主义<sup>41</sup>”。我觉得，马尔托夫同志把这个概念提得十分凑巧。让我们冷静地看一看这个概念是意味着什么吧。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用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反人民（或党）意志的手段来取得权力。马尔托夫同志，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就平心静气地让公众来判断，是谁表现过这种“最坏的波拿巴主义”，是本来能够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行使自己的可以不让马尔托夫分子进来的形式权利，但是没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列宁和伊格烈克<sup>42</sup> 呢；还是那些在形式上正当地占领了编辑部（“一致同意的补选”），但明明知道这在实质上是不符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并害怕由第三次代表大会来检验这种意志的人们？

种立场是出自他们对党组织发展过程的全部看法，出自他们对他们自己同以往的党的工作之间的牢固联系的认识。少数派不相信‘纸上革命’的神秘力量，认为自己的志愿有深刻的十分重要的根据，能保证他们在党内用纯粹思想宣传手段使自己的组织原则取得完全的胜利。”（着重号是我加的）

多么漂亮、多么自负的言词呵！在我们根据经验确信，这些言词只不过是一些言词时，又是多么沉痛呵……马尔托夫同志，对不起，现在我要代表多数派表示要求获得你们没能获得的这种“荣誉”了。这种荣誉真伟大，值得为它一战，因为小组习气的传统给我们留下的一种习气就是，动辄进行分裂和十分热心运用“不是咬牙切齿，就是握手言欢”这一格言。

大快事（指有统一的党）应当高于并且确实高于小别扭（指为补选进行的无谓争吵）。我退出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伊格烈克同志（他是由我和普列汉诺夫推举为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总委员会的）退出了总委员会。马尔托夫分子用一封等于宣战的信（见我们引用过的那本书）回答中央委员会关于提议和平的最后的话。那时，并且直到那时，我才给编辑部写信（《火星报》第53号）说到公论问题<sup>①</sup>。我说，如果真要谈到修正主义，争论不一贯性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行为，争论各领导人的失败问题，先生们，那就让我们把一切都说出来，痛痛快快地说出全部事实真相吧，——这就是我那封谈到公论问题的信的内容。编辑部对这封信的回答是破口大骂，并堂皇地训诫说：不要掀起“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火星报》第53号）。那时，我暗自忖度：啊，原来是“小组

①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98—102页。——编者注

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这符合我的想法 (es ist mir recht)，先生们，这一点我倒是同意的。那末这就是说你们把“补选”纠纷公开叫作小组的无谓争吵了。这倒是真话。可是，如果同一个(似乎是同一个)编辑部在同一号(第 53 号)的社论上又谈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那就令人觉得是杂音了<sup>①</sup>。你不应该提起关于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补选而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无谓争吵。我们却要提起关于中央委员会补选的问题，并且认为这不是无谓争吵，而是关于“形式主义”问题的原则分歧。不呀，亲爱的同志们，对不起，这样的事情，我可不会让你们来干了。你们想向我这座炮台开火，同时又要我把大炮交给你们。真是开玩笑呀！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sup>②</sup>，并且把它发表在《火星报》以外的地方；我在这封信中简略地说明了事实真相，并且再三问道，可以不可以按照你们占中央机关报而我们占中央委员会的分配原则求得和平。任何一方面都不会觉得自己在自己的党内是“外人”，至于向机会主义方面的转变，我们可以争论争论，首先在报刊上争论，然后也许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

一听到我提起和平，所有敌人的炮台——包括总委员会在内——都立刻开炮来回答。真是弹如雨下。什么专制君主，施韦泽，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高于中央的人，片面性的人，莽撞的人，执拗的人，眼光狭小的人，疑神疑鬼的人，不讲和气的人……好极了，我的朋友们！你们射完了吗？你们的军火库里再没有什么

① 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杂音”只是因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中有杂音。关于“无谓争吵”的文章是普列汉诺夫写的(见他在《可悲的误会》中的自白，第 57 号)，而社论《我们的代表大会》是马尔托夫写的(《戒严状况》第 84 页)。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

② 见《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103—110 页。——编者注

东西了吗？你们的炮弹原来是很不顶事的呀……

现在该我说话了。现在我们看一看新《火星报》的新组织观点的内容，以及这些观点同我们党内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至于这种划分的实质，我们在分析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时已经说过了。

###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 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两篇小品文<sup>①</sup>当作基本对象来考察。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那个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不管它们如何产生，不管“补选”问题如何。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时候，那就让我们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一个基本论点（《火星报》第 57 号），就是“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有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互相对抗的程度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个运动”。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运动的无产阶级目的（在俄国）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这里影响工人群众的却是“社会上的异己分子”，即激进知识分子。总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定，我们党内的无产阶级倾向和激进知识分子倾向是互相

<sup>①</sup> 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两年来》文集，1905 年圣彼得堡版第 2 册第 122 页及以下各页。（这是列宁给 1907 年版加的注。——编者注）

对抗的。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在这里（而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确实存在着这种对抗。况且，大家都知道，正是这种对抗才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目前社会民主党已经分成革命的（即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即修正主义，内阁主义<sup>43</sup>，改良主义的）两派，这一点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的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接近到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便怕起来了，向后退缩了。他一点也不打算分析一下，上述这种划分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编辑部一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怕得要死。虽然我们看了上述一切之后不应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理论家”却是一件害怕真相的奇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因自己有这个特性而避开关于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的材料，于是便到惬意的幻想中去求救。他说道：“合法马克思主义<sup>44</sup>或半马克思主义不是给了我国自由派一个文坛上的领袖吗，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出一个领袖给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呢？”关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这种惬意的幻想，我们只能说，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还不能替一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辩护。当那位半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流露出一个自由派分子的神态时，凡是愿意（和善于）探讨他的“倾向”的人所引证的并不是什么可能有的历史

捉弄，而是这位领袖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心理和逻辑的表现，是他全部著作的外貌特征，这些特征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sup>45</sup>。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从事分析“我们运动中的一般革命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时，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我们党内正统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倾向，那他不过是郑重地证明他自己的思想贫乏罢了。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只好用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那末，他的事情大概也是十分不妙的！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的引证，是更值得玩味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目前社会民主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sup>46</sup>之类的名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我们不会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那样害怕真相，且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我们代表大会的记录，看看这些记录究竟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供我们分析和检查现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倾向和我们所剖析的这种比拟。

第一个例子。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问题的争论。阿基莫夫同志（他“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声明：“关于夺取政权（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条文写得跟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大相同，有人可能把它解释成领导组织的作用一定会把受它领导的那个阶级推到后面去，并把它自己和那个阶级隔离开，而且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我们的政治任务也就表述得完全和‘民意党’的一样”（记录第124页）。普列汉诺夫同志和其他火星派分子立即反驳了阿基莫夫同志，指责他这是一种机

会主义观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向我们表明（不是用想象的历史捉弄，而是用事实）社会民主党内有现代雅各宾派和现代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谈起什么雅各宾派来，不正是因为他自己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吉伦特派为伍（根据他所犯的错误来说）了吗？

第二个例子。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认为在“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这个“基本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第169页）。他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否认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中派”或泥潭派首领（叶哥罗夫）和反火星派首领（哥里德勃拉特）当即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在“仿效资产阶级的策略”（第170页），——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为正统派同资产阶级倾向有联系的看法，不过不同的是阿克雪里罗得始终没有把这个意见具体地说出来，而哥里德勃拉特则把它同一定的辩论联系了起来。我们不妨再问一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也向我们具体地（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目前社会民主党内有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高喊反对雅各宾派，不正是因为他已经与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三个例子。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究竟是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这个口号的激励作用呢？究竟是谁叫人防备那些渗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谁在暗中把激进知识分子引到党里来，是谁在关心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是吉伦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抗辩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指责

“劳动解放社”多数的那个“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可是他抗辩得多么笨拙啊！他不过是附和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证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他所以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饰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分明是关心这种知识分子的言论。

运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唬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信民主要求有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刊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因此现在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如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显露出来的吉伦特式的怯懦心理。最滑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拼命想说出一种新意见（其实这种意见早已有人说过几百次了），即要人们防范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法国革命密谋家的策略（见第 62 号上的社论）<sup>47</sup>。在最近一号的《火星报》上，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也许想向我们证明，四十年代法国密谋家中有些人认为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是党用来影响阶级的基本工具，这早就成了家喻户晓和用不着再来说明的起码常识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见的幌子下重提旧事和回味起码常识，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处

的那种地位的必然结果，他们已经堕落到我党机会主义派中去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讲什么样的话。所以他们只好重复机会主义词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遥远的过去找到少许理由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内各种不同的色彩来看，这个立场是无法辩护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而外，还说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说不仅“经济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的毛病”，过分“迷醉”，等等。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醉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问道：他们究竟是再模仿什么人呢？这种议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呢？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1903年7月（第43号），人们就认为“经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完全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醉显然是一种祖传现象。《火星报》新编辑部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经完全被埋葬了的划分呢？难道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和阿基莫夫之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两年以前在《工人事业》杂志上犯的那些错误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成了十足的傻瓜了。可是，谁都知道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和阿基莫夫之流进行斗争，不是因为在《工人事业》杂志上所犯的旧的、已经完全被埋葬了的错误，而是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工人事业》杂志上的立场，而是根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来判断究竟哪些错误已经真正消除，哪些错误仍然存在，因而有争论的必要。到举行代

表大会时，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仍然存在，这些倾向曾经在讨论和表决许多问题时表现了出来，并且终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问题的实质完全在于，《火星报》新编辑部因某些很明显的原因力图模糊这种新的划分同我们党内目前机会主义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既然不善于说明新的划分的政治起源（或者说，为了让步想蒙蔽<sup>①</sup>这种起源），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引起的，其结果便是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由党内生活的真正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问题退回到早已解决了的而现在又故意搞出来的问题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来辩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那个始终贯彻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论中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认为“组织的生命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成正比例”，认为集中制不是“自满自足的东西”，不是“万灵丹”等等，等等。这是多么深奥而伟大的真理呵！纲领的确比策略重要，策略比组织重要。识字课本比词源学重要，词源学比句法学重

① 见《火星报》第五十三号上刊载的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副题上，大概排错了几个字。“关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几字显然是“关于同义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补选”几字之误。虽然在相当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欲望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许多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也许愿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所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回忆的错误）问题。

要，——可是，关于那些在考试句法学时没有及格而现在居然因留级而矜夸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的议论，象一个机会主义者（关于党章第一条），而在组织中的行动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现在他又在加深社会民主主义。太自不量力了！其实，什么是组织呢？它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它不是万灵丹；什么是句法学呢？它是没有词源学那样重要的东西，它不过是把各个单字联起来的形式罢了……《火星报》新编辑部得意地问道：“如果说，代表大会制定党纲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大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第 56 号的附刊）我想，这个经典性的名言将要博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并不亚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句名言：社会民主党也和全人类一样，永远只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要知道，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是与此同出一辙的。为什么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的这句话遭到讥笑呢？这是因为他用了一些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他们不会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的毛病辩护。同样，新《火星报》也是用一些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某些同志的那种知识分子的不坚定（因此他们只能谈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话）辩护！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这难道不是夸奖那些留级的人吗？

通过党纲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你们看，这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含有多么浓厚的激进派知识分子的气味，这种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比对社会民主主义要情投意合得多！要知道，集中化这个词在这句名言里完全应当从象征的意

义上去理解。既然说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思索，那末他们不妨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纲，这不仅没有使我们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没有使我们避免分裂。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我的老天呀！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来复去的讲！）。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从前，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就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声明在统一以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根本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我们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实行了这个步骤：我们规定了把一切小组溶为一体的统一的组织形式。现在却有人把我们拉转去，把这种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转去干无政府主义行为，讲无政府主义空话，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么读识字课本要比学句法学更能促进文理通顺的道理来替这种退步辩护！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使用起来了。我们不妨看看新编辑部发表的这样一段议论。亚历山大罗夫同志说：“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在党内不只应当通过思想斗争，而且应当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行。”编

辑部教训我们说：“把思想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样相提并论，的确不坏。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在第五十六号附刊第四版第一栏下面确实是这样刊印的！），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和那种说铁球是铁球，炸弹是炸弹的笑话毫无二致。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正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究竟是由更高级的形式，即由大家必须遵守的党的组织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更高级的形式拉转到更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白；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从前把我们从计划策略拉转到过程策略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新《火星报》为了反对那些似乎只看到形式而看不到内容的人所说的这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的大话（第58号的社论）。难道这不是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吗？头号阿基莫夫主义曾经拿“无产阶级斗争”的更“深刻”内容，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策略任务的提法上的落后开脱。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也用组织不过是形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的落后辩白。替小弟弟担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因为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学生先生在党组织监督下工作，就急于要承认他们是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们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精神，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党纲和策略多少有些认识的无产阶级分子，都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并不是无产阶级，

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仇视和鄙弃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教育。第二号阿基莫夫之流，现在也和头号阿基莫夫之流从前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一样，在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组织起来的地步。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感到自己是党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象他从前用十分鄙弃的态度斥责过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一样，用十分鄙弃的态度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最后，请看一看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的深奥思想吧。他说：“如果真想建立一个能将革命家活动〈用着重号是为了加深意思〉统一而又集中起来的‘战斗’的集中组织，那末，这种思想只有在有了这种活动的时候才会自然实现〈真是既新颖又聪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形式〈请听，请听呀！〉，只能随同〈这里以及这段引文里其他各处的着重号，都是作者自己加的〉构成其内容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而成长起来”（第 57 号）。这岂不是和民间故事里的那个人物遇见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的笑话一模一样吗？大概，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号的）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不识时务的人才会向落在后面的人们喊什么齐步走！不要赶到前面去！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毫无疑问，我们党的工作内容<sup>①</sup>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得多，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进步，对工人群众（不仅对

① 更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确定（在党纲等等中确定）的，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同样，关于“内容”问题，也不妨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六号（第 46 号至第 51 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十二号（第 52 号至第 63 号）比较一下。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

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示威和总罢工时进行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触目伤心，无限惭愧。工作组织比作品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集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之流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个时候带着深思的神情鼓吹说：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如果有人成心想加深谬论并从大道理上替机会主义词句找一些根据，那就请看在组织问题（党章第一条）上所犯的小错误会引向怎样的结局吧。要慢慢地走，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从前我们就听见有人用这个调子来对待策略问题；现在我们又听见有人用这个调子来对待组织问题。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心理的必然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推崇为观点的体系，推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从他的心理中产生这样的东西。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有人企图把它推崇为观点的体系。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过的意见：参加社会民主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他的深奥思想

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揭发我的罪状，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第57号的附刊）。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那个吓人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了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始终教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要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领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领会的纪律和组织。对这个学校怕得要死，对这个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因而也就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 *Edelanarchismus* 的无政府主义即所谓“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据我看不如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并且他们认为特别吓死人的，就是把编辑变成工作人员），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对“形式主义者”）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五

十八号上向我提出的正是这样一种训示，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引了我在《给一个同志的信》里所说的话。举一些涣散时代例子，小组时代例子，来替在党性确立的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的行为辩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某一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的要挟”来解决，正如我在《给一个同志的信》<sup>①</sup>里根据许多小组和当时我们六人编辑部的经验所形容的那样。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引以为苦，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溶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溶合已经实现了，可是有人硬向后拉我们，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词句来款待我们！在那些习惯于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sup>48</sup>式庭园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当然是不需要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以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保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用这两种东西来保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

---

① 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04—221页。——编者注

僚主义态度”（在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使我们除掉小组的刚愎自用，除掉小组的任意胡闹，除掉小组的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无谓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用教训的口吻反对亚历山大罗夫说：“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第 56 号的附刊）编辑部不了解，这种提出信任——赤裸裸的信任——的范畴，恰巧就是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思想彻头彻尾地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部或《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纲领、我们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和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行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硬向后拉我们，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请看，我们的所谓党的编辑部怎样议论那些也许要求派代表参加编辑部的著作家集团吧。处处藐视纪律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叫起纪律来。”他们说

什么，假如提出这种要求的是一个讲道理的团体，我们就同它“磋商”（原文如此！）；不然我们就要把它的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这对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态度呀！其实，这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的，充满了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只砖片瓦。这种立场的虚假，必然会产生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深奥思想，以至把涣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则，同时在口头上又伪善地把这种涣散状态说成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级党机关构成的严密体系，因为在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派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根本不需要什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用什么“官僚主义的形式”手续规定“磋商”或划清界限的党的办法，而是让人们去推崇以前小组的无谓争吵，空谈“真正社会主义的”组织方法。

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正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那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上述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更丰富的知识、更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这个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从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同吉伦特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这个特点就是拥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对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嚎叫，对“非火星派

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拥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惋惜，对“唯命是从”这种要求的滑稽喊叫，对“昏愦刚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则意思（如果说它含有什么原则意思的话<sup>①</sup>）。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捍卫和辩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的，无论是对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都是如此。新《火星报》拥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的立场，是同拥护自治制的立场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信用扫地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拥护自治制还有些害羞，它还叫我们相信它同情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在集中制这个词的下面加上着重号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所谓“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准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拥护自治制的思想。难道现在不是大家都看见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拥护的不是自治制吗？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拥护的正是自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用一种可笑的热心来证明，部分不应该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应有自治权，国外同盟的章程确定了这些关系，它确实是不管党内多数的意志的，不管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报》（第 60 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拥护的正是自治制。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

---

① 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叫骂的“补选”意思撇开不谈。

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拥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sup>①</sup>，我认为重要的是，应当在这里指出他无疑有拥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在新《火星报》（第 53 号）上拿“民主主义的形式原则”（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和“官僚主义的形式原则”相对照，要算是分析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唯一尝试了。这种对照（可惜，这种对照也和他们对非火星派分子的指正那样没有加以发挥，没有加以阐明），确实有些道理。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机关对于部分的权力和权限。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社会民主党革命派力求在组织上由上层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火星报》组织）。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里的一切分子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要多让党内先进分子满意，少让党内落后分子满意，往往要多让党内革命派喜欢，少让党内机会主义派喜欢），使它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是如此，目前无政府主义者所根本仇视

---

① 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六条）。如果不把工作人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去，那怎么能分配人力呢？关于这个浅显的道理，真是不好意思来说明。

的这种风气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则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所指出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这些原则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尾巴主义和吉伦特主义），在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在有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地方（试问在什么地方没有这种划分呢？）都可以看到，不过 *mutatis mutandis*（有相当的改变）罢了。这种情形最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暴露得特别明显，近来在第二十号萨克森选区选举运动中遭到的失败（所谓觉勒事件<sup>①</sup>）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日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疯狂努力的结果。觉勒（他从前是一个牧师，他是不无名气的《当工厂工人的三个月》（*<Drei Monate Fabrikarbeiter>*）一书的作者，他是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上的“主人公”之一）本人是一个露骨的机会主义者，所以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主持的《社会主义月刊》<sup>50</sup>立刻来“袒护”他。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有联系的。当时出面陈述“新”观点的是沃尔弗干格·海涅同志。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参加社会民主运动并带来机会主义思想习气的典型知识分子的面目，只要指出沃尔弗干格·海涅同志是一个比德国的阿基莫夫同志小一点而比德国的叶哥罗夫同志大一点的人物就够了。

---

① 觉勒 1903 年 6 月 16 日曾在第十五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德勒斯顿代表大会<sup>49</sup>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第二十号选区议员罗津诺夫逝世以后该区选民又想推举觉勒为候选人，来补这个缺额。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萨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坚决表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觉勒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觉勒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失败。

沃尔弗干格·海涅同志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也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那样大举进攻。单是论文的标题《对党勒事件的几点民主意见》（《社会主义月刊》4月第4期），就已经了不起了。内容也同样是声势浩大的。沃·海涅同志坚决反对“侵犯选区自治权”，捍卫“民主原则”，抗议“委任的上司”（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涉人民自由选举议员。沃·海涅同志教训我们说，问题并不在于偶然事件，而在于一般“在党内有一种官僚主义和集中主义的倾向”。他说，这种倾向从前也有过，但是现在已经成了特别危险的东西了。必须“在原则上承认：党的地方机关是党生活的体现者”（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所著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一书中剽窃来的）。不要“让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一个中央机关来处理”，应当要党防备“脱离实际生活的教条政策”（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大谈“生活一定会占上风”那篇演说中借来的）……沃·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论据说，“如果细心观察事物的根源，如果把这次也和任何时候一样起过不小作用的种种个人冲突撇开不谈，那末我们就会看到，对修正主义者所持的残酷态度（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大概是想暗示要把“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吧），主要是党内的正式代表不信任‘局外人’（沃·海涅显然还没有读过论反对戒严状况的小册子，因此只好借用英国的名词：Outsiderum），传统对一切异乎寻常的现象表示不信任，没有个性的机关对一切有个性的东西表示不信任（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反对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决议），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明的那种倾向，就是党内官僚主义和集中主义的倾向”。

“纪律”这个概念在沃·海涅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高尚愤怒，并不亚于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他写道：“……有

人指斥修正主义者缺乏纪律，只是因为他们给《社会主义月刊》写过文章，有人甚至不愿承认这个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它不受党的监督。单是这种试图缩小‘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单是这种要人在应当有绝对自由的思想工作方面遵守纪律的要求”（请回忆一下所谓思想斗争是一个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的说法）“就足以证明那种官僚主义和压制个性的倾向了”。接着沃·海涅又滔滔不绝，百般攻击这种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尽量集中化的巨大组织，一个策略，一个理论”的可恨倾向，攻击“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的要求，攻击“简单化的集中制”的要求等等，真是“仿照得阿克雪里罗得”一字不差。

沃·海涅所挑起的争论激烈起来了，既然德国党内没有什么补选问题的无谓争吵把这个争论遮盖起来，既然德国的阿基莫夫之流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经常在专门的机关刊物上阐明自己的面目，于是这次争论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统派和修正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的分析。以革命派（它当然也和我们这里一样被人加上“独裁制”和“宗教裁判”等等的可怕罪名）代表之一的资格出面说话的，是卡·考茨基（《新时代》杂志<sup>51</sup> 1904年第28期的《选区和党》——«Wahlkreis und Partei»一文）。他说：“沃·海涅的论文表明整个修正派的思想进程。”不仅德国而且法国和意大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到处拼命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的，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组织的瓦解，把“民主原则”歪曲为无政府主义。卡·考茨基教训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群众统治他们委任的代表，它与那些冒充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统治者的权力形式不同”。卡·考茨基详细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自治派所起的破坏组织的作用，说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

子”<sup>①</sup> 参加社会民主运动，才使机会主义、自治主义和违背纪律的倾向加强起来，并且再三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德国的机会主义比法意两国的差，所以那里的“自治制的倾向所产生的结果，不过是唱一些反对独裁者和大宗教裁判者，反对开除教籍<sup>②</sup> 和迫害异教徒的相当好听的高调，只是无数吹毛求疵的议论和争吵，分析这种议论和争吵只会引起无数的口角”。

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比德国的更差，所以俄国的自治制倾向所产生的东西，其思想成分少，“好听的高调”和争吵的成分多，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难怪考茨基要作出结论说：“也许，世界各国修正主义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不象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性质一致，虽然形态各不相同，色彩互有差异。”在谈到正统派和修正派在这方面的基本倾向时，卡·考茨基也用“吓唬人的字眼”表示说：官僚主义versus(对)民主主义。卡·考茨基写道，据说，给予党的执行委员会权力来影响各地选区选择候选人（国会议员候选人），就是“无耻地侵犯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是要全部政治活动自下而上地，由群众自动地来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用官僚主义的办法来进行……但是，如果说有什么真正民主的原则，那它就是多数应比少数占优势，而不是相反……”任何一个选区选举国会议员都是关系全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党至少应该经过党所信任的人(Vertrauensmänner)去影响指定候选人的事情。“如果谁觉得这太官僚

---

① 卡·考茨基把梯勒斯拿米来作例子。这种人愈是倾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然觉得党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拘束”。

② *Bannstrahl*——开除教籍。这是德国人用来表示俄国人所谓“戒严状况”和“非常法”等语的名词。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唬人的字眼”。

主义化或太集中化，那就不妨让他试一试，建议由全体党员 (sämtliche Parteigenossen) 来直接表决候选人。既然这办不到，那就根本用不着埋怨缺乏民主精神，因为上述职能也同其他许多有关全党的职能一样，是由党的一个或几个机关来执行的。”按照德国党的“习惯法”，从前个别选区也是就提出某某人为候选人的问题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同志式的商议”的。“可是党现在已经太大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习惯法已经不够了。当人们不再承认习惯法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时，当这个习惯法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个习惯法本身的存在受到驳斥时，那它就不成其为法了。因而绝对需要精确地规定这个法，把它明文规定下来……”乃至“用精确的章程确定下来<sup>①</sup> (statutarische Festlegung)，同时加强组织的严格性 (grössere Straffheit)”。

这样你们就看到，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严格性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严格性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试问，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捉弄人的历史还只私下里答应在将来什么时候指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德国的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它的聪明的代表人物并不亚于我国解放派先生，——当时是怎样对待这种冲突的呢？德国的资产阶级民

---

① 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党章法来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这个问题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召开党代表大会时起所经历的全部“更换”对照一下，是非常有益的。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演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 66 页以及以后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更换的全部意义。

主派马上起来响应了这个新的争论，并且也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也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拼命地袒护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由德国交易所资本创办的著名的《法兰克福报》<sup>52</sup>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1904年4月7日《法兰克福报》第97号晚刊），它表明无耻剽窃阿克雪里罗得的言论简直已经成了德国刊物的一种流行病。法兰克福交易所里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拼命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专制”，反对“党内独裁”，反对“党内首长的绝对统治”，反对“专门惩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的“开除教籍”手段，反对“盲目服从”“死板纪律”的要求，反对“唯命是从”，反对把党员变成“政治死尸”（这比讲小螺丝钉和小轮子更厉害！）的要求。交易所里的骑士们在社会民主党那里看见反民主的制度时愤愤不平地说，“据说，任何个人特性，任何个性都应当加以取缔，因为这种个性有产生法国制度的危险，即产生饶勒斯主义和米勒兰主义，如曾德尔曼〈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上〉叙述这个问题时直接说过的那样。”

---

总之，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原则的含义，毫无疑问，这也是机会主义的含义。证实这个结论的，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析，又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并且往往是用同样的字眼表现出来的。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虽然有上述条件

的差别<sup>①</sup>，但是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然是相同的。由于从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和目前在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也就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前我们是在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的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因此在目的方面的整个分歧也就必然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分道扬镳。后来我们是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因此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也就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什么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当然不象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那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涌到我们党内生活的前台来了。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纲领问题上的机会

---

① 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问题上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虽然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两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艾耳姆两同志，或同饶勒斯和米勒兰两人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问是相同的，虽然，人民没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星报》编辑部走马看花式地涉及考茨基和海涅的争论时（见第 64 号），畏缩地回避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

主义者爱德·伯恩施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本来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却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评”的“一般原则”（主要是用非批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来得重要。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老策略的，也是多半只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风凉话，但是根本不提出什么肯定的“内阁主义的”策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直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党章确定下来的”肯定的原则论点，尽管有人一再公开提醒他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绝对愿意“根本改良”我们的组织章程（《火星报》第58号第2版第3栏），但是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我们这个不管第一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主义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当然连在自己面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原则上走向自治制的倾向）。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幼稚的高调，谈些什么专制和官僚主义，什么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这种高调非常幼稚，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性的意思，哪些真正是补选问题的意思。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必然会导致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这必然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作吉伦特主义的空谈。最后，无政府主义原则是作为唯一的、真正肯定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因为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藐视纪律，要求自治，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派反复玩弄的一套戏法，尽力搪塞，根本不肯

把自己的原则肯定地表述出来①。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派那里，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这套戏法：藐视“正统思想”、忠实信仰、狭隘死板，提倡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以及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出的那种延绵不断的埋怨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联系的。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赶走他们，围困他们，欺侮他们。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制造某某人被欺侮和某某人欺侮这类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自己所意料的多得多。比如，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可以看出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受过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欺侮的人。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们把他们“欺侮”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小组和他们自己的小组遭到压制而受到致命的侮辱；这中间有

① 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知道，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思想，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相反的，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况》一书（第20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一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补选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泥潭里去。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过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补选进来，不过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方面去的道路走去。——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什么话？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列宁所说补选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原则。

马霍夫同志，他每当讲话的时候都受到了侮辱（因为他每一次都丢丑）；最后，这中间有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们受到侮辱是因为党章第一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是因为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所有这些难堪的侮辱，都不象许多庸夫俗子至今想象的那样，是由于有什么人说过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讦，进行了疯狂的论战，有什么人把门关得很响，有什么人要饱以老拳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如果我们在这三年中不仅说了一些空话，而且表示了一种应该行动起来的信念，那末，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我们和公开站在前列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欺侮过以后，我们只要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侮辱一下，就会使他们忍无可忍。数量转变成质量了。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侮辱的人都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嚎啕大哭，互相拥抱起来，并树起了“反列宁主义的起义”<sup>①</sup>旗帜。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本是一件好事情。革命派实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也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实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不好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以战俘的资格参加这种不妙的勾当。他竭力要“泄愤出气”，想在这个或那个起草有利于“多数派”的决议的人那里挑剔一下个别不恰当的词句，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呵！他的正统派真妙呵！”（《火星报》第63号附刊）。

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呵，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末，新《火

---

① 这种奇怪的说法是马尔托夫同志说出来的（《戒严状况》第68页）。马尔托夫同志总想等到他自己方面凑成五个人时实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巧妙，他分明是想用绝顶恭维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

报》编辑部就未免穷得靠乞讨过日子了。无论我怎么样穷，但我总还没有穷到非乞讨不可，没有穷到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而到某些地方委员的决议中去找材料来练习自己的机智。无论我怎样穷，但我总比某些人阔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而说出某句不恰当的言语，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在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是死死地抓住同社会民主党革命派原则相反的原则的。无论我怎么样穷，但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班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臆测起来的地步。可是新《火星报》编辑部只好如此。

读者们，你们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龙涅什委员会是个什么东西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可以读一读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从那里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的方向完全由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两同志表现了出来，这两位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党的革命派进行过全面的斗争，并且有几十次被大家——从普列汉诺夫同志起到波波夫同志止——当作机会主义者来看待。正是这个沃龙涅什委员会在它的1月份的传单（1904年1月第12号）上声明说：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有全党一切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平安无事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所提出的一切要求。1902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因此召集代表大会的事情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指定的那些人担任的。许多属于社会民主党而不属于火星派的组织，都没有被吸收来参加代表大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代表大会关于制定党纲和党章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至于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会的’重大缺陷，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是承认的。在

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于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过《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际工作——即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开完以后就提出了严重的修正。《火星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从社会民主党内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来审查，并且在代表人会参加者本人看来，显然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也就不能由党采纳为不可改变的决议，可是代表大会阐明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给予了大量的材料，此次代表大会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缺点，许多组织都表示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沃龙涅什委员会了解全党工作的整个重要性，所以对组织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热烈地发表了它的意见。它意识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整个重要性；欢迎已经成了中央机关报（主要机关报）的《火星报》所发生的转变。虽然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相信，困难的建党工作经过共同的努力是会日益改进的。鉴于有许多谣传，沃龙涅什委员会特向同志们声明，关于沃龙涅什委员会退党一事是根本谈不上的。沃龙涅什委员会十分了解，象沃龙涅什委员会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例子，会是加于党的一种多么厉害的责备，这对那些能仿效这种先例的工人组织是多么的不利。我们需要的不是制造新的分裂，而是坚决努力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并且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定期大会，不是一个成立大会。开除出党只能根据党的裁决来进行，因此任何一个组织，甚至中央委员会本身也没有权利开除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出党。况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第八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龙涅什委员会有

充分的权利把自己的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贯彻到党内外。”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六十一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字的最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

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吧。

####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只要整个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容易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员，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了解已有的大量文献的人，每个想了解许多摘录的指证、断章取义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其中每个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

我们且把各个显然不同的主要阶段列举出来：(1)关于党章第一条问题的争论。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斗争。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处在少数地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提出机会主义条文，因而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了。(2)《火星报》组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是佛敏还是瓦西里也夫参加五人小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文斯基参加三人小组——发生了分裂。我和普列汉诺夫争得了多数（九票对七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章第一条的问题上占少数。马尔托夫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具体地证明了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焦虑。(3)关于党章细节的争论的继续。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马尔托夫。我们又处于少数地位，并捍卫少数在中央机关内

的权利。(4)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我们成了多数并在选举中战胜了联盟(即火星报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两个三人小组中的席位。(5)在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因为补选问题而发生的无谓争吵。无政府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词句盛行一时。最不彻底和最不坚定的分子在“少数派”中占上风。(6)普列汉诺夫为了避免分裂而采取了“用温柔的手段杀死”的政策。“少数派”占据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并且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无谓争吵仍然充斥于一切。(7)对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攻击的被打退。无谓争吵似乎开始稍微平息下来。这样便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两个纯系思想性质而又使我们党极为关心的问题：(一)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多数”和“少数”两派从而代替了一切旧的划分这个事实的政治意义和原因何在？(二)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新立场有什么原则意义？

每个阶段都有其根本不同的斗争情势和特殊的直接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个别战斗。不研究每个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我们把这一点研究清楚以后，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过程确实是按着辩证法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一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于一切的无谓争吵<sup>①</sup>，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既然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房共居”，就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了；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

---

① 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补选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斗争情形，涉及党章第一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的问题的争论都是原则分歧。

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并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对于党章第一条问题的单独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了对于组织问题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个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根本划分的联系，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彼此之间的斗争也是按黑格尔的规律进行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黑格尔的伟大辩证法，拿来同那种替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出尔反尔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段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硬将统一过程中各个阶段发展的个别声明、个别因素混作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黑格尔的伟大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 *mettere la coda dove non va il capo*（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塞进去）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妙诀混为一谈。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过程的总结可归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公正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进的，所以我们也实行了一次革命！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果然实行了一次革命；一般地说世界是由革命推进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个一般的成语来断定，因为如果把永志不忘的马霍夫同志的那个永志不忘的句子换个样子来说的话，也有类似反动的革命。为了断定某次具体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

党），就必须知道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成了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就必须知道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鼓舞了战士。

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是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现象。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多少显著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往往是彼此极端仇视，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甘愿（在原则上甘愿）为了我们第一次在事实上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战利品并不是不用代价就能得来的，而是经过战斗争取来的。为了消灭小组而进行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这个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组习气、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富有党性的负责集体。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则上为了党牺牲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己的小组又是一回事。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象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公正说过的（偶然公正说过的）那样。为小组被消灭而受的委屈未免太厉害了。狂风把我党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都翻上来了，于是这些渣滓就卷土重来。以前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党内被击溃的机会主义派，用偶然的阿基莫夫的卤获品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对革命派占

了——当然是暂时的——优势。

结果，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发展和加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旧《火星报》曾教人领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领会处世妙诀：忍让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报》为俄国机会主义者以及西欧机会主义者所痛恨，但这是光荣的。新《火星报》“聪明起来了”，很快就不在以极端机会主义者赞扬它为耻了。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一致。在新《火星报》上，由于它的立场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甚至不以什么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政治上的伪善态度。它大骂小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它假仁假义，斥责分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以外，还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一个多少是有组织的党发生分裂。它声明必须考虑革命舆论，同时却又隐瞒阿基莫夫之流的赞扬，并制造一些无聊的谣言来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sup>①</sup>。这是多么可耻呵！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何等地步了呵！

进一步，退两步…… 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以及政党的发展中也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怀疑一分钟，也是一种罪大恶极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造成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

<sup>①</sup> 为了这件可爱的工作，甚至制定一个固定的格式，根据我们自己的某一个通信员的报告，多数派的某一个委员会虐待了少数派的某某同志。

系，用顽强而有步骤的努力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全部致命的危险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和在我们纲领和我们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既然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的竞争所分散，既然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既然经常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遭到任何曲折和后退，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词句，不管对落后的小组习气怎样大加赞美，不管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

## 附 录

### 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

这个事件和本书正文第十节所引用的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两同志的那封信里提到的所谓“伪造”(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名单有密切联系，这个事件的实情如下。古谢夫同志曾经通知巴甫洛维奇同志，说这份由施泰因、叶哥罗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同志构成的名单，是捷依奇同志转交给他古谢夫的(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信》，第 12 页)。捷依奇同志曾为古谢夫同志这个通知，责备他是“故意诬蔑”，后来同志仲裁法庭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见《火星报》第 62 号刊载的法庭判词)。当《火星报》编辑部把法庭的判词登出来以后，马尔托夫同志(已经不是编辑部)又印发了一个题为《同志仲裁法庭的判词》的传单，他在这个传单上不仅印了法庭的判词全文，并且印了关于此案全部审理经过的记录以及他自己所写的补充说明。在这个说明里，马尔托夫同志说“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这件事”是“可耻的”。为了回答这张传单，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利亚多夫同志和哥林同志印了一张题为《仲裁法庭中的第四个人》的传单，在这里他们“坚决表示反对马尔托夫同志的行为，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在法庭判词讲的更厉害，硬说古谢夫同志动机不纯”，虽然法庭并没有认为这里有什么故意诬蔑的成分，只是认定古谢夫同志的通知是不正确的。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详细地解释了古谢夫同志的通知可能是出于一种完全自然的误会，并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行为估计为“无理取闹”，因为马尔托夫同志自己发表过(并且在自己的传单中还发表)许多错误

声明，随便骂古谢夫同志动机不良。他们说，这里根本不能有什么不良的动机。据我所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文献”就是如此，我认为自己应尽的责任是要帮助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使读者完全了解这个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出现的时间和条件。我在本书正文里已经指出，《火星报》组织在代表大会时期召集会议商量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以便共同向代表大会提出一个相当的名单。这次会议结果发生了分裂：《火星报》组织中的多数派通过了由特拉文斯基、格列博夫、瓦西里也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构成的名单，但是少数派不愿让步，而坚持由特拉文斯基、格列博夫、佛敏、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构成的名单。《火星报》组织中的两部分人在提出和表决这两个名单的那次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在一起集会过。双方都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动，想用整个党代表大会的表决来解决这一引起他们分歧的争论问题，并且双方都极力想把尽量多的代表人数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这种自由鼓动，立刻就暴露了我在本书正文里十分详细分析过的那件政治事实，即火星报少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要战胜我们，就必须依靠“中派”（泥潭派）和反火星派。这确实是必要的，因为绝大多数反对反火星派和“中派”的攻击而一贯捍卫火星派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计划的代表都很快很坚决地站到我们方面来了。从既不属于反火星派，又不属于“中派”的三十三个代表（更确切些说，三十三票）中，我们很快就夺得了二十四个，并和他们订立了“直接协定”，形成了“紧密结合的多数派”。而马尔托夫同志方面只剩下了九票；要取得胜利，他就必须得到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全部票数，然而他和这两派虽然能够一同行进（如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虽然能够实行“联盟”，即能取得他们的赞助，但是并不能同他们订立直接协定，其所以不能是

因为他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始终都和我们一样激烈进行过反对这两派的斗争。这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处境可悲而又可笑的原因！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况》中想用一个毒辣得要命的问题来消灭我，说什么“我们敬请列宁同志爽爽快快地回答一个问题：‘南方工人社’在代表大会上究竟对于谁是局外人呢？”（第23页，附注）我恭而敬之，爽快地回答说：对于马尔托夫同志是局外人。证据是我很快就同火星派分子订立了直接协定，而马尔托夫同志当时却无论是同“南方工人社”，无论是同马霍夫同志，无论是同勃鲁克尔同志，都没有订立过并且也不能订立直接协定。

只有把这一政治形势弄清楚以后，才可以了解所谓“伪造”名单这一麻烦问题的“关键”。请具体设想一下当时的实在情形吧，《火星报》组织是分裂了，我们双方都在代表大会上自由鼓动拥护各自提出的名单。在许多个别的私人谈话中进行这种鼓动时提出的名单有好几个方案，时而提出三人小组来代替五人小组，时而又用这个候选人来代替那个候选人。例如，我很清楚地记得：在多数派的私人谈话中曾经提出过鲁索夫、奥西波夫、巴甫洛维奇、迭多夫<sup>53</sup>等同志为候选人，但是在讨论和争论以后又把他们取消了。也许还提出过我所不知道的其他候选人。大会上每一个代表都在谈话中表示过自己的意见，提出过某些修正，参加过争论等等。很难设想这种情形只会在多数派中间发生。甚至可以肯定，在少数派中间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因为我们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两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原定的那个五人小组（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文斯基）后来用三人小组（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代替了，并且格列博夫又不中他们意，于是他们乐意用佛敏来代替他（见利亚多夫和哥林两同志印发的传单）。不要忘记，我在本书正文内把大会代表分成各个集团，是根据事后所作

的分析划分的。其实，这些集团在进行竞选鼓动时还刚刚开始形成，当时各个代表之间的意见交换是进行得完全自由的；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壁垒”，当时每个代表只要想同其他任何一个代表私下交谈，就可以随便去同他交谈。当时情况既然如此，那末在各种方案和名单中，除了《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提出的名单（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文斯基）之外，还有过一个与它没有很大区别的名单，即由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施泰因、叶哥罗夫五人构成的名单，这也就毫不足怪了。这样一种候选人名单的产生原是极其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候选人——格列博夫和特拉文斯基，显然是不中《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的意的（见他们那封载于本书正文第十节的信，在这封信里他们把特拉文斯基从三人名单中取消了，而关于格列博夫，干脆说是一种妥协办法）。用组委会委员施泰因和叶哥罗夫两人来代替格列博夫和特拉文斯基，原是完全自然的事；反之，如果党的少数派代表中未曾有过一个人想要实行这样一种更替，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以下两个问题：（1）由叶哥罗夫、施泰因、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人构成的名单，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2）为什么马尔托夫同志一听到有人把这样一个名单推到他头上就大发雷霆呢？为了准确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必须向全体大会代表询问一番。但是这在目前办不到。就必须特别弄清楚，党的少数派（不要把党的少数派和《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混为一谈）中，究竟有哪些代表在大会上听见过那两个引起《火星报》组织分裂的名单呢？他们究竟是怎样对待《火星报》组织中的多数派和《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提出的这两个名单呢？他们没有提出过，没有听说过为什么要对《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的名单作一种适当改变的假设或意见吗？可惜，这些问题在仲裁法庭上仿佛也

没有提过，仲裁法庭（根据法庭判词全文来看）甚至始终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究竟是因为怎样的两个“五人小组”发生分裂的。例如，别洛夫同志（我认为他是“中派”的一分子）“曾经供认：他和捷依奇有很好的同志关系，捷依奇同他说过他自己对代表大会工作的思想，所以如果捷依奇进行过什么拥护某种名单的鼓动，那他一定会把这件事通知别洛夫”。可惜始终没有弄清楚，捷依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是不是和别洛夫同志说过他对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名单的思想？如果说过，那末别洛夫同志对《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提出的五人小组名单的态度又该是怎样的呢？他没有提过或没有听过对这个名单的适当改变吗？既然这个情节没有弄清楚，所以别洛夫和捷依奇两同志的口供中也就含有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所指出的那个矛盾，即捷依奇同志——恰恰和他自己的断语相反——“曾经鼓动拥护”《火星报》组织拟定的“某些中央候选人”。接着别洛夫同志指出，“关于在代表大会上传阅的那个名单，他大约是在代表大会闭幕前两天遇见叶哥罗夫同志、波波夫同志和哈尔科夫委员会的代表时私下听到的。当时，叶哥罗夫曾经表示惊奇，为什么人家竟把他列入中央候选人名单，因为他——叶哥罗夫——认为把他推举为候选人是不能在大会代表中间——无论是在属于多数派的代表中间或在属于少数派的代表中间——博得同情的”。极可注意的是，这里显然是指的《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因为在党的代表大会其余的少数中间，把叶哥罗夫同志——组委会委员和“中派”出色演说家——推举为候选人的提议不仅能够而且一定会得到同情。可惜，正是关于党的少数派内不属于《火星报》组织的那些分子是不是同情的问题，我们从别洛夫同志口中根本没有听见什么消息。而这个问题正是一个主要问题，原来捷依奇同志埋怨人家不应该把这个名单推到《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

头上，但这个名单可能是由不属于这个组织的少数派搞出来的！

当然，现在很难想起，究竟是谁最初主张提出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我们中间每个人究竟是从谁的口中听见这个名单的。例如，我不仅不记得这一点，并且也不记得多数派中间最初提出上述那个包括鲁索夫、迭多夫等人的候选名单的究竟是谁；从许多关于各种候选名单的谈话、假设和传闻中，我只记得那些直接在《火星报》组织中或在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上提过的“名单”。这些“名单”多半是用口头传达的（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四页倒数第五行里所指的那个“名单”，也就是指的我用口头方式在会议上提出的五个候选人），但是往往也曾记在字条上，这种字条一般是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由一个代表递给另一个代表，并且通常在散会以后就把它们销毁了。

既然没有精确的材料能够说明这个轰动一时的名单的起源，那我们只好假定：或者是一个为《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所不知道的党内少数派的代表曾主张提出这样一个候选人名单，因此这个提议也就经过口头和书面方式在代表大会上传开了；或者是《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代表大会上曾经主张提出这样一个名单，但是后来他把这一点忘掉了。我觉得后一假定更为可靠。这是因为提出施泰因同志为候选人的意见在代表大会上显然得到过《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的同情（见本书正文），而提出叶哥罗夫同志为候选人的意见显然是这个少数派在代表大会闭会后产生的（因为无论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或在《戒严状况》中都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为中央委员会一事表示惋惜，而叶哥罗夫同志就是组委会的一个委员）。既然如此，既然这个想把组委会委员变为中央委员的主张显然在某些人的脑子里盘旋过，那末假设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私人谈话和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过这种主张，难道

## 不是理所当然吗？

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不愿意作这种当然的解释，总想认定这里面有龌龊，有人蓄意陷害，有不诚实的成分，有人散布“明明虚假的、目的在于中伤的谣传”，有人“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等等。这个不正常的倾向只可说是侨外生活条件不健全或由于神经失常的结果，如果事情没有弄到无理伤害同志信誉的地步，那我甚至根本不会谈到这个问题。请你们想一想，捷依奇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能有什么根据认定不正确的通知或不正确的传闻含有龌龊的不良的意图呢？他们显然是由于神经失常，所以觉得多数派“诋毁”他们名声的，不是指出了少数派的政治错误（党章第一条以及和机会主义者联盟），而是把一个“明明虚假的”“假造的”名单推到少数派头上。少数派宁愿说问题不是由于他们犯了错误，而是由于多数派采取了什么龌龊的不诚实的可耻手段！想在“不正确的通知”中找出恶劣意向原是极不合理的，——我们在上面叙述当时情况时已经指出这一点；同志仲裁法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并没有认定这里有什么诬蔑成分，什么恶意成分，什么可耻东西。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即早在党代表大会上还没有进行选举以前，《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就同多数派解释过这种谣传，而马尔托夫同志甚至在他那封在多数派二十四个代表全体会议上宣读过的信里也解释过这种谣传！多数派根本就没有想在《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面前隐瞒关于某一名单在代表大会上传阅的事实，因为连斯基同志曾将此事通知过捷依奇同志（见法庭判词），普列汉诺夫同志对查苏利奇同志谈过这一点（“同她是不能谈话的，她仿佛把我看成特列波夫了”——普列汉诺夫同志曾经这样告诉过我，而这句重复过许多次的笑话再次证明少数派神经失常）。我曾经向马尔托夫同志声明，

说他的解释(说这个名单不是由他——马尔托夫——提出等语)在我看来已经够了(同盟记录第 64 页)。当时, 马尔托夫同志(我记得他是同斯塔罗维尔同志一起)向我们主席团递了一个内容大约如下的字条: “《火星报》编辑部中的多数派请求允许他们参加多数派的非正式会议, 以便驳斥那些对他们散布的可耻谣言。”当时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就在这张字条上答复说: “我们并没有听说过什么可耻的谣言。如果需要召集编辑部会议, 那末关于此事应当特别约定。列宁、普列汉诺夫。”我们晚上出席多数派会议时, 曾把这件事告诉过所有的二十四个代表。当时为了避免一切误会, 决定由我们二十四个人全体共同推选代表去向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两位同志解释一下。被选出来的两个代表, 即索罗金同志和萨勃利娜同志, 就跑去向他们解释了一番, 说谁也没有把这个名单专门要马尔托夫同志或斯塔罗维尔同志认账, 特别是听过他们两个人的声明以后; 说这个名单究竟是由《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还是由不属于这个组织的代表大会少数派搞出来的, 是无关紧要的。要知道, 事实上根本不能在代表大会上普遍查问一次! 根本不能为了查问这个名单而向每个代表问一遍! 可是, 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两位同志又向我们写了一封正式辟谣的信件(见本书正文第十节)。这封信由我们的代表索罗金和萨勃利娜两位同志在二十四人会议上宣读过。看来, 这件事情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 ——我说已经可以告一段落, 并不是说已经找出了名单的来源(如果这对谁有兴趣的话), 而是说完全排除了任何以为有人故意“危害少数派”或“中伤”某一个人, 或故意“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的任何看法。虽然如此, 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大会上(记录第 63—64 页)又把这个由病态心理勉强臆造的龌龊拖了出来, 并且作出了许多不正确的介绍(显然这是他自己神经过敏的结果)。他

说，名单里有一个崩得分子。这是不对的。仲裁法庭的一切见证人——包括施泰因和别洛夫两位同志在内——都证实这个名单上有叶哥罗夫同志。马尔托夫同志说，这个名单就是直接协定的联盟。这是不对的，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明了。马尔托夫同志说，由《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提出的（并且能使代表大会多数抛弃这个少数的）其他名单，“甚至连假造也没有假造过”。这是不对的，因为党代表大会多数全体都知道，由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提出的但没有得到多数赞同的至少有三个名单（见利亚多夫和哥林两人印的传单）。

一般说来，为什么这个名单竟使马尔托夫同志气愤到如此地步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名单说明他们转到我们党的右派方面去了。当时马尔托夫同志大喊大叫，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痛恨人家“把他的政治立场估计得不正确”，但是现在谁都看见，关于某个名单是不是由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提出来的问题并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其实这个罪名无论同这个名单或其他什么名单都是无关的，这个罪名不是诬加的而是真实的，对政治立场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个勉强造成的关于轰动一时的名单的难办的案件，应当得出的总结如下：

（1）马尔托夫同志高喊“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这件事是可耻的”，他用这种叫喊来伤害古谢夫同志名誉的行为，我们不能不与哥林和利亚多夫两位同志一起称之为无理取闹。

（2）为了改善气氛并且使党员不必认真对待任何一种反常的攻击，也许应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规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章程里的一个规则。这个章程第二条中载称：“凡是违背党纲原则或犯有不名誉行为者，即不能再留在党内。关于他们的党籍问题，

应当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仲裁法庭来处理。审判员成分由提议开除者和被提出开除者各指定半数组成，主审员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指定。对于仲裁法庭判词的控诉，可提交监察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审理。”这样的规则可能是一种对付那些轻易控告（或散布谣言）他人犯有什么不名誉行为的分子的好武器。在制定这种规则时，凡是属于这样的控告，如果控告者不敢理直气壮地以控告者的资格在党面前说话并且力求得到相当党机关的判决时，即永远算作无理取闹。

写于 1904 年 2—5 月

1904 年 5 月在日内瓦用单行本刊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手稿和 1907 年  
出版的弗拉·伊林《十二年来》文集原文  
作过校订

---

## 注　　释

- 1 《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全面地阐明了关于党的学说，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粉碎了组织问题上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基础。

这本书是列宁在几个月内，详细地研究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每个代表的发言、代表大会上所形成的政治派别、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各种文件后写成的。列宁的这本书引起了孟什维克的狂怒。普列汉诺夫要求中央摒弃列宁这本书。中央委员会的调和派企图阻止该书的刊印和发行。

《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于 1904 年夏在日内瓦出版，它在俄国先进工人中传布很广。在莫斯科、彼得堡、里加、萨拉托夫、土拉、奥勒尔、乌发、皮尔姆、科斯特罗马、希格雷、沙弗里（柯夫诺省）等地，在逮捕和搜查时曾经发现过这本书。列宁曾把这部著作收在 1907 年（封面上印的是 1908 年）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第一卷中。——第 1 页。

- 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03 年 7 月 30 日—8 月 23 日举行。代表大会最初在布鲁塞尔开了十三次会。后来因受警察迫害而移至伦敦举行。总共开了二十七次会。列入代表大会日程的共有二十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纲、党的组织（批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二十六个组织的四十三个代表，他们有五十一票表决权（其中八个代表各有二票），另外有十四个代表有发言权。

代表大会由列宁的《火星报》筹备。列宁为筹备代表大会做了巨大的工作。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见本书第 7 页）。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为了在俄国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巨大斗争，

终于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通过了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的革命纲领。列宁在提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任务的同时，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大会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第1页。

- 3 《火星报》(«Искра») 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1900年由列宁创办。《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警察的迫害，在俄国无法出版革命的报纸，列宁早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就周密地考虑了在国外出版报纸的计划。列宁在1900年1月流放结束后立刻着手实现这个计划。

《火星报》创刊号于1900年12月24日在莱比锡出版，随后在慕尼黑出版，自1902年4月起在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天起在日内瓦出版。

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尤·奥·马尔托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春天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根本问题的文章，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做了评论。

在俄国的许多城市(彼得堡、莫斯科等)建立了列宁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小组和委员会。

火星派组织是在列宁培养出来的职业革命家(尼·艾·巴乌曼、伊·瓦·巴布什金、谢·伊·古谢夫、米·伊·加里宁等)的直接领导下产生和进行工作的。

《火星报》编辑部根据列宁的倡议和他的直接的参与下，制定了党纲草案，准备了在1903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俄国的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都拥护《火星报》，赞同它的策略、纲领和组织计划，承认它是自己的领导机

关。代表大会在一个专门的决议中指出《火星报》在建党斗争中的特殊作用，并宣布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编辑部。马尔托夫不顾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而拒绝参加编辑部，因而《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编辑出版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孟什维主义立场上去，他要求让已被代表大会否决的原来的全体孟什维克编辑参加《火星报》编辑部。列宁不能同意这种做法，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以便加强党中央委员会里的阵地，并从这个阵地上打击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编辑出版的。1903年11月26日，普列汉诺夫违背代表大会的意志，独自把以前的孟什维克编辑补选为《火星报》编辑。从第52号起，孟什维克就把《火星报》变成了自己的机关报。“从此时起，党内就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7页）——第1页。

- 4 “实际工作者”（列宁）是孟什维克马·萨·马卡久勃的笔名。——第5页。
- 5 1902年代表会议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代表会议，于1902年4月5—10日在别洛斯托克举行。经济派和崩得分子企图把这次代表会议宣布为党代表大会。由列宁起草并由《火星报》代表在代表会议上加以说明的报告证明，这样的代表大会还没有准备好，也缺乏代表大会应有的权限。代表会议成立了负责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不久其中大多数委员被捕。同年11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重新成立了负责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列宁在《〈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对别洛斯托克代表会议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78—86页）。——第5页。
- 6 崩得 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成立于1897年，它所联合的主要是在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

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驳斥了崩得在组织上的民族主义以后，崩得退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6年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以后，崩得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分子一直支持孟什维克，不断反对布尔什维克。崩得形式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崩得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的要求相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崩得支持反革命的临时政府，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站在一边。在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崩得分子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当无产阶级专政对国内反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日益明显时，崩得声明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根据一般原则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加入党的某些崩得分子是两面派，其入党的目的是要从内部破坏党；后来他们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第7页。

- 7 工人事业社是经济派的组织，出版《工人事业》杂志。该杂志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的不定期机关刊物，1899年4月至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由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马尔丁诺夫、弗·巴·伊万申担任编辑。杂志总共出了十二期，共九册。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和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事业》的观点。——第7页。
- 8 南方工人社是1900年秋在《南方工人报》周围形成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南方工人报》于1900年1月至1903年4月在俄国秘密出版，共出了十二号。该报主要是在南俄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传播。南方工人社“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指导性的机关报，但是事实上却别有企图，并在原则方面表现得很不坚定”（见本书第7页）。该社一直存在到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它的大部分领导者后来都成了孟什维克。——第7页。
- 9 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同盟是列宁发起于1901年10月成立的。参加同盟的有《火星报》—《曙光》杂志组织的

国外部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包括劳动解放社)。同盟是《火星报》的国外代表。同盟出版了一些《通报》和小册子，其中有列宁的小册子《给农村贫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具有党章所规定的委员会的权利。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孟什维克在同盟内隐藏起来，从内部来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

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10月26—31日在日内瓦举行。这次大会是因孟什维克再三要求而召开的。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的十五名代表(共十八票)，少数派的十八名代表(共二十二票)以及既不倾向布尔什维克也不倾向孟什维克的一名代表(共二票)。

大会议程的主要项目是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盟代表列宁做报告。列宁报告以后，马尔托夫发言为孟什维克的机主义辩护，污蔑并攻击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退出了同盟代表大会。由于同盟代表大会拒绝履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宣布它是非法的。——第8页。

- 10 斗争社 是国外的一个著作家集团，自行列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该社1901年在巴黎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由于背离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同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这个集团没有被允许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了。——第13页。
- 11 巴甫洛维奇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给同志们的信》，1904年日内瓦版。——第14页。
- 12 索罗金是布尔什维克尼·艾·巴乌曼的别名；朗格是布尔什维克亚·米·斯托帕尼的别名。——第14页。
- 13 工人思想社 是经济派的一个集团，他们出版了《工人思想报》。该报于1897年10月创刊，1902年12月停刊，共出十六号。该报编辑有康·米·塔赫塔列夫等人。

列宁在发表在《火星报》上的文章中以及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工人思想社的观点，指出它的观点是国际机会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第21页。

- 14 柯斯特罗夫是高加索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娅的别名。——第 34 页。
- 15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 分册第 41 页。——第 36 页。
- 16 土地和自由社是民粹派的组织，1876 年在彼得堡建立，其主要成员有：亚·德·米哈伊洛夫、格·瓦·普列汉诺夫、谢·米·克拉夫钦斯基、奥·瓦·阿普特克曼等。土地自由派错误地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认为只靠农民就可以推翻沙皇政府。为了发动农民反对沙皇政府，土地自由派到农村进行宣传鼓动；由于农民不了解他们的宣传，没有跟他们走，于是该社一部分成员主张不要人民参加，专靠自己的力量，采取暗杀手段去继续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土地和自由社因此发生了两派分歧，其中一派（以安·伊·热里雅鲍夫为首）主张采取新的斗争手段（恐怖手段），另一派（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两派于 1879 年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第 53 页。
- 17 民意党是民粹派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于 1879 年成立的秘密团体。该党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主要斗争手段。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1881 年 3 月 1 日（公历 13 日））以后不久，民意党就被沙皇政府粉碎了。在此以后，民粹派的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宣传同沙皇专制制度调和和妥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成了富农阶级利益的代表者。——第 53 页。
- 18 马尼洛夫是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具有多情善感、痴心妄想的性格。马尼洛夫成了想入非非、游手好闲、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通称。——第 55 页。
- 19 指 1900 年在汉堡发生的事件，这次事件是由于“石匠自由联合会”的一批会员在罢工期间违反中央联合会的禁令去作包工而产生的。汉堡石匠联合会向当地党组织提出了这批社会民主党人会员破坏罢工行为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指定的党的仲裁法庭指责了“石匠自由联合会”内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但否决了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建议。

——第 59 页。

- 20 被代表大会否决的兹博罗夫斯基(科斯提奇)的决议案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被该组织承认为党员。”（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59 年俄文版第 281 页）——第 63 页。
- 21 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代表共十六人，其中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九人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少数派七人。——第 73 页。
- 22 据希腊神话传说，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第 75 页。
- 23 萨勃利娜 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别名。——第 76 页。
- 24 劳动解放社 是格·瓦·普列汉诺夫 1883 年在日内瓦创立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一直存在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 年）。

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点上进行过很多工作，它在理论上创立了社会民主运动，实现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2 页）。它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译成俄文，在国外刊印并在俄国境内秘密传播。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给了民粹主义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但是劳动解放社也有严重错误：民粹主义观点的残余、对农民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过高。这些错误成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一些成员后来的孟什维主义观点的胚胎。——第 76 页。

- 25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于 1895 年 10 月 6—12 日在布勒斯劳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讨论土地纲领草案时所发生的意见分歧。土地纲领草案有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其中有变无产阶级政党为“全民”党的倾向。除了机会主义者以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也拥护这个纲领。土地纲领曾受到蔡特金和其他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的严厉批判。代表大会以多数票（一

百五十八票对六十三票)否决了这个土地纲领草案。——第 80 页。

- 26 格尔茨 是德·伊·乌里扬诺夫的别名。——第 83 页。
- 27 阿拉克切也夫 是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陆军大臣,以实行专横残暴的军阀统治著称。——第 87 页。
- 28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是 1894 年根据劳动解放社倡议在日本瓦成立的。它有自己的印刷所,印刷革命书刊,出版《工作者》文集。最初联合会由劳动解放社领导,它的出版物也由劳动解放社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的代表机关。后来,由于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或所谓的青年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 年 11 月劳动解放社在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声明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劳动解放社同联合会彻底分裂和退出联合会是在 1900 年 4 月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当时劳动解放社和与它观点一致的人退出了代表大会,并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解散联合会的决议。——第 98 页。
- 29 奥西波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布尔什维克罗·萨·捷姆里雅奇卡的别名。——第 125 页。
- 30 社会革命党 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2 年初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它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折衷混合物。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见《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295 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1917 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反革命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社会革命党人不支持农民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主张保留地主土地私有权。

1917 年 12 月,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阴

谋，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后被苏维埃政权粉碎。——第 126 页。

- 31 解放派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君主派，因出版《解放》杂志而得名。该杂志于 1902 年至 1905 年由彼·别·司徒卢威在国外编辑出版。从 1901 年 1 月起成为自由君主派的解放社的机关刊物。解放派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心。——第 127 页。
- 32 指经济派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阿基莫夫反对《火星报》提出的党纲，其中一个理由是：“无产阶级”一词在党纲中不是主语，而是补语。——第 129 页。
- 33 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山岳派又称雅各宾派，是当时的革命阶级即资产阶级中最坚决的代表，他们主张必须消灭专制政体和封建主义。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不同，他们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最终走上了同君主派勾结的道路。
- 列宁称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山岳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后，列宁经常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第 137 页。
- 34 沃龙涅什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组织”当时为经济派所控制，对列宁的《火星报》及其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计划采取敌对立场。——第 139 页。
- 35 即新任中央委员弗·威·林格尼克。——第 147 页。
- 36 《曙光》（《Борьба》）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1901 年至 1902 年由《火星报》编辑部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四期（三册）：第 1 期在 1901 年 4 月出版，第 2—3 期合刊在 1901 年 12 月出版，第 4 期在 1902 年 8 月出版。《曙光》杂志曾刊载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的前四章、《内政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第 148 页。

- 37 奥尔托多克斯 是孟什维克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别名。——第 165 页。
- 38 巴札罗夫 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人物。——第 167 页。
- 39 在 1903 年 11 月 25 日《火星报》第 53 号上同时发表了列宁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见《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98—102 页)和普列汉诺夫写的编辑部的回信。列宁在信中建议在该报上讨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普列汉诺夫拒绝这个建议，把这种分歧叫作“小组生活中的无谓争吵”。——第 168 页。
- 40 《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 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1900 年底由社会革命者同盟在俄国出版。从 1902 年 1 月至 1905 年 12 月，该报作为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第 168 页。
- 41 波拿巴主义 是大资产阶级依靠暴力和欺骗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产生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波拿巴·拿破仑统治时期，在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指出：“波拿巴主义是君主制在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半靠支柱以后所采取的顺风转舵的手段，这样的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维持平衡以防跌倒，卖尽笑脸以便统治，实行收买以便讨好，同社会渣滓、同公开的小偷和骗子讲交情以便不单单靠刺刀维持下去。”(见《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245 页)波拿巴主义的统治方法是各国资资产阶级所惯用的统治方法，在一定阶段是反革命统治的主要形式。——第 170 页。
- 42 伊格恩克 是中央委员调和派分子列·叶·加尔彼林 的别名。——第 170 页。
- 43 内阁主义或米勒兰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反动内阁而得名。米勒兰于 1899 年参加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合作。——第 174 页。
- 44 “合法马克思主义”即司徒卢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歪曲。彼·别·司徒卢威及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和工人运动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列宁在

自己的著作里揭露了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和后来采取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形式的修正主义的萌芽；他指出司徒卢威主义必然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司徒卢威是俄国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之一；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掩护，坚持社会沙文主义，并为掠夺战争、兼并和民族压迫作辩护，他的虚假的借口就是“我国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见《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628页）。——第174页。

- 45 指“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彼·别·司徒卢威为资产阶级辩护的观点，列宁曾于1894年秋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小组里宣读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论文，对司徒卢威的观点进行了尖锐批判。——第175页。
- 46 布朗基主义是以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为首的一个流派。

布朗基积极参加了法国的革命运动，两次被判死刑，差不多有半生是在监狱中度过。

列宁认为布朗基是一个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但同时又坚决地批评了他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方法。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是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布朗基主义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1页）——第175页。

- 47 指马尔托夫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我们能这样去准备吗？》一文，该文反对准备全俄武装起义，认为准备武装起义是空想和密谋活动。——第177页。
- 48 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中的主角，他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这个词一般用来比喻因循守旧和宗法式的落后性。——第186页。
- 49 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于1903年9月13—20日举行。代表大会指责了伯恩施坦、布劳恩、觉勒、大卫等修正主义者，但是并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党，因此他们便毫无阻碍地继续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

点。——第 191 页。

- 50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机关刊物，也是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之一，1897年至 1933 年在柏林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 191 页。
- 51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 年至 1923 年秋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 年 10 月前为月刊，以后改为周刊。杂志的编辑从 1883 年至 1917 年 10 月是卡·考茨基，从 1917 年 10 月至 1923 年秋是亨·库诺夫。1885—1894 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193 页。
- 52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报纸，自 1856 年至 1943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 196 页。
- 53 选多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莉·米·克尼波维奇的别名。——第 211 页。

书号 1001·193

定价 0.45 元